

不要沾染假
休主義作風

人民日報

目 录

前 言	(1)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和反对官僚主义的 题词、论述选辑	(6)

导 论

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	(12)

第一篇

述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论反对官僚 主义	(18)
一、毛泽东论反对官僚主义	(20)
二、刘少奇论反对官僚主义	(84)
三、周恩来论反对官僚主义	(185)
四、朱德论反对官僚主义	(232)
五、邓小平论反对官僚主义	(265)

第二篇

官僚主义的根源	(359)
一、官僚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	(359)
(一)源远流长的官僚制度的影响	(360)
(二)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的官僚制度的影响	(387)
(三)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部分和环节的影响	(399)

二、官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442)
(一)官僚主义者坚持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背离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	(442)
(二)官僚主义者坚持脱离群众和做官当老爷,背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453)
(三)官僚主义者坚持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背离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464)

第三篇

克服官僚主义的途径	(484)
一、掌握克服官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484)
二、深刻认识官僚主义的根源	(485)
三、积极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	(486)
四、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489)
五、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思想觉悟和社会政治积极性	(494)
六、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克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499)
附:读王亚南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501)
代后记	(507)

前 言

官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无所不在地飘荡了几千年之久。统治中国最长的政治制度是官僚政治制度，中国各族人民见得最多的、最坏的政治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

官僚主义是有害的、危险的和令人痛恨的。从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至今，官僚主义曾经受到多次的限制，严厉的批判和清洗。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无论是制度上和体制上的官僚主义，还是政治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都具有深远的、浓重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致使官僚主义不仅能够保持而且能够顽强地长久地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它侵蚀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严重地妨害执政党的正常有效的活动，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推翻了三大敌人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进而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这种国体和政体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统治的根本政治制度最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这

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可削弱和动摇的政治基础。然而,作为政治制度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的**政治体制**却存在着许多弊端。这些弊端是必须加以克服的。弊端之一就是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

我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艰难的曲折复杂的过程,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相应地经历初步探索,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的过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改变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的**政治体制**,即改革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发和环节。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对原有的政治体制中的合理部分全盘否定,一笔勾销,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扬弃”过程。

这本探讨**官僚主义**的学术专著,分为三篇:

第一篇力求把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五位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比较完整地辑录出来,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逐一加以述评。力求忠实原著,有理有据,以理服人。五位革命家的论述和我的述评涉及**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弊病和危害、克服**官僚主义**的途径等方面。

第二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史学界和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论述**官僚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第三篇,在述评五位革命家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探讨了**官僚主义**的根源之后,进而论述克服**官僚主义**的途径。

第一篇的述评和第二篇第三篇的论述都要求编著者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唯物辩证的方法,遵循社会意识独特的发展规律,即通过思想教育和说理斗争来解决矛盾;文字叙述和缓平稳、通俗易懂,能为读者所接受。

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

1986年9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这个蓝图要求立足我国国情,实事求是,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承受能力,同时还要兼顾长远和近期两个方面。

198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明确而全面地论述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1992年10月,召开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

1997年9月,召开党的十五大。这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减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奋斗目标。

1998年3月,召开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党的十五大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在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得到了充分的和脚踏实地的贯彻。上一届总理李鹏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论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现有政府机构形成、调整和历史过程。提出政府机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密切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客观要求。新任总理朱镕基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务,并采取步骤加以实施。

我特别列出上述日程表,意在标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从全面展开发展到深化的阶段。诚然,这是更艰苦的阶段。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是:日程表列举的每个重要会议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都毫不例外地涉及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全国各族人民感到欢心鼓舞,也增强了我写作和出版这本专著的信心和勇气。

坚持不懈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不懈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是使国家发达兴旺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执政党自我完善和继续在人民群众中保持崇高威望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它将会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克服思想作风上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是必要的,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克服体制上的官僚主义,这是根本的和更为重要的。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当然也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除邓小平较多地论述体制上的官僚主义以外,多数革命家较多地论述政治作风、思想作风上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关于这种历史状况,我们不应该苛求前人。

我期盼着这本论述平缓的学术著作,能够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尽微薄之力。这正是编著本书的目的。

在编著本书的过程中,许多同志给予我支持和鼓励。完成书稿以后,我曾到几个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有关同志几乎一致认为,书稿内容现实感很强,很敏感,顺应了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历史潮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建议我积极筹备经费,尽早出版。我采纳了这个建议。在这里,我向曾经支持和帮助我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兰晓琴,在本书 10 年的编著过程中,她在各方面给予我支持和帮助。

由于受到我的学识水平和其它条件的限制,本书肯定会有不完善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建华

1997 年 10 月 1 日于昆明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密切 联系群众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题词、论述选辑

毛泽东关于密切党群关系、 反对官僚主义题词和论述选辑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题,一九四二年三月)

面向群众(为生产英雄李丕福题,一九四三年一月)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为悼念邹韬奋逝世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站在最广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给中共葭县县委题,一九四七年九月)

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为中共松江省委题,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注:选自《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

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同上）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元旦祝词》，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的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邓小平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论述选辑

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

我认为，把我们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军队的指挥机关搞得这样庞大、这样臃肿是不行啊！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现在的庙很多，

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同上）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月）

江泽民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论述选辑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符合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说党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同时必须看到,当前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和少数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败坏党的声誉,危害党群关系。每个党员都要牢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

只有讲政治,才能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党的坚强团结、党同人民的坚强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于讲政治》,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确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有的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由于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经验不够了解,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在思想作风和组织纪律上还需要进一步锤炼;有的干部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不注意大局,不注意政治,甚至分不清基本的原则是非界限;有的干部作风漂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严重,有的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堕落为腐败分子、犯罪分子。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必须通盘考虑,组织专门力量,抓紧制定方案,积极推进。《《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

必须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决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同上)

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状况人民群众还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同上)

导 论

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

1958年6月,《新知识词典》编辑室编辑出版的《新知识词典》第754页作如下解释:“官僚主义指一种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思想,并从此而产生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其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高高在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刘少奇:《论党》)这是一种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还有一种是从表面上看来好象与群众有联系,工作也的确很忙,主观上的确勤勤恳恳想把事情办好,但是丝毫没有给群众、给工作带来好处,反而使群众感到麻烦,结果还是脱离群众,给工作带来了损失。这是一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以及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缘故。要彻底消除官僚主义,就必须经常和脱离群众的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进行斗争。”

这种解释具有合理的可取的内容,然而仅仅限于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1979年9月,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辞海》第2325页作如下解释:“官僚主义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

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

这种解释也具有合理的可取的内容,然而仅仅限于领导作风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因此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1982年9月,《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681页作如下解释:“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顾群众利益,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其表现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副职虚职过多,工作效率很低等现象。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形态。官僚主义随着国家出现而产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习惯势力的反映,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这种解释比起前面两种解释,前进了一大步。既涉及思想作风上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也涉及到政治体制上的官僚主义。其局限性在于没有强调政治体制上的官僚主义。

以上三种解释是我国规格较高的具有权威的辞书所作的解释。我们应取“扬弃”的态度,即既克服又保留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这三种解释。

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呢?

在这本学术著作中,我们作一些探讨,拟从如下的意义上来定义: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的反动的思想体系,是在这种思想体系指导下建立的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确保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实施的一种腐败的违反民主精神的政治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官僚主义至少应包括思想体系、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风等三层含义。其中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根本的、最重要的含义。因为官僚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付诸建立官僚政治制度和官僚政治体制的实践,就不可能有明显的实践意义或行动意义,而官僚主义的思想体系、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决定官僚作风,官僚作风必定反过来为官僚政治制度和官僚政治体制服务,所以官僚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官僚主义的根本内容。

从思想体系看,奴隶主的专制主义,封建主的专制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行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

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看,奴隶主封建主、大地主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建立的官僚政治制度和官僚政治体制是官僚主义。

从社会实践中的作风看,奴隶主的专制作风,封建主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大地主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断独裁作风是官僚主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对官僚主义应作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将以往的私有制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的不同情形,作一些对比研究。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实行剥削阶级专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这几个社会中的官僚主义无疑地违背人民大众意志和利益,脱离人民大众,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社会。我国各族人民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或勤务员,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是好的,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同历史上剥削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有着质的区别。我们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它方面体制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使我国各族干部和群众在高度民主、法制健全、安定团结的社会主义国度安居乐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深入地持久地开展克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

我们在前面已作过这样的论述:由于官僚主义在我国有着深远的浓重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因此,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至今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用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的话来说,即“无论在内部事务中或在国际交往中,官僚主义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用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的话来说,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对党对国家负责的精神,

坚持不懈地和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克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这是推进我国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应有之义或重要内容。

对于我国现存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试从下面作一些概括:

从思想体系看,存在着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腐败享乐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等。

从政治体制看。其表现大致有部门林立,机构庞大臃肿,副职虚职过多,冗员重叠,官民比例失调,层次繁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

从作风看,其表现大致有高高在上,滥用权力,不关心群众疾苦,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独断专行,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饱食终日,颟顸无能,无所作为,糊涂无用,自私自利,争名夺利,蜕化变质,拉宗派,搞特殊化,贪图享受,害怕艰苦等。

从价值评价的角度作分析,除了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以外,一般说来,官僚主义者的价值取向是:贪欲与偏执的结合。所谓贪欲,即贪图权利、贪图名利、贪图享受。所谓偏执,即固执己见、固步自封、老子天下第一、老子包打天下,对直谏者或疏远或反感或迫害。进而言之,官僚主义者贪得无厌,贪欲永远不会满足。其偏执正是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社会实践中的主观主义的突出表现。

官僚主义有着深远浓重的根源和传统。对于具有如此巨大的历史惰性和惯性的官僚主义,我们不可能象处理一堆垃圾一样,勃然一怒,放一把火烧光,也不应该破口辱骂,以感想代替政策,以善良愿望代替长期艰苦的清扫工作。相反地,我们必须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官僚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运用理性的眼光去对待社会热点问题,力行不气馁,不急躁,长期坚持不懈,以有效的行动逐步地铲除它。

众所周知: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强烈愿望,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的,而不是庇护官僚主义的。

第一篇

述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论反对官僚主义

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领袖人物组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政党及其领袖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领袖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无产阶级领袖代表着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们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和锻炼出来的，一贯地和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终生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看作自己的最高职责。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是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的杰出人物都不可比拟的。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历史使命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袖具有革命家兼学者的高尚品格。他们的伟大历史作用，既要从他们的革命实践活动去理解，又要从他们的理论著述去理解。他们的威信就是党的威信、阶级的威信、

人民的威信，它是人民群众的宝贵财富。

在理论方面，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在于创立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袖集中了人类优秀思想成果，以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式，给人类的彻底解放提供了精神武器，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贡献给人类。通过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因此，无产阶级领袖既是革命家，又是政治家和理论家。

在实践方面，无产阶级领袖对推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热情宣传革命理论，教育和动员无产阶级及广大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他们积极组织阶级队伍，广泛团结人民群众，在建党、建军和建政等方面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无产阶级领袖作为阶级队伍的组织者和团结的核心，成为引导人民群众前进的旗帜，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挥和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走向胜利。他们以人民勤务员的身份，居于人民群众之中。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无产阶级领袖既是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实践家和战士。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五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论述过官僚主义。这些论述是我们批判官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在这里，我们按顺序就他们的论述作简要述评。这对于我们克服官僚主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

风肯定是十分有益的。

一、毛泽东论反对官僚主义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许多卓越领导者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期在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强调: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这就是说,要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有机地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活动,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在这里,我们将《毛泽东选集》第1—5卷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辑录出来,加以述评。

(一)《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节选：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

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象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

.....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09—112页)

评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毛泽东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演说。众所周知,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军队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叫做五次“围剿”。其中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间,但从一九三三年夏季,蒋介石即在积极部署这次进攻,调集约一百万人的兵力,企图一举消灭红军。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者完全违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先是推行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根据地之外,以后又转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红军经过一年苦战,终于未能打破“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

机关和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革命战争形势十分严峻的环境里,毛泽东要求全党采用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依靠和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关于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上面辑录的四点。其中第二点论述了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而应该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群众化的方式。官僚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我们“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第四点论述了经济建设和战争的总任务以及其它的任务不能分离。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有极大的重要性。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组织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节选: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女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

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四千五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路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22—126页)

评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他提出了两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1、关于群众生活问题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推翻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为此,必须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汀州市政府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不关心群众生活问题。表扬了长冈乡、才溪乡两个模范的乡政府,号召大家学习他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正确处理革命战争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

2、关于工作方法问题。

党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是党的两大任务。要完成任务,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生动地形象地把任务比作过河,把方法比作桥或船。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正确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就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

毛泽东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论述了群众生活和工作方法的问题,严厉地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这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论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做好各项事业的指南。

(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节选：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

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做。比较好的领

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深刻地论述了: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852—857 页)

评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联系当时党所进行的工作,特别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经验,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深刻论述了: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都必须采用两个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两个方法的内在联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他指出,不注重和不善于采用这两个基本的领导方法,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

毛泽东认为,斗争愈是艰苦,愈是需要共产党人实行领导和群众的密切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的密切结合,从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他教导“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

毛泽东紧扣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论述党的领导方法,并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载入史册,其意义是深远的。

(四)《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节选：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

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那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还存在有一种军阀主义作风，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作风，因为国民党军队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但是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还必须继续去克服。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这种毛病都是有的，那里的党和军队必须注意克服这种毛病。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

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的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887—889 页)

评注：《组织起来》是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述了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就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而打仗的军队肩负两重任务，即既打仗，又生产。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与此相反的一种方针，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前一个方针是正确的、后一个方针是错误的。

共产党人无论做什么工作，如果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而只知道向群众要救国公粮，那就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军队中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无论是官僚主义或军阀主义，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共产党人应该随时注意清除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就好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毛泽东的这些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的论述，至今仍然可以鞭策我们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做好各项工作。

(五)《论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节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

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

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994—998 页)

评注：《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无数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之后，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团结全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以及在会后所写的一些文章里，都着重地指出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预见到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地位的危险性，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以避免在可能到来的新事变面前惊惶失措。

面临如此严重的局势，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五部分“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中，结合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全面论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们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群众之中。”要抵抗任何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侵蚀党的健全的肌体。

(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节选：

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今后应当加强对于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获得进步。同时，应当向他们提出警告，决不可以因为成功，因为受到奖励，而骄傲自满。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204页)

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继续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再加重人民负担，并酌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你们现在正在开生产会议。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农业方面，过去被官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对于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那些变工队和合作社都垮台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毫不可惜的。你们的任务，是在于细心地保存和发展那些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变工

队、合作社和其他必要的经济组织，并推广这样的组织于各地。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1206—1207 页)

评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全面地总结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党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把这个总路线和总政策概括为以下的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了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和产生了成万的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将要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宝贵财富。并指出：在农业方面，过去被官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对于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那些变工队 and 合作社都垮台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后要继续纠正土改和整党两项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节选：

.....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

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1328—1329 页)

评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是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前夜的一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他在这个报告里，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长期以来党的工作重心是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现在这个任务已经完成，党的工作重心应当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还将长期存在的在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国外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规定了革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毛泽东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即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的主要成分，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逐步地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路线。这是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英明规划。党在今后面临着更复杂更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清醒地富有远见地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全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有一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在报告中虽然没有使用反对官僚主义的词句，但是他列举的因为胜利，党内生长的四种错误的情绪也正是官僚主义表现形式，都应该清除。

(八)《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节选：

.....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选自《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334页)

评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他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其中第十二条论及要划清两种界限：①革命和反革命、延安和西安的界限。②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不划清和记着这两种界限，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

延安从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革命营垒存在的官僚主义属于非对抗性质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反革命营垒存在的官僚主义属于对抗性质的。毛泽东意在指示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划清界限，把事情办好。

(九)《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三月)

节选：

.....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4—55页)

评注:建国初期,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进而,为了保障三大运动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从1951年底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大量的严重违法犯罪事实。接着在1952年初,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夏先后胜利结束。这一运动,纯洁了干部职工队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关

于“三反”“五反”的斗争》，汇集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些重要指示。

(十)《元旦祝词》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全文：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

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0页)

评注: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的元旦祝词,言简意赅,祝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志愿军和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条战线的胜利。其中包括一九五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的“三反”斗争的胜利,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污毒洗干净。

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不易,要防止政权得而复失的危险。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建国后的头两年,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包括“三反”斗争在内的各条战线的斗争,并取得伟大的胜利,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实际上,清洗旧社会遗毒的任务不可能在一、二年内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还会滋长,滋长的原因包括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可见,消除这些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无疑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既涉及社会制度、体制的问题,又涉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问题。从一九五一年开展“三反”斗争,至今四十七年,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并没有彻底消除,反而变本加利地膨胀起来。借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者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引自《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这不能不引起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思和高度重视。

(十一)《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节选：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

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对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因此,请你们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

(选自《毛泽东选集》五卷第 72—74 页)

评注：本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这一指示是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及时作出的。他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三者结合起来论述，并唤起各级领导机关对三者的注意。

毛泽东客观地估价了“三反”运动中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产生的根源，并提出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及其它工作，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

毛泽东指出：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疾苦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还基本上没有解决。

毛泽东预见到，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对于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当时，而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它们存在的社会根源在于：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此外，还有我们在处理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所导致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指出：加强领导任务和改进领导方法，可以逐步减少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对于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公开揭露，严肃处理，以平民愤。

(十二)《解决‘五多’问题》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节选：

(一)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的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

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许多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77—78 页)

评注:本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出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利益的问题,即“五多”问题——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造成“五多”的原因在于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遗留至今。

毛泽东进而提出解决“五多”问题的方法。即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改变过时的制度和办法。从中央到各中央局、分局、省市、专区、县,层层负责迅速清理和解决问题。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和作用,必然重视解决已经引起农民不满的“五多”问题。

(十三)《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节选：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

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选自《毛泽东选集》五卷第91—97页)

评注:本文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论及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即形成正确思想,领导意见和指示的机关。中央及其各部委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而不是废品。为此,必须了解下情,到下面作调查研究。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涉及到“三反”运动。指出: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然后由中央在全国加以推广。所谓老“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一九五三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毛泽东又论及要虚心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遵守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的规定,就是谦虚态度。这六条规定,也含有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意义

(十四)《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节选：

.....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79—280 页)

评注:《论十大关系》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是党的一份重要文献。毛泽东在这篇讲

话中,以原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结合我国实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讲话第七部分,即《党和非党的关系》中,论及政党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辩证法。指出: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政党消灭必须具备条件。“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为消灭而巩固,寓消灭于加强之中。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中国还没有过时。

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毛泽东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可见,毛泽东对于助长官僚主义的机构臃肿现象是极为不满的。

(十五)《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节选: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

第二点,关于继承党的传统。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

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96—297 页)

评注：本文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讲两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即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论及应当继续发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为此要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官僚主义切实反一下。这次讲话，只讲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此后毛泽东多次讲到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十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节选：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

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

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

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

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3—328页)

评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长篇讲话,讲了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毛泽东论及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时指出:我们反对搞西方资产阶级的“大民主”,爱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垮了蒋介石,斗垮了地主阶级,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斗资产阶级,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是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产阶级的。

毛泽东进而深刻地分析: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

义者。搞官僚主义，骂群众，不解决群众的问题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县以上的干部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些分析多么精辟！

毛泽东又联系党的干部和整风运动，论及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指出：我们党有成百万的，在不同的革命时期锻炼成长的，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有经验的干部。“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有了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我们党准备在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前两项内容同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相同，后一项则与之不同，即在新形势下，将十四年前反对党八股的内容，改为反对官僚主义。建国后，一九五一年开展的老“三反”，一九五三年开展的新“三反”都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内容之一。可见，要治痊官僚主义的“顽症”，无疑是一个长期艰难的任务。毛泽东对于反对官僚主义是十分重视的。

毛泽东又论及：预先出告示，到期（即一九五七年）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整风是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人民内部和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既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才能团结和调动全国人民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包括许多东西，即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

等。毛泽东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要加强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十七)《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

节选：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

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以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7—358页)

评注:本文汇集了毛泽东分别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在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讲了七个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即闹事问题论及要精简机构,密切联系群众和反对官僚主义。

毛泽东从一九四四年起,采纳了党外著名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意见,一贯重视精简机构,认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容易助长官僚主义。毛泽东在本文指出:“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

作出适当安排。

毛泽东希望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到下面去调查研究问题,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他尖锐地指出:“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了出了大乱子,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处于措手不及的窘境。“我们一定要引以为鉴戒。”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十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节选: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

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象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0—371页）

.....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

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

僚主义。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一）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选自同上，第395—396页）

评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文件，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论述了十二个问题，论及敌我矛盾问题，但是重点是论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论述正确的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论及反对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完全不同。敌我之间的矛盾是敌对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敌对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敌对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敌对性的一面。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采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详述之，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解

决这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毛泽东的这段论述，贯彻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用民主的方法，决不允许采用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而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也正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诸方面原因。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析了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指出：“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在闹事问题上应当注意两点，其中第一点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注意：毛泽东要求“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而不是一般的说教。

毛泽东又指出：“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在这里应用了坏事变成好事的辩证方法。

(十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节选：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0—411页)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选自同上,第417页)

评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了八个问题:我国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知识分子的改造、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关于整风、片面性、“放”还是“收”、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等。

毛泽东在讲第五个问题,即整风问题时指出: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都进行过整风。这次整风(一九五七年)主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一个是宗派主义。

毛泽东既肯定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又肯定我们的党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因此我们要进行

整风。同时又指出：我们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错误的东西。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反而会增加党的威信。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在整风中，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反对或者批评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讲第七个问题，即“放”还是“收”的问题时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接着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即“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在这里，毛泽东揭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即通过争论、说理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二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一九五七年三月)

节选：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

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二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拚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9—420页)

评注:本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结合党的整风运动就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重要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

他指出:我们党的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准备在一九五七年开展的整风,要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他批评一部分同志,在革命胜利后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减少,争名誉,争地位,比薪水,比吃穿,比享受,评级评得不满意就双泪长流。这种状况,势必脱离群众,背离党的宗旨。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

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们的同志要学习《水浒传》上拚命三郎石秀的“拚命精神”，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我们党的干部，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在平时也要密切联系群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都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

毛泽东上述精辟的通俗的论述，对当时革命意志衰退，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十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节选：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

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人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1—442页)

评注：

本文是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记载：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 year 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持的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表的。他指出: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放火烧身可不容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把火放起来烧,绝大多数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把我们每一个同志的毛病,包括官僚主义消除掉。毛泽东指出:要定期“放火”,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锻炼一样,把我们的同志锻炼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党纠正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二十二)《做革命的促进派》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节选: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

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

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7—468页)

.....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以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选自同上,第476页)

评注:本文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论及整风问题时,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并认为“四大”形式可以用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当时的这些思想观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证明是可以分析的,我们不可照抄照搬。

毛泽东指出:一九五七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四大”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因为过去打仗,五大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

造),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这种从容的辩论形式不能产生。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毛泽东认为,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民主生活,“三查三整”(“三查”,在地方上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军队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

毛泽东论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的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

(二十三)《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节选: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

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0—481页）

（注：原文中“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在部分版本中表述略有差异，此处按通行版本整理。）

评注：本文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本文中，延续了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的思想。指出：许多人对“四大”形式主要有两怕：一个怕乱，一个怕下不得台。我们应当相信人民中间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是好人。毛泽东认为，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我们的同志，“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毛泽东当时的这些思想观点，同样是可以分析的，不可照抄照搬。

应当指出：毛泽东希望通过整风运动，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其主导思想是正确的，可取的。

二、刘少奇论反对官僚主义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通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在职工运动、白区工作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在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外交工作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少奇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写下了大量的文章、文件、电报、书信，并作了很多重要的讲话。我们将《刘少奇选集》上下两卷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精辟的论述辑录出来，将《红旗》杂志发表的《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全文引用，加以述评。

(一)《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节选：

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

义,我党的组织和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

但我着重地指出,空谈主义不存在于支部中,不存在于那些正在公开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与汉奸斗争的同志中,而严重地存在于我党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我所指的,是这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的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谈的领导方式。因此,我特别要求各省、县、市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提高自己的警觉,特别虚心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方式与领导方式。在这里,我们不能容许用“空谈主义”去责骂支部与担负群众工作的同志。

.....

我还要求我们的同志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去把目前的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详细研究清楚,这也是使我们的工作进入实际的第一步。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我常奇怪,为什么新的决议与策略到北方来毫没有引起同志的争论与怀疑,但这不能证明在同志中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我看到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去骂别人的文章,却对于新策略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很明白,这些同志是用官僚主义与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我们不反对而且欢迎同志们对党的文件和决议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论,及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等。对于实际工作的争论更是容许的。只要不把这种争论又变成空谈,对于党的工作是有益处的。

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谈。然而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是要我们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

式,要我们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41—45 页)

评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原载中共河北省的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八期,当时署名 K·V。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着重论述了空谈主义及其危害,同时论及有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用官僚主义与空谈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的决议,不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不会把决议和文件拿到各种环境中去运用。

刘少奇在文章第一段就尖锐地指出:“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紧接着在第二段中又指出:空谈主义不存在于基层支部中,不存在于公开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与汉奸斗争的同志中,“而严重地存在于我党高级和中级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中。我所指的,是这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同志的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谈的领导方式。”

有的领导同志写的一些带指示性质的文章、信件、工作报告、政治报告特别长、重复、乏味,而内容非常空泛与不清楚。指示与文件公式化、刻板化。基层干部中存在着不同意见,应该欢迎他们争论,提出疑问。然而我们的领导同志除开翻来复去地骂这些同志是“机会主义”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来。当时环境下党的工作需要反对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然而在许多地方的领导同志中,象念佛经中的“阿弥陀佛”一样,把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诚心空谈千遍之后,自己还没有懂得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等等。这就是空谈主义的表

现。

空谈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也脱离党的决议和文件。我们党的一些高级和中级的领导同志,正是用官僚主义和空谈主义的态度去责骂基层支部和担负群众工作的同志,去对付党的决议。这是不能容许的。刘少奇要求我们的同志“少去责骂下面,多去帮助下边”,要用一番功夫去研究党的决议和文件,去把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详细研究清楚。他指出:“我常奇怪,为什么新的决议与策略到北方来毫没有引起同志的争论与怀疑,但这不能证明在同志中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我看到满纸拥护新策略并用新策略去骂别人的文章,却对于新策略没有任何真切的了解。”于是他得出如下结论:很明白,“这些同志是用官僚主义和空谈的态度来对付党的决议。”

关于对待党的决议,刘少奇主张:不需要同志们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欢迎同志们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论,及提出疑问,要求解释等。只要不把这种争论变成空谈,这对于党的工作是用益处的。这也体现了刘少奇一贯倡导的民主精神,而官僚主义和空谈态度是同这种民主精神相背离的。

(二)《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一九三七年五月)

节选:

党和群众的关系

为了争取与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

命的战场,我们必须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正确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学习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必须分别清楚领导党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根本不同,党内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实际的了解,那我们就不要去幻想组织和领导千百万群众。

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建立呢?

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要使群众认定我们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并自愿地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就需要我们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和正确地争取群众的工作过程。

我们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

我们要求群众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我们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

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当我们是多数时,方能要求反对我们的少数服从我们的意见。

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

我们是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提出主张和办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自动地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

这些,就是党员和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然而,我们有许多同志却对此不甚了解或不愿意了解。有这样一些同志,他只要求群众服从他,而他可以不服从群众,不尊重群众;他自以为群众领袖是可以自称的,是可以由党的决议任命的;他甚至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取消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破坏群众团体民主原则。这种错误,大大地妨害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在我们党的周围。

另一种错误,是作群众的尾巴。当着群众拒绝我们的正确意见时,我们就悲观失望,表示没有办法,不去耐心地进行说服工作,解释我们的主张,启发群众的觉悟,反而接近群众的错误思想,作群众的尾巴。

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国民党侮辱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权利,命令和压迫群众。而我们则同国民党相反,群众就自然愿意亲近我们,抛弃国民党人,而举我们的同志为领袖。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59—60页)

党的转变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及其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才是唯一的保障。

(一)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

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

.....

(二)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地分开。党内一切工作与组织状况,比以前更应秘密些,不应该使同志互相知道,尤其是公开工作的同志。

.....

(三)在可能条件下,应该扩大党的民主。如领导机关多与同志通信,多征求同志对自己领导的意见,多取讨论的态度去实现指导等。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用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党内的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还严重地存在着。这表现在不从政治上原则上去彻底解决一切问题,而采用组织手段与纪律去解决一切问题(有些人甚至离开纪律,就不解决任何问题),表现在领导方式上的过分机械与绝对。这是一种极不民主的习惯。一切问题要从政治上原则上去解决。只有在政治上原则上解决以后,组织手段与纪律的采用才是对的。纪律在党内是必要的,应加强——但要在最后的时候去采用。

加强纪律,是提高同志服从多数、服从组织的精神,而不是要指导机关经常用纪律去制裁同志。相反,指导机关制裁

同志愈多,就表示那里党内的纪律愈坏。

党有纪律,不表现在不许同志向党内发表不同意领导机关的主张,而表现在同志虽有不同的主张,还能在行动上服从多数与执行领导机关的决定。

我们党正因为有这种铁的纪律,才能使奸细很难破坏我们。惩办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帮助奸细的。

.....

(四)过去在思想斗争中随便去打击同志,加同志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因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而随便撤销工作,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使许多同志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发表出来,这就掩盖了同志中在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也就不能克服这种分歧;这样只能造成党内表面上的一致,妨害了政治上、原则上、思想上真正的一致;这样并不能减少同志与领导机关对立的现象,反而使这种对立加深加多。同志们就不会去帮助领导机关的领导,他们会挑领导的岔子。这样,无原则的斗争又有了基础。

.....

(五)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训练出大批的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是党的中心工作。各地方要特别注意选择干部来受训练。

.....

(六)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还是应该建立党团。.....

(七)我们同志那种忙乱无章的作风,应该改变。应该抓住各时期中心的工作,分别各时期各种工作的轻重缓急,有秩序地去工作。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

上真正的务实精神，才能切实推动工作与革命。我们同志对于一件工作想清之后，就应有抓紧这一件工作干到底的精神。只有革命精神与务实精神的结合，才能肃清空谈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八)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彻底转变，虽然最近我们在宣传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

(九)最后，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表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我们的某些干部中它的毒很深。

.....

(选自同上，第 64—71 页)

评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是刘少奇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全文共十一部分，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的是其中的四个部分。

刘少奇指出：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其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与我党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决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和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为了肃清这一传统于每一具体工作中，就需要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的创造，需要党的组织工作的全般转变。

为了争取与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必须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正确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学习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

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刘少奇强调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领袖和先锋队的地位不是自封的,不是由法律规定的,不是由党任命的,而是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群众认定的。我们不是在组织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我们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的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只有我们尊重群众和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和信任我们。我们是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提出主张和办法,使群众自愿地接受,自动地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以上就是刘少奇概括的党员和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这些论述体现了高度的民主精神,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贯彻和具体化,也是我们克服官僚主义的思想武器。

刘少奇又指出:在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要防止另一种错误,即作群众的尾巴。在当时,“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我们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国民党侮辱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权利,命令和压迫群众,而我们党则同国民党相反。

在党的转变问题上,刘少奇指出:“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

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及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才是唯一的保障。”他从九个方面论述党的转变,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号召全党同志用马列主义把头脑武装起来,克服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一切错误,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他提倡在可能条件下,应该扩大党内民主。认为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计较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要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刘少奇提倡的党内民主和民主精神,对于每一个干部,特别是负责人员改造自己,克服官僚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他提出应该改变忙乱无章的作风,要抓住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分别轻重缓急,有秩序地去工作。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上真正的务实精神。“只有革命精神与务实精神的结合,才能肃清空谈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九三九年七月)

节选:

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

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

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大家都无例外地需要进行上述各方面的修养。但是,由于我们党员的政治觉悟、斗争经验、工作岗位、文化程度、社会活动的条件,都各不相同,所以,各个同志需要特别注意修养或者着重注意修养的方面,也就会各有差别。

在中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但是,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须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

实践。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这就是说,我们要虚心地倾听同志们和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仔细地研究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细心地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根据这些去检验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是否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否正确,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而加以纠正,去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根据新的经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个别结论,在哪些个别方面,需要加以充实、丰富和发展。总之,我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这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08—110 页)

评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一九四三年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一九六二年经作者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本人连同这部名著均受到残酷迫害和蓄意诬陷。这部名著被错误地诬陷为《黑修养》。一九八一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选集》将其收入上卷,使这部名著得以同广大党员和群众见面。

这部名著共九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论及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

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就需要进行七个方面的修养。其中的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运用这种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等,无疑包含着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谋利益,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做人民的“主人”,不搞特殊化,不蜕化变质,不享乐腐化,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的内容。这自然也具有反对官僚主义的意义。

他列举唯心主义的修养作为反衬,指出:我国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我们必须结合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去修养和锻炼自己。

共产党员进行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去压迫被剥削者,也不是为了将来好提高自己的地位,夸耀自己,使自己成为有名的人物,更不是为了做官当老爷,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

刘少奇不仅概括了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内容和目的,而且阐述了修养的方法。这就是结合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进行修养和锻炼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

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是不相容的。

(四)《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

(一九四一年)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是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一年在华中局党校的讲演，系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而成，这次公开发表，节略了重复的语句，调换了一些引文。

本文根据我国和我们党内的实际情况，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考察和分析民主问题和官僚主义问题，提出和论证了如何正确处理党内关系、人民内部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刘少奇同志说：“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甚至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这不仅对于当时党的建设和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包括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全文：

我们现在的革命叫民主革命，政府叫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干事情都要讲个民主；但是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民主？“民主”这个名词在外国话中叫做“德莫克拉西”。我们看到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即两个

资产阶级革命的宣言中，一开始就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是生而平等的，接着说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由人民统治，由人民享受，也就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即是说，人民都有最基本的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等等的自由权利；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提倡的民主内容。

同志们知道，民主有几种。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不仅在形式上不相同，而且在实质、内容上也不相同的。资产阶级民主有资产阶级的内容与形式，无产阶级民主有无产阶级的内容与形式。

资产阶级在许多地方讲平等与人民的权利；但是却可以容许绝对不平等的经济地位。资产阶级有几千万几万万财产，而无数千万的人无衣无食是不管的。国家社会是建筑在经济结构上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人们在经济上不平等，于是形成其它一切方面的不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虚伪的，实际上仅仅保障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际内容。

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同，不仅要求法律上、政治权利义务上的平等，而且——这是最要紧的——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要求资本的取消，私有财产的消灭。俄国十月革命时，有一条法律：“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法律把经济上的不平等取消了，大家都要做工，不做工的就没有饭吃，不管你有多少钱。有了经济上的平等，于是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法律上、教育上及其它各方面都有了平等。

资产阶级除了允许经济上不平等，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

也有限制的(现在的法西斯蒂则根本不要民主),特别有民族的不平等,如美国讲平等,但对黑人就不平等。此外还有信教、男女的限制等等。而无产阶级的民主则打破了这一切的界限。只有无产阶级民主,才是彻底的民主。这是内容上的不相同。

除了内容上的不相同以外,形式上也不相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形式,比如议会制度,一面讲民主,一面欺骗人民。只有无产阶级民主,才真能吸收广大劳苦群众,来参加国家管理。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为镇压反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规定反动的剥削阶级没有民主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全体人民除了真正享有言论、信仰、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权利以外,还有工作权、休息权、教育权等。这只有打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后,才可能的。

现在来讲民主精神的问题。

民主精神是什么?就是平等精神。资产阶级口里讲民主,实际上不能实行民主。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实行真正的平等。我们革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压迫或剥削另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侮辱另一个人的人格。如果我能剥削你的劳动,而你只能甘受驱遣,这就是不平等,也是没有民主精神。

但是,人的自然本质是不相同的:有智力发育上的差别,有长得高大的与矮小的,有力气大的与力气小的,有男人与女人。各人有各人的特殊情况,这是先天造成的不相同。而且因为人们社会地位、社会环境不相同,于是社会上有分工,有职务事业的不相同,职权的不相同。如我们军队中有指挥员,有战斗员,有高级指挥,低级指挥。他们在职务与职权上是不

相同的：指挥员要指挥，战斗员要听指挥。党内有负责人与非负责人，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但不管有先天的不同，有工作上、职务上、职权上的不同，大家在基本上是平等的。人权上没有什么不平等。司令没有权利去打人骂人，或剥削另一个人，要不然就是违反了民主精神。对待人民，包括外国的人民，包括本国少数民族的人民，如果我可以去打他，叫他替我做事，这就是没有民主精神。在中国，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历史，好象是男人高一等，女人低一等：男人可以打女人，女人不可以打男人。当然，我也不赞成女人去打男人。但社会上似乎认为男人打女人是应该的，这就是没有民主精神。又如我们在工作中，需要一个勤务员来帮助做一些事。但是如果以为勤务员要低我一等，那就是没有民主精神。勤务员除了帮助我做一些工作，除了职务上的不相同以外，他并没有丧失他的权利、义务与人格。我想，我们应当这样来了解民主精神。

我们来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样讲民主精神的。有一次，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他本来不打算讲话，因为在他之前，几位同志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很好，很中肯，“可是因为你们一定要我讲话，而权力又在你们手里，我就只好遵命了。”^①这就叫做民主精神。斯大林并不以为自己做了领袖，要讲就讲，要讲就不讲。

八路军与新四军是真正有民主精神的。在这个部队里，要分出官长与士兵并不容易。这是很好的精神，将来还要发展的。统一战线对有的干部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这些干部与同志不但不去发扬与保持我们的民主传统，而且故意要表示自己与人家不同。我们要去掉把自己爬得高高的，爬在人的头上的等级思想。这是反民主的，要不得的。等级思

想及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东西。希特勒就是这样的。民主精神在我们干部中间,有许多人不大够的,真的以为人家要比他低一等, he 自己是比人高一等的。不想到职务、职权的不同是临时的,今天要做做司令就有职权上的不同,明天不做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美国大总统华盛顿退职时,就退为平民。美国的资产阶级还能够这样的讲民主,但在我们党员中,却还要他退为平民、退为普通人就不满意的。知识分子中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做了大学生,就认为要比中学生高一等。在我们同志中并不是个个都能够真正深刻了解民主、具备民主的精神。能懂得民主,而且真正在工作中,以民主精神对待旁的同志、旁的党员的并不多。我们干民主革命,如果想要站在人民头上,那就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革出大批的官僚来了。因此,干民主革命,首先应该自己就具备民主精神。我们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实行民主,提高党员的民主精神,革去自己的不民主精神。这是我们干民主革命必要的。

然而,平等精神或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义。现在我们同志中,一方面表现民主精神有些不够,另一方面表现有些平均主义的要求,还有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否认组织性,否认我们队伍中有指挥者与被指挥者,否认党内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这种平均主义与极端民主的要求,并没有平等精神与民主精神。在现在条件下,人们的文化程度不同,能力不同,承担的责任不同,贡献不同,各人有各人的特殊性。所以有职务上的不同,待遇上的不同。有些人职务繁重,有勤务员,有马骑,吃得稍好一些;因为你工作多一些,苦一些,付出的心血多一些,必须有这不同,才能使他平等,要不然,倒是不平等了。平均主义否定职权上、待遇上的差别,主张极端民主,这是不对的。

但并不能因为有了这些不同,就比人家高一等,那是违反民主精神的。

民主精神的问题很重要。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我们与欧美经过民主革命及几十年民主训练的人民有些不同的。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结果弄成一个官僚。所以今天来讲一下民主精神很必要,在我们党内也必要。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甚至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

官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反面,没有民主的精神就是官僚主义。它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一种统治形式。官僚主义往往特别注重事物的形式,很多事情形式做得很象样,以便欺骗群众,所以剥削阶级都很要面子。要不然,官僚就做不成。

官僚主义不仅在剥削阶级队伍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在无产阶级国家也存在。特别当无产阶级的队伍及其政党成为当权的政党时,官僚主义也严重起来。列宁说:“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②在共产党内也有官僚主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些地方,官僚主义相当浓厚。我们被压迫阶级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从那里来的呢?列宁说:“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使它减少。”③“这根本不是法律妨碍了这一点,如在资产阶级时代那样;恰恰相反,我们的法律还促进了这一点。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

力。”④

我们党内存在官僚主义,是因为党内非无产阶级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更不够。官僚主义在今天存在,今后还会存在。所以要肃清官僚主义、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今天有许多人写文章写标语,要肃清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要肃清的,但一下子肃不清。斯大林说过:“关于官僚主义大家都谈得很多,因此没有必要再来多谈这个问题了。无论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合作社机关还是党的机关里都有官僚主义分子,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只要我们这里还有国家政权存在,还有国家存在,这个任务就会始终摆在我们面前,这也是事实。”“但是总要有个分寸。如果把反对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弄到毁灭国家机关的地步,弄到使国家机关威信扫地的地步,弄到企图把它搞垮的地步,那就是违背列宁主义,那就是忘记我们的机关是苏维埃机关,是世界上现有一切国家机关中最高类型的国家机关。”⑤把我们的机关和日寇、汪逆、顽固派的机关比较,那官僚主义要少得多了,而且性质也不同。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没有最后提高,国家政权还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没有消灭之前,官僚主义不能最后消灭。

为什么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文化程度不够,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寄托在群众的愚昧、落后那种情况上,以便于剥削阶级来统治群众,欺骗群众。群众的文化程度低,就有被欺骗的可能,官僚主义也就有可能存在。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较高,有些事情只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才能做,他就发号施令,于是官僚产生了。我从前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工作,判断

情况,告诉他们怎样组织、怎样斗争,斗争胜利了,大家都鼓掌,以为我帮了他们忙,把功劳放在我一个身上。这就是说,群众要把你抬起来做官僚,把你当成官僚来拥护你。我们懂得了一点民主,如果有群众要我们坐在他们头上,我们就自己走下来。但这要有民主精神的人才能这样干。有些人群众要他坐在头上,他就不下来,于是就成了官僚。当然,你做官僚做得不好,群众还是要反对你。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要提高民主精神,进行民主教育,这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撤职等只是治标的。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开展。在共产党员及干部中要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动督责自己和其他人,就可以不断防止和逐步克服官僚主义。

①《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2。

②《列宁全集》第32卷第7页。

③《列宁全集》第35卷第490页。

④《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2页。

⑤《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73页。

评注:刘少奇的这篇著名论文,是他一九四一年在华
中局党校的讲演,根据当时的记录整理而成。时隔三十九年,
即一九八〇年《红旗》杂志第14期重新发表了这篇论文。《红
旗》杂志为此写了简明扼要而意味深长的编者按语。

周恩来的著作中,有一篇最集中地论述官僚主义的论文,
即《反对官僚主义》(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的著

作中,也有一篇最集中地论述官僚主义的论文,即《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篇论文中,刘少奇如此尖锐地将两个对立的東西——民主主义和官僚主义对照起来,作出精辟的论述,直至一九六九年他含冤辞世时止,在以往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些论述也是他的领导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为此,我们特地将这篇论文和《红旗》杂志的编者按语全文辑录,加以评注。

刘少奇在论文中首先论述了民主的含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不仅在形式上不相同,而且在实质上、内容上也不相同”。资产阶级在许多地方讲平等与人民的权利,但是除了允许经济上不平等外,在政治上法律的平等也有限制,如民族、信教、男女的限制等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议会制度,一面讲民主,一面欺骗人民。无产阶级民主,不仅要求法律上、政治权利义务上的平等,而且要求经济上的平等。打破了民族、信教、男女的一切限制。全体人民除了真正享有言论、信仰、出版、结社、集会的基本权利外,还有工作权、休息权、教育权等。

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少数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人民大众的民主。

接着刘少奇论述民主精神。他指出: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我们革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压迫或剥削另一个人,没有权利去侮辱另一个人的人格。”人们在智力和体力上有差别,在性别、民族上有区分,社会分工不同,职务与职权不同,然而在人权上是平等的,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义务与人格。“我们应当这样来了解民主精神。”

刘少奇联系我们的民主革命讲民主精神。他指出：“我们干民主革命，如果想要站在人民头上，那就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革出大批的官僚来了。”干民主革命，首先应该使自己具有民主精神。我们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实行民主，提高党员的民主精神，革去自己的不民主精神。“这是我们干民主革命必要的。”

刘少奇划清了民主精神和平均主义的界限。认为民主精神不是平均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的文化程度、能力、责任、贡献不同，致使职务上、待遇上的不同，这才是平等的。平均主义否定职权上、待遇上的差别，主张极端民主，这是不对的。

刘少奇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强调民主精神的问题很重要。认为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结果弄成一个官僚。因此，“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甚至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今天，如果我们将刘少奇的这些精辟论述同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以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联系起来考察，那就会为他的远见卓识所叹服！

在论述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民主精神的含义之后，刘少奇对照民主主义，结合我国实际和党内实际，并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观点，集中地论述官僚主义。

刘少奇指出：“官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反面，没有民主的精神就是官僚主义。”它是剥削阶级社会的一种统治形式。剥削阶级用官僚主义的统治形式欺骗群众，要不然，官僚就做不成。这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普遍现象。

官僚主义客观存在着,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刘少奇指出:“官僚主义不仅在剥削阶级队伍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在无产阶级国家也存在。”比如: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些地方,官僚主义相当浓厚。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可以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使它减少。”只有法律限制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斯大林指出:“无论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合作社机关还是党的机关里都有官僚主义分子,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只要我们这里还有国家政权存在,还有国家存在,这个任务就会始终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压迫阶级队伍中,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从那里来的呢?刘少奇当时作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党内存在官僚主义,是因为党内非无产阶级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更不够。官僚主义在今天存在,今后还会存在。所以要肃清官僚主义,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

党内非无产阶级影响很大。显然指的是官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刘少奇在这里没有展开论述。我们可以参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七部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来加深理解。

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更不够。刘少奇把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克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论

述。他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文化程度不够，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寄托在群众的愚昧、落后那种情况上，以便于剥削阶级来统治群众，欺骗群众。群众的文化程度低，就有被欺骗的可能，官僚主义也就有可能存在。一部分人文化程度较高，有些事情只有文化程度高的人才能做，他就发号施令，于是官僚产生了。”这一分析既通俗易懂，又十分中肯。

如何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呢？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没有最后提高，国家政权还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还没有消灭之前，官僚主义不能最后消灭。”他又指出：“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开展。在共产党员及干部中要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平等精神，以民主行动督责自己和其它人，就可以不断防止和逐步克服官僚主义。”

诚如《红旗》杂志编者按语指出：刘少奇的这篇著名论文，“这不仅对于当时党的建设和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包括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评价是公正合理的，实事求是的。

(五)《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 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节选:

今天来说,对我们最要紧的,是如何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我们的将来,只有从现在就加以准备,只有从现在发展下去。要把我们现在的工作,今后两年的工作,与将来的反攻斗争,战后新中国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要在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的观点上,同时也在准备将来、准备反攻与战后新中国斗争的观点上,来进行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除开华中局扩大会议所说到的一些以外,我现在特别就准备反攻与战后斗争的观点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如果在根据地内很好地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等,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具有新中雏形的政治意义,足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的话,那末我们就要下决心,务必在今后把民主政治、“三三制”等切实推行,非达到可能的高度不可。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缺少民主的训练,对于民主政治的精神、实质及方法,党内党

外多数的人都是不大懂的,因此,我们的民主没有充分见之于实际。政府机关中,以及部队与民众团体中,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作风还极端严重。不少的干部是站在民众之上,而不是站在民众之中;他们是以人民的上司自居,而不是以人民的勤务员自任;他们是越权垄断包办一切,而没有尽到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他们自以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是听命于人民、以民意为依归(不要与尾巴主义相混淆)。这些现象,是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民主政治生活很大的障碍。不肃清这些现象,要根据地内组织很好的民主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根据地内领导政权许多年,还不能建立一种象样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在全国人民中、在战后再来谈民主政治,那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以至对民主政治的怀疑,以为只是在口头上叫的而不是在实际上实行的。而且这也绝不能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群众。

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我们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民主的教育和锻炼的缘故,是党风不正、宗派主义严重存在的缘故。只要我们有很好民主的教育和训练,整顿党风,有这种毛病的党员,大多数是能迅速改正的。因为他们愿意学习与进步,但必须经过认真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才能改正过来。

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内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应该指定同志去研究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法国的、美国的、孙中山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研究各国的宪法,写出必要的文章、小册子及教材。我在华中局讲的《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等,也可拿到党员干部中去讲解和研究。要号召我们同志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

精神,学习民主,在各阶层人民中去运用民主,并总结各地实行民主的经验来教育党员与群众。还须制订出一些关于民主的法律(如各级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代表会议的规则,处理各种案件的手续等),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员的办法等。在党内、对于违反民主的党员,要进行批评、斗争或处罚。在人民中也应进行广泛的民主教育,解释各种法律等。各级宣传部教育科,应在关于民主的研究及宣传教育工作中进行必要的努力,多写文章、小册子,多到各种会议上去作报告。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同志,各级领导同志,更须加紧对民主的学习、修养和锻炼。总之,我们要下一个决心,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真正地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

第五,……

第六,……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23—232 页)

评注:一九四一年五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一九四二年调党中央工作。本文是在回延安途中,根据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精神,写给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等一封信的后半部分。就如何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准备反攻和战后新中国斗争的观点提出了六点。其中第四点,结合推行民主政治和“三三制”问题,论及进行民主教育和反对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吸引全国人民赞成党的主张,反对顽固派,巩固根据地内人民和党的联系。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成员的组成,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故称“三三制”。

刘少奇指出:如果在根据地内很好地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等,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是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的话,那末我们就要下决心,务必在今后把民主政治、“三三制”等切实推行,非达到可能的高度不同。然而,“政府机关中,以及部队和民众团体中,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作风还极端严重。”

接着,刘少奇论述了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作风极端严重的表现和原因。

其表现在于:“不少的干部是站在民众之上,而不是站在民众之中;他们以人民的上司自居,而不是以人民的勤务员自任;他们是越权垄断包办一切,而没有尽到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他们自以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听命于人民、以民意为依归(不要与尾巴主义相混淆)。”显然这些表现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上述表现或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由于我们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民主的教育和锻炼的缘故,是党风不正、宗派主义严重存在的缘故。”当然也包括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缘故。

鉴于我国剥削阶级长期实行官僚专制的传统,鉴于人民群众文化程度不高,以及我们的党员在群众中缺乏民主的教

育和锻炼的实际,刘少奇十分重视进行民主教育,反对官僚主义。他指出:“我们必须在党内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应该指定同志去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苏联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研究各国的宪法,写出必要的文章、小册子及教材。他在华中局讲的《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等,也可以拿到党员干部中去讲解和研究。要号召我们同志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民主。这还不够,还须制定出一些关于民主的法律,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的官员的办法等。“总之,我们要下一个决心,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真正地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

联系我们党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刘少奇本人和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遭受的冤屈,我们今天重温刘少奇关于民主精神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倍感亲切和深刻。

(六)《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四月)

节选:

对于妇女工作,我是外行,过去工作情形也不大清楚,所以无话可谈。但从一般群众运动(其中包括妇女运动)的做法

来看,过去是否有不妥之处,因此影响工作成效呢?从这方面我可以说几个问题。

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在这里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

.....

第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区、敌占区的群众运动方针问题。这三种地区情况不同,方针也不同,这是大家口头上一致承认的,但到实际工作中就模糊了。.....

第三,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过去工作中,有些同志群众观点不够。我们是一切为了人民,是人民的勤务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人民服务。妇女工作者为妇女群众服务,但一下子就要替二万万人民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从几个村子、几个妇女着手。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应该建立起来。大喊大叫,装模作样,口号喊得高,样子装得象,但没有为人民做一点实事,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吧!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只要你做好事,就会拥护你。人民养活了我们,要我们为他们办事,但我们有些同志不老老实实替群众解决问题,想这样,想那样,还闹别扭。现在各根据地,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干部有几十万,做了许多的工作——建立政权、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但还要在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

群众观点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群众路线。劳苦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早已指出,不是依靠英雄、豪杰、皇

帝、神仙来解放人民，完全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但我们有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总站在群众之上去“解放”群众，这是恩赐观点，剥削阶级观点。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不是英雄创造的。因此，妇女解放也要妇女自己起来。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就是因为群众自己没有起来。

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这是一种官僚主义，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表面看来，雷厉风行地执行党的口号与决定，但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等候群众觉悟，不知道怎样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他们犯急性病，强迫命令群众去执行。因此，一切变成形式。办合作社，就摊派股金，代农民做好每户计划，但是农民则把它倒贴门上；变工也强迫，开会也变成老百姓的重大负担。因此人民中有所谓“日伪那里罪多，国民党那里税多，共产党那里会多”的严正批评。命令主义就是没有群众路线。

我们对群众要强调自动自觉，任何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自觉是搞不起来的。我们做群众工作，不要以群众解放者的资格与群众见面，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们觉悟比较高，有理论，可以把群众的经验提高一步，转而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能否解放，决定于群众自身的觉悟程度。敌人之所以能够压迫群众，除了敌人自己的力量以外，也由于群众自身的落后和没有组织。如果群众觉悟提高，就会自己起来争取解放。在群众现在经验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教育群众，一天一天地提高群众，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法。我们的革命作风，我们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步骤，都要能够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是强迫命令群众革命化。群众如

果不发动起来,我们任何革命事业都是干不出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群众的自觉与自动。

第四,必须有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服困难的革命工作精神。真正发动群众自觉是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阻力,要长期忍耐地工作,要采取许多适当的步骤。如果今天搞一下,明天又不搞,事情就办不起来。这就不是群众革命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革命性不够的问题。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07—312 页)

评注:本文原题为《总结妇女工作的几个基本认识》,一九四九年由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入《中国解放区妇女运动重要文献》。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时略有删节。

刘少奇的这篇讲话,结合根据地的妇女工作,讲了四个基本认识问题,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反对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

刘少奇在第一个问题中,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思想路线。他指出:“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做妇女工作,首先要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在过去工作中,不认真地去了解对象,不懂得从实际出发,不知道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是一个缺点。

在第二个问题中,论述了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区、敌占区这三种地区情况不同,方针也不同。正确方针的制定,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基础上的。

在第三个问题中,集中论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紧扣着论及反对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

关于群众观点。根据刘少奇的论述顺序,可概括为如下四个观点:

第一、“我们是一切为了人民,是人民的勤务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人民服务。”人民养活了我们,要我们为他们办事。要在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

第二、“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不是英雄创造的。”劳苦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依靠英雄、豪杰、皇帝、神仙来解放人民,完全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

第三、“我们做群众工作,不要以群众解放者的资格与群众见面,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们觉悟比较高,有理论,可以把群众的经验提高一步,转而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

第四,“群众如果不发动起来,我们任何革命事业都是干不出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群众的自觉与自动。”

这就是刘少奇当年对党的群众观点四个方面内容的表述。这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关于群众观点的表述,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是一致的。

关于群众路线。可以用刘少奇的原话完整地表述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都依靠群众,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刘少奇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这是一种官僚主义，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表面看来，雷厉风行地执行党的口号与决定，但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等候群众觉悟，不知怎样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他们犯急性病，强迫命令群众去执行。因此，一切变成形式。”

在第四个问题中，刘少奇论及必须有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服困难的革命工作精神。“要有革命精神，必须去掉‘爱面子’、‘逞英雄’、‘出风头’、‘怕批评’等坏东西。”这些东西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拿到群众中去，结果祸国殃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

总之，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违反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刘少奇的这篇话，正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好教材。

(七)《论党》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节选：

一、引言

.....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与革命政策，不但和中国民族与人民的敌人及一切违反中国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粉碎了党内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使它在和民族与人民的敌人斗争时十分坚决、十分勇敢，并且知道如何去打击敌人与如何避免敌人的打击。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党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有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活动，慎重地接收党员，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原则，都是为着领导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这些组织原则，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章起，就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内，经过二十四年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证明我们党的这些组织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我们的党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就保证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在斗争中的行动一致，以及各种艰难困苦的克服，并领导人民获得伟大的胜利。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15—316 页)

二、关于党章的总纲

.....

第一,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

.....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

.....

第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同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帜。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

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

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是还没有的。但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此外,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塌,老一套,安于现状,任其自流,丧失上进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群众前进进一步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

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处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布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错

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简单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并会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属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而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分，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正确地到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某些部分的暂时的不协调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却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

治路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是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

.....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

(选自同上,第 342—354 页)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

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

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事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领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

(选自同上,第356—357页)

五、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

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党员中必须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

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

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选自同上,第358—359页)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

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从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发展。因此,党章中有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

规定。

(选自同上,第361—362页)

评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一九五〇年一月经作者改名为《论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九部分,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的是其中一、二、五部分。

刘少奇在第一部分,即引言部分,总结了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过去的二十四年的英勇奋斗中,特别在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中,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打出了无限的光明。

刘少奇对于获得伟大成就的原因表述如下:

一、“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政策。

二、“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党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两方面的原因中,论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具有反对脱离群众、脱离

实际、独裁专制的官僚主义的含义。

刘少奇在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总纲部分，就党的基本纲领论述了四个问题，即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

在关于党的群众路线中，刘少奇集中地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依次批判了违反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命令主义、尾巴主义、自流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

刘少奇指出：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才可能获得彻底解放。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必须在各方面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群众先锋队的应有职责，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犯尾巴主义、自流主义错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犯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错误。

此外，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在这里,刘少奇把官僚主义的表现作了高度的概括。我们把刘少奇的概括,同周恩来论《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论及的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结合起来考察,就可以对官僚主义的表现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会提示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对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的确是十分有害的、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长期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

军阀主义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是紧密相联的。它破坏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党群关系。因此,它对党对人民是十分有害的,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刘少奇进而分析了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在党内产生的原因: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分,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我们应经常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免这些政治灰尘、政治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为了贯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七大党章强调地指出了四个群众观点: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

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就是刘少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党的群众观点的高度概括。

在论述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时,刘少奇结合中国实际和群众运动的一般情况,论及必须照顾群众的多数的问题。

他指出:“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必须照顾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当时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中国的工人阶级如果看不见中国农民,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那就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刘少奇作了如下归结:

“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

刘少奇在第五部分,即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部分,集中地论述了党的组织原则,即民主集中制。同时,批判了党内生活中的两种极端现象,即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

他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

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党的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真正的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和严防这两种倾向。

刘少奇还引用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为此,七大党章上作了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

显然,建国以来,小生产的家长制的传统作风,仍然是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作了明确规定,重申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在党委会内,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委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重大问题应由集体讨论决定,不得由个人专断。

总之,刘少奇在本文引言部分,关于建党二十四年以来取得伟大成就原因的论述;在党的总纲部分,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论述;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部分,分析和批判了违

反民主集中制的专制主义、极端民主化和家长制等等,这对于克服和御防官僚主义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八)《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节选:

“五四指示”后,一年多来各解放区都进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发动了广大群众。一般讲,运动得到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不彻底,即使比较彻底的地方也还有若干毛病。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有以下三个:(1)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2)党内不纯;(3)官僚主义的领导。

首先分析第一个原因,即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
.....

第二,党内不纯。.....

第三,官僚主义。从现象上来讲,最严重、妨碍群众最大的,就是那种“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还有一种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连孔夫子都反对,我们还能不反对么?那种“雷成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不发动群众,不启发群众,不等群众觉悟,而站在群众头上,命令群众,这是不允许的。为“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是错误的,不能鼓励,不能批准,不能撑腰。愈奖励愈来强迫命令,愈是“完成任务”,那就不得了。官僚主义是地主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反映到无产阶级的政党里来,一些党员受了影响。还有,无产

阶级、劳动群众的觉悟和文化程度不够,使那些官僚主义者能利用群众的弱点,钻空子来整群众。所以,领导机关要小心,不要看见形式上完成任务就奖励,那样可能上大当,奖励了官僚主义。奖励官僚主义的人,也是官僚主义。今后不仅要是否完成任务,还必须考查是怎样完成任务的。官僚主义与党内不纯是相联系的,党内不纯则官僚主义更厉害。有些官僚主义者,是以国民党的方式来统治群众。工农分子搞官僚主义,是受了地主富农的影响,要教育批评,必要时处分,处分也是为了教育。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85—387 页)

评注: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进入晋察冀解放区,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并作了报告。这是在会议上所作结论的节录。结论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概括地分析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论及反对官僚主义问题。

刘少奇指出:“五四指示”后,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一年多来各解放区进行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发动了广大群众,取得很大成绩,但大部分地区搞得不彻底,其原因有三个:(1)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2)党内不纯;(3)官僚主义的领导。分析第三个原因,即分析官僚主义的领导是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之一。

刘少奇指出两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一种是“雷厉风行”强

迫命令的官僚主义。这是最严重、妨碍群众最大的,站在群众头上,命令群众的官僚主义。另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我们对于两种形式的官僚主义,都要反对。

官僚主义的产生或存在的条件,刘少奇作了这样的分析:“官僚主义是地主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反映到无产阶级的政党里来,一些党员受了影响。还有,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觉悟和文化程度不够,使那些官僚主义者能利用群众的弱点,钻空子来整群众。”接着他提醒领导机关要小心,不要看见形式上完成任务就奖励,那样可能上大当,奖励了官僚主义。而“奖励官僚主义的人,也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与党内不纯是相联系的,党内不纯则官僚主义更厉害。

如何去反对官僚主义呢?刘少奇提出:“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有了彻底的政策,有了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又有了好办法——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办法,土地改革就一定能够进行到底。

刘少奇对官僚主义的上述分析,对于今天的党风和廉政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九)《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节选：

新闻工作很重要，党很重视这个工作。党历来的文件、书刊都曾说明党报的重要性。《联共党史》说了党报的重要性，说明它组织和团结了群众，起了指导革命的作用，而且说它是“中心”。俄国在创立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列宁认为，要首先搞清思想界限，宣传党应该如何建设，方针是什么，路线是什么，然后再来建党。原则问题没搞清楚，建党建不好。如何把原则性的问题搞清楚？办报，办全国性的报纸，使报纸起中心一环的作用。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美帝国主义，我们是从来不怕的，原子弹，我们也是不怕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手无寸铁，就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分析的结果，知道它们要死亡的，无产阶级硬是要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从总的方面来说的。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因此，我们到处宣传这一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宣传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和群众密切联系，而且不断地巩固扩大

这种联系。现在,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

我们所说的和人民群众联系,主要是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而且我们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一天也不能中断,叫做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

这是讲联系群众的重要性。那末,怎样联系群众呢?怎样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呢?

列宁说,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是的,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军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人民代表会、合作社等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没有这些桥梁,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断了,党和人民之间就有了鸿沟,因此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

报纸要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坏影响,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因此,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97—398 页)

评注：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为了改进和加强新闻工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进行学习。这个谈话是在这次学习的集会上发表的，通常称为“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本谈话联系党的新闻工作，论及党群关系，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刘少奇指出：新闻工作很重要，党很重视这个工作。党历来的文件、书刊都曾说明党报的重要性。它起着组织和团结群众，指导革命的作用，是党联系群众的中心一环。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象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之子，所向无敌。他在同对手搏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吸取力量，战胜对手。在一次搏斗中，对手盖尔枯里斯识破了安泰的秘密，他设法把安泰和大地隔开，举到空中，便在空中将安泰扼死。刘少奇引用了《联共党史》中提及的这个神话故事，告诫全党同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就会遭到安泰一样的厄运。

共产党什么也不怕。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当时有人说，联系群众已经够了，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刘少奇批驳说：这种观点和看法，“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我们党要时时刻刻保持和群众的联系，不断地巩固和扩大这种联系。

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新闻工作就是千

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同时把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反映出来,反映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刘少奇又提醒说:“报纸工作如果做不好,就是最厉害的脱离群众,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

(十)《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节选:

.....

在去年四月二十日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开始向南方和西北进军以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已解放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包括有三万万以上人口的地区。我们占领的地区是这样大,各项工作极其繁重和复杂,有经验的干部不足,大批的新干部吸收进来,加上没有时间进行整训,因而在工作中伴着伟大成绩而俱来的,就是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们必须全面地看问题,工作的成绩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干部的艰苦努力和干部中发生的毛病,我们都应当看到,而不可对于任何一方面估计不足。现在全国人民都称赞我们的成绩,但同时要求我们改正已经发生的缺点错误,我们就应当正视这些缺点错误,并加以改正。中共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要整训工作干部。在进行了这些步骤以后,我们相信,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过来的。

错误中最严重的是命令主义的错误。我们有相当多的干部,他们也是为了完成国家和党给予他们的任务而斗争,这是好的,但是他们不讲究执行国家的和党的政策。他们不是在严格遵循国家的和党的政策的限度内去完成国家和党给予他们的任务,而是采取一种粗暴的方法去进行工作,不去注意具体的情况,不顾及事实上是否可能,不肯虚心地和当地人民商量,只是简单地去完成任务,结果,任务是完成了,人民却受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种命令主义作风,在征粮、税收和推销公债等项工作中已经表现得相当严重,已经引起许多人不满意,如不加以纠正,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不久以后,我们就要在广大的地区内进行土地改革,如不争取时间整训干部,土地改革工作也就难于做好。

关于我们干部中这种命令主义的错误作风,中共中央历年都有指示着重纠正,但是,即令在多次纠正之后,又可以发生。现在共产党有了四百多万党员,其中有将近二百万人只有两年半、两年、一年或者几个月的党龄。在政府机构中,在最近一年多中接受了大批的旧人员从事工作。在这种完全新的情况下,就要求我们立即开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训工作,首先是整训干部的工作。主要的是总结工作,纠正命令主义的作风,其次是纠正其他的错误和缺点。

同志们!如果我们的工作作风更好一些,我们的缺点错误更少一些,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那末,我们就能更好地团结全中国的人民,就能更高地鼓舞全国人民的热情,就能增加人民更大的力量,就能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快地渡过目前的困难和创造美好的将来。而这一切,就正是我们在庆祝今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所要求达到的目的。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3—24 页)

评注：本文是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的演说，原载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论述了当时中国经济和工业发展的五个基本条件，所面临的六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第六个方面的任务是：认真地纠正缺点错误，整训干部。

自 1949 年 4 月 21 日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开始向我国南方和西北、西南进军，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放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在广大的解放区，各项工作极其繁重和复杂，有经验的干部不足，大批的新干部吸收进来，加上没有时间整训，因而在工作中伴随着伟大成绩而俱来的，就是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指出：“错误中最严重的是命令主义的错误。”我们有相当多的干部，虽然为完成国家和党的任务而斗争，但是不严格遵循国家和党的政策，采取一种粗暴的方法去进行工作，不注意具体情况，不肯虚心地和当地人民商量。命令主义也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之一。命令主义作风在征粮、税收和推销公债等项工作中表现得相当严重，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如不加以纠正，我们的干部就会脱离群众。因此，整训干部，纠正命令主义作风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工作作风好一些，缺点错误少一些，我们就能够团结和鼓舞全国人民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十一)《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日)

节选：

.....

在马列学院主要是学习理论,真正练习运用,还是要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工作岗位上能够运用理论,独立地处理问题和独立工作,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这就说明学习有了成绩。

理论不够的学理论,文化不够的学文化。此外,党性不强的,思想有毛病的,组织性不好的,也要来学习。要做到既有理论,又有文化,又不骄傲,思想好,作风正派,这样就能到处受人欢迎。有了理论,却很骄傲,看不起人家,动不动给人家扣机会主义大帽子,那人家就欢迎你。所以,你们虽然快毕业了,也要整顿一下思想。越是有理论有知识的人,越应该感到自己知道的少。要是学了点马列主义,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这就说明马列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学到。学到了东西,增强了信心,能够处理问题,坚持真理,批判错误,这当然不能叫做骄傲。

我们的同志作风要正派,有毛病的要把毛病去掉。自己应该认识到,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一切为了党 一切为了人民。应该彻底地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学了马列主义,就要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克服掉。党支部的工作、学院的工作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这里面也

包括怎样正确对待工作分配的问题。马列学院的学生要服从组织分配。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不能说这个地方不好,这个工作不好,我不去。也不能说我有了理论,比别人高,还给我这个事情做!

有些同志说,做理论研究工作自己能力不够。这固然不是骄傲,但说明信心不足。大家在马列学院学习了马列主义,要提高信心。怕工作搞不好而兢兢业业,努力搞好,这是进步的表现,可以使工作做好。但是必须有信心。能力今年不够,明年就够了,明年还不够,再搞几年就够了。没有说能力够了再去担负工作的。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51—52 页)

评注:本文是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的一部分。马列学院于 1948 年成立。其任务是比较有系统地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1955 年 8 月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76 年 10 月后称中共中央党校。

刘少奇在论述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时,论及克服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他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很好,但是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在马列学院主要是学习理论,真正练习运用,还是要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切为了党,一切为了人民。“学了马列主义,就要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克服掉。”中国共

产党如果没有很多的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样大的国家达到社会主义。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然要涉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在于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涉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学说,纲领、路线、宗旨、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等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是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要在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把这些坏作风克服掉。

(十二)《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

(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

节选:

.....

每一个生产的领导者应当坚决地支持先进生产者运动,支持每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先进经验和创造。这就是说,第一,他必须详细地鉴定、研究和总结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经验,以便确定它是可以推广和应当推广的,并且找出推广的有效的方法。第二,他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例如组织先进操作的表演、传授和训练,改进原有的设备、劳动组织和操作规程,研究人们不愿意学习先进经验的经济上、技术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并且加以消除,等等,以便实际地而不是空谈地推广这种先进生产者的经验。谁做的这些实际工作愈

多、愈好，他在推广先进生产者运动方面所得的成绩也就愈大。诚然，这是一个艰苦的、细致的工作，但是一个害怕做艰苦细致工作的人，是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的。

可惜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这样的一种领导者还是有的，这些人具有我们所说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必须跟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

妨碍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官僚主义倾向有几种形式。有一种人是实际上不满意或者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的。他们安于落后，把落后的技术和落后的定额当作先进的东西，或者是当作不能更改、至少是目前不能更改的东西。我们的不少的先进生产者已经跟这种人进行了斗争，用事实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的观点，使他们受到了教育。我们今后还需要继续反对这种倾向。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倾向。有这种倾向的人，口头上甚至主观上不但不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而且是热烈支持的，但是他们满足于空喊，满足于一般号召，满足于给先进生产者发奖旗，写访问记，满足于让先进生产者当这种或者那种代表，他们很少认真地为先进生产者创造条件，使之不断前进，很少认真地研究先进生产者的经验，认真地推广这些经验，他们不努力使先进生产者运动由个别的先进生产者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车间，由个别的先进的车间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工厂，由个别的先进的工厂前进到整个的先进的行业，反而使先进生产者有忙于应酬、脱离群众、不能继续提高、渐渐变为落后生产者的危险。我们必须纠正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表现，就是不关心职

工群众的切身生活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其中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的工人,国家机关中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合作社的农民,他们的劳动是为着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时是直接为着他们个人的利益。而国家的利益则是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每个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当然,把个人的利益跟国家和集体利益对立起来,离开生产的发展而追求生活的改善,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但是只注意增加生产,增加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不注意增加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是不正确的。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个人的收入,改善个人的生活,这是完全正当的和必要的。只有这样,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先进生产者才能获得巩固的基础。但是现在有些企业和机关的领导者只是片面地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却不注意按照可能和必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改善劳动者个人的生活,对于在生产上、工作上有卓越成就的人们,也不注意给予充分的奖励。这种倾向,无疑是必须坚决纠正的。

只有坚决依靠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领导者的共同努力,只有坚决克服领导工作中的各种官僚主义倾向,并且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把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使先进生产者运动得到普遍的持久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地提高。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98—200页)

评注：刘少奇的这篇祝词，原载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这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向出席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全国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所作的祝词。

他指出：“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为了发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推动我国的生产力达到更高水平，需要先进生产者、普通生产者和生产的领导者三方面的共同努力。

每一个生产的领导者应当采取两个实际步骤，坚决地支持先进生产者运动。

然而，有一些生产的领导者具有官僚主义的倾向，阻碍了先进生产者运动的发展，我们必须同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刘少奇列举了当时官僚主义倾向的三种表现形式：

一是实际上不满意或者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安于落后，把落后的技术和落后的定额当作先进的东西，或者当作不能改变，至少是目前不能更改的东西。

二是口头上甚至主观上不但不反对先进生产者运动，而且是热烈支持的。满足于空喊，满足于一般号召，满足于给先进生产者发奖旗，写访问记，很少认真地为先进生产者发挥潜力创造条件。

三是只注意增加生产，不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注意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者的个人收入。

总之，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破坏社会生产，对个人、集体和国家都是不利的。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十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节选：

.....

什么是我们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呢？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我们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它们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帮助他们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督促他们严格地加以执行。

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因为我们的国家同那些少数人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国家

相反,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保护官僚主义的。为了同官僚主义作有效的斗争,我们必须同时从几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除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经常检查各级政府中党组织的工作以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应当负责建立起对于有关的政府工作部门中党组织和党员的经常的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为了这个目的,应当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家的监察机关应当充分地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的处分。

目前国家工作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于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我们反对了分散主义,把许多应当由中央管理的事务集中到中央手里,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应当同地方商量的事也不同地方商量;有些部门还发出许多形式主义的公文和表格,给地方压力很大。这样,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

发展了官僚主义。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职权。根据这样的方针，现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地加以实行。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具有重要的意义。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48—250页)

评注：本文是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二月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第四部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首先论述了我国完全新式的国家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建国七年的时间内，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进而较集中地论述——“为了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进一步扩

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的论述已经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官僚主义,进到制度上和体制上的官僚主义。

他坦诚地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国家机关中,存在着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的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三个“严重妨碍”的论述,把问题提到了尖锐的程度。因此,他把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作为当时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

如何消除或克服官僚主义?

刘少奇认为,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组织机构,规定责任,改变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下层的办法;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此外,还必须同时从三个方面加强对于国家工作的监督: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

显然,刘少奇在这里着重从制度上和体制上论述消除或克服官僚主义。

刘少奇指出了“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他相信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能够逐步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劳动人民统治剥削者的工具；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的专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至今已有四十年。然而，这些深刻的论述，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十四)《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节选：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讲了这个问题。这些矛盾都基本解决了。那末现在什么矛盾是主要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讲，现在人

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有人说,今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那末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哪里?有的人大概是这样想的:我们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都在群众那里。如果这样想,我看就错了。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首先表现在我们党内。我们党内有很多问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争名夺利是无产阶级思想?评级的时候升了两级,还躺倒了不起来,是无产阶级思想?所以,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今天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大家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那末,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部解决,而且要首先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间解决。要把我们共产党干部中间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搞得少一点,越搞越少才好。因此,在我国今天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赶走、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内部,表现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中间。所以,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末,这个矛盾是不是有阶级性?当然有阶级性。非无产阶级思想中有农民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地主阶级思想。但是,那是反映过去这些阶级的思想,不是或者大部分不是反映今天的。今天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新的了,是合作化了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资本家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资本家了。如果我们讲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讲到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讲到资产阶级的思想,讲到地主阶级的思想,

那是反映过去这些阶级存在的时候的思想。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阶级性的问题,但是这些思想现在主要反映在人民内部。

有人说,今天在我国内,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如果说工人农民有矛盾的话,也应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工人阶级是人民,农民也是人民。而且今天的农民,刚才讲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已经在起变化而且基本上起了变化,已经是合作化了的新式农民。所以工农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刚才已经讲过,曾经有一个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以外,他们不反抗社会主义,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的。但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今天的上层建筑是什么?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这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你能说是敌我矛盾?今天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与分配关系。今天的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决定今天的分配关系。现在分配关系里面表现的矛盾最多了。那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内

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先进与落后，这也是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过去的上层建筑是反动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反动的生产关系。过去是反动阶级代表落后，而革命阶级代表先进。所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曾经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国内形势有了根本变化，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现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说，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矛盾大量或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表现在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那末，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就发生谁是敌人这个问题，是人民是敌人，还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是敌人？显然，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于人民群众与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可不可以这样讲：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所谓基本上，所谓一般说来，是除开了一种特殊情形，除开了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一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些同志，还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才好。不然就不好办。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查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义。说“我没官僚主义”的人，你不要相信他，恐怕那种人官僚主义还更多。当然，恶劣的、顽固的、与人民群

众完全对立的官僚主义者还是少数。但是某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已经引起人民反对的官僚主义,现在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多,在各个方面都有。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96—299 页)

.....

二

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虽然有些矛盾问题不在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因此人民群众跟领导机关之间的矛盾,现在是突出地表现出来,而真正的矛盾产生在领导机关犯了官僚主义。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矛盾就缓和了。即使群众中间有过高的要求,有不合理的要求,有错误思想,领导上如果没有官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当解释清楚,矛盾就不会紧张起来。

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不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看是大量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农民说工人分多了;小学教员说青年工人分多了;你房子住多了,我没有房子;评了你升级,不评我升级,这都是分配问题。我建议同志们要好好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例如整个国家的分配,积累占多少,消费占多少,军政费占多少,文教费占多少,这个工业部门那

个工业部门各占多少,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各占多少,还有小学教员分多少,青年工人分多少,干部分多少,等等。总而言之是个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3—304页)

.....

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地方在加强,但有的加强得不好,群众有很大的反感。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自己不作自我批评。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很有必要改善方法。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群众闹事中间提出的要求,我研究了一些,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是不能实现的。这一小部分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的要求,经过认真的解释,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也并不坚持。所以,群众是有相当高的觉悟的。当然群众觉悟不高的也有,但是经过解释,可以讲清楚。

群众闹事大体上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者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都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者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来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告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的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不闹事。因此,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

闹事的原因,据工人讲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叫说话不算数,合同不兑现。招工的时候答应了的,许过愿的,结果不能兑现。第二个是调动工作不讲清楚道理,不要的时候一脚踢开。有的劳动调配、人事部门就是采取这种办法。第三个是厚此薄彼,待遇不公平。就是刚才讲的对干部比较厚一些,对工人比较薄一些;对这部分人厚一些,对那部分人薄一些;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厚一些,对其他的人薄一些。还有一些工人的合理要求,领导机关长期不解决,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凡是要中央负责的,部里面负责的,局里面负责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对付闹事要有正确的办法。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有些同志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面,有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个观点,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有的领导人把本单位的群众看作是属自己管的手下人。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是管你们的,而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我有权力命令你们,你们没有权利命令我。”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想这个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这个观点,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观点、官僚主义观点。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

第二个观点，就是只去分清楚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不是讲人民内部问题的是非问题吗？分清是非，分清谁的是非呢？有的领导人只分清别人的是非，而不分清自己的是非。自己不分，别人去分他的是非，他又不准。他分群众的是非时，只讲群众非，说群众错了，群众还有什么好的地方，他就不讲了，抹煞群众中的是。而讲到自己，讲到领导上，就只讲自己的成绩，不讲自己的缺点，只讲自己的是，不讲自己的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就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这是很片面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首先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说群众中的不好，好的地方也要讲。这样才全面，人家才会服。

第三个观点，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群众中间闹起事来，他不是想尽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缓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而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起来。这是违背上面所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人民内部的事情应该缓和，应该妥协解决。

第四个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凡是群众中间闹起事来，有的领导人就去分群众的界线，问人家的动机，查人家的历史，当作反革命事件来处理。如果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这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当然，对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群众里面也有过分的，也需要教育，除开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以外，对于一般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还是应该从团结出发，经

过批评,达到团结。

.....

(选自同上,第305—308页)

评注:这是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时,第二部分有删节。

我们知道,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当时即在党内外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传达和讨论,后来经本人整理、补充,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部著作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列举并详细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阐述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重大意义,涉及坚决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

刘少奇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集中地阐述了两个问题:

第一、“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

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阐述这两个问题时,都提及官僚主义,贯彻着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

刘少奇在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第一个问题。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建国以后，主要矛盾转化了，帝国主义被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解决了。时至 1956 年底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刘少奇分析了以下五种关于主要矛盾的不正确观点：

1、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2、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3、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4、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5、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以上这些矛盾都不是公私合营以后的主要矛盾。然而，这些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内部，表现在共产党内部，表现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间。因此，这些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此外，人民内部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思想，有真理与谬误，有是与非。这表现在人民内部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认为，对于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部解决，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间解决。“要把我们共产党干部中间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搞得少一点，越搞越少才好。”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在人民内部，表现在共产党内部，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刘少奇在本文第二部分阐述了第二个问题。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分配不公,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对。

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起来就会闹事。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要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好,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进而,刘少奇对群众闹事的原因和对付闹事的办法作了深入分析。

刘少奇列举了工人中间关于闹事原因的几个方面的说法,然后作了总结:“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他紧接着又指出:“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下面也有责任。”凡是要中央负责的,部里面负责的,局里面负责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凡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关于对付闹事的正确办法,刘少奇首先分析了我们有些同志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四个错误的基本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党、政府、国家机关、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的公仆,社会的公仆,而有的领导人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

第二个观点,就是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结果是这样:非的就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

第三个观点,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这是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

第四个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把闹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处理。

以上观点,“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观点、官僚主义的观点。”

刘少奇当时感到各个地方,各个工厂、学校里面都积累了很多问题。他以商量的口气指出:“以后是不是可以每年集中解决一次或者两次,就是要群众提意见,要工人开小组会,学生、机关职员开小组会,号召他们把意见和要求都提出来。提出来之后,综合起来,集中解决。”

刘少奇在本文中所阐述的两个问题,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观点,如何看待群众闹事和对付群众闹事的观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服官僚主义是有启示的。

(十五)《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节选:

.....

一、目前形势和任务

国内形势

.....

基本经验教训

.....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初步看来，这就是：

.....

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的一切事业，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办得成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

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现“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保证建设，增加生产的一个根本方针。

.....

任务

.....

这里要着重说一说“精兵简政”的问题。这是当前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一九六一年我们进行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六二年还要大力进行这项工作。几年来，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人员增加过多，

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增加过多。很多县的县一级机关人员,都在五百人以上。国务院的有些部门,经过多次减人以后,仍然有四五千人之多。机构这样庞大,这样重叠臃肿,非生产人员这样多,这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很不利的,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痛下决心,切实地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裁并机构,精减机关人员,减少不必要的职工。党中央和国务院将重新确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编制,通令全国贯彻执行。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50—372 页)

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要坚持三面红旗,要更有效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要顺利地实现一九六二年计划和十年奋斗目标,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中央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

这里说的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党有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深厚传统。在革命的年代,我们党不断地集中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党的政策和工作沿着正确的

道路一步步地前进,使党能够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党中央坚强的集中领导,而没有这种集中领导,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建立党同人民群众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不可能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也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我们取得了伟大的革命的胜利,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些当然是大好事。但是,由于这些胜利和成就,我们的不少同志没有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脱离了人民群众。

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

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对待人民,那就会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走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面。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充分地作了理论的阐明。我们党的大多数干部,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并且能够在工作中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正确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干部,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敌我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系,不能很好地在工作中联系人民群众。他们常常采取简单化的办法,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以致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还有极少数品质恶劣的人,他们独断专行,称王称霸,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对立起来。

这些品质恶劣的人,完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我们党的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工作的范围内,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在实际上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国民党专政。他们的这种作风,根本不是共产党作风,而是极端恶劣的国民党作风。这种国民党作风,是人民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共产党的大敌。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从来反对国民党作风。我们党从来不容许国民党作风在我们队伍中存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这样地提出问题来告诫我们的同志:或者是共产党的作风,或者是国民党的作风,这两种作风是互不相容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早已倒了,但是国民党作风的残余,现在还继续腐蚀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把共产党作风同国民党作风严格地区别开来,必须继续向存在于我们党内和政府工作中的国民党作风作战,并且要随时随地对这种国民党作风保持最高度的警惕。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扬人民民主,最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

许多问题往往是这样发生的: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忘记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传统,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他们不肯做调查研究工作,不理睬毛泽东同志经常指出的“先当群众的学

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一真理,有事不先同群众商量,不在群众中进行酝酿,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认真注意群众的反映,甚至当群众的利益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群众表示十分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坚持自以为是“正确”的那些错误做法。

.....

(选自同上,第 373—375 页)

三、党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明了我们当前的任务和长远的奋斗目标,说明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这里,还必须谈一谈党的问题。因为我们党如果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如果不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不保持严格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那末,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最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当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它要利用一切可能,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为准备和进行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它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它要组织和领导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继续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人民的事业,经历各种曲折,绕过各种暗礁,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实现这种雄心壮志。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革命政党。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年代或者建设年代,都对我们

党表示最大的信赖。人民清楚地看到,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有可能从贫穷变成富强,从落后变成先进,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在我们总结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切实改进我们工作的同时,必须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地加强起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这些同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坏思想、坏作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早已形成了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也早已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同志一定要自觉地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使我们党永远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

以下,要说一说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

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

为了力求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加强调查研究。他自己就做过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最近几年,他多次地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人,认真地调查研究一两个农村,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以便取得知

识,取得发言权,以利于指导一般的工作。他还说过,要调查,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有些同志认真地做了调查研究,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比较好。但是,有许多同志没有做,他们满足于听口头汇报和看书面汇报,而这些汇报,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看了一些不可靠的材料,也不调查研究,就照样搬用。他们这样主观主义地做领导工作,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

毛泽东同志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这句话很深刻,值得我们很好地想一想。有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从来没有到基层单位认真地蹲过点,认真地同群众谈过心,系统地周密地了解过情况。他们对于工作的指导,当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直到现在,有一些负责干部还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或者抱着一定的成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还是不愿意虚心地同群众商量问题,或者只是到某些群众中去找适合于自己口味的材料。一句话,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没有真正端正过来。

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一九四一年八月,毛泽东同志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说:“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央认为,现在有必要向全党再强调提出这一个加强党性的问题。

.....

(选自同上,第395—397页)

群众路线

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这几年来，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有新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歪曲。看来，在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

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信任群众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根本观点问题。有些同志虽然在主观上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不虚心地向群众商量，不耐心地教育群众，不愿意或者不敢把党的政策和党所提出的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群众。

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事实上，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严肃地处理关系广大群众利益的问题，认真地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同志，对于群众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的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这是极端错

误的。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公然扣压群众来信,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还有少数地方,使用对付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以艰苦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为耻。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干部,处处讲究生活上的享受,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在不少的干部中间,那种摆排场,闹阔气,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有了滋长。这种旧官僚的恶习,在我们的队伍里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都应该彻底改正,严重的还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只有打掉了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

(选自同上,第 400—402 页)

评注:1962 年 1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它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是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

书面报告,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时有删节。

本文论及三个问题:一、目前形势和任务;二、加强民主集中制;三、党的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中总结经验教训时,刘少奇论及从制度上和体制上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

刘少奇总结了1949年以来的12年中,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4年中的16方面的经验教训。其中在第14方面指出:“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必须认真实现‘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保证建设,增加生产的一个根本方针。”这段论述是击中时弊的。当时很多县的县一级机关人员都在五百人以上。国务院的有些部门,经过多次减员以后,仍有四五千人之多。刘少奇认为人员还是多了,必须精简。他指出:“机构这样庞大,这样重叠臃肿,非生产人员这样多,这对当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很不利的,对于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而且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

在第二个问题中,刘少奇论及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他认为,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不可能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如果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对待人民,那就会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走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面。”有少数品质恶劣的人,他们独断专横,称王称霸,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完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党的利益。

在第三个问题中,刘少奇论及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指出:有些同志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

政策,凭“想当然”办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结果必然把事情弄糟。刘少奇论及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党必须信任群众,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事实上,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他重申:“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都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这同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观点完全是一致的。

(十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节选:

……

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书面报告中已经说了很多。在这里,我只说两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相互关系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白规定了的,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但是,最近

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最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的。

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就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而言的,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只在人民内部实行的制度,不包括人民的敌人。有些同志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没有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常常用专政的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和说服的办法,用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他们不只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对人民群众有时也实行专政。这样,他们就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人民的地位。无产阶级的民主

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的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党内,在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当然,实行这种方法,我们仍然可能犯某些错误,因为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总是比较更少地犯错误,而在更多的时候,总是比较正确的。即使我们同多数群众、多数党员一起犯了错误,也易于发现,易于较早地得到纠正。

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末,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例如,亩产几千斤的指标、办公共食堂等,如果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选择,那末,他们中间的多数是决不会赞成、决不会通过的。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

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直到最近才得到纠正。这应该作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的教训。

同志们!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末,我们的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因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加以改正。我们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人民中,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不能依靠强迫命令行事。

第二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我们不是减少而是要更加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使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说,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是互相促进的,而不是互相促退的。有些地方计划就冲击国家计划,对国家计划起促退的作用;有的时候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对地方计划也起促退作用。……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31—434 页)

评注:本文是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所作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在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时有删节。在论述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时,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作了两点重要的补充:第一、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相

互关系。第二,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

在作第一点补充时,刘少奇论及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以及由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而导致官僚命令的错误。

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人民和敌人而言的,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而民主集中制,只是在人民内部实行,不包括人民的敌人。有些同志混淆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他们常常用专政的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和说服的办法,用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于是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的错误就产生了。照此办理,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权就有发生变质的危险。我们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这种错误。

在作第二点补充时,刘少奇强调要把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统一起来,使之互相促进,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十七)《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节选:

.....

第四,改变地方党组织中某些不正确的作风。

现在艰苦奋斗的作风有所削弱,特殊化的风气有所发展。

有些地方盖别墅，盖高标准住房，搞跳舞场。中央是不是也有呢？中央也有特殊化。省委学中央，地委就学省委，县委就学地委，公社就学县委，这样学起来，那还得了呀！现在我们改变过来好不好？从中央改起，各省委、地委、公社，一律把这个风气改变过来。某些年纪大的，有病的，或者工作上有某些需要的，可以特殊一点，正式规定，照顾需要。但是某些东西就只许中央搞，不许地方搞。比如人民大会堂，就只许中央搞。各省都盖那么一个大会堂，怎么得了！某些东西只许中央有，省委都不许有，某些东些只许省委有，地委、县委不许有。你们下去要恢复艰苦奋斗的作风，改变特殊化的风气。

我们的党是一个统一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地方党委只是党的一个部分的领导机关，不要把那个地方的党委看作是独立的。加强党的统一性，这也是一个作风问题。最近我们党和国家的统一性受到了削弱，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阻碍，受到了破坏，我们必须纠正这种现象，反对分散主义。现在有些地方的市场跟全国的统一市场是矛盾的，画地为牢，别的地方的东西不许来，这是不允许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呢？设这样多的关卡，这不是按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人为地制造障碍、壁垒。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是有关税壁垒吗？我们有些地方的做法比关税更厉害，就是不准别的地方的产品进来，或者不准自己的产品出去。这是必须纠正的。

为了纠正这些东西，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斗争。你们去，要为改变地方党组织中某些不正确的作风和风气进行一些工作。

.....

(选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59—460页)

评注：1962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抽一批司局长以上干部下放到主要产粮区，加强地委、县委和基层领导。这是刘少奇对当时下放干部的讲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下放干部提出了五项任务：一、加强地委、县委和基层的领导；第二、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第三、如实地反映情况；第四、改变地方党组织中某些不正确的作风；第五、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在论述第四项任务时，刘少奇指出：“现在艰苦奋斗的作风有所削弱，特殊化的风气有所发展。”中央也有特殊化。要从中央改起，各省委、地委、县委、公社，一律把这个不良的风气改变过来。加强党的统一性，这也是一个作风问题。“最近我们党和国家的统一性受到了削弱，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阻碍，受到了破坏，我们必须纠正这种现象”。

三、周恩来论反对官僚主义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在白区工作和根据地工

作,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等许多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也写过大量的文章、文件、书信、电报,做过很多重要的讲话。我们将《周恩来选集》上下两卷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精辟论述辑录出来,加以述评。

(一)《我的修养要则》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全文: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选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5 页)

评注：《我的修养要则》是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的。短短的修养要则，有着丰富的、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也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唯物辩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具体表现。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调查研究，耻于下问，不了解下情，忙忙碌碌，工作无计划，无重点；摆官架子，颐指气使，不平等待人；遇事推诿，怕负责任，办事拖拉；不学无术，不重视自身修养提高，不学政治，不钻研业务；不坚持原则，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享乐腐败，蜕化变质……官僚主义的表现，同周恩来的修养要则是背道而驰的。

学习和借鉴《我的修养要则》，至今，对于我们防御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节选：

一、领导者的定义。

……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以下几点：

(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三)要相信群众力量。

(四)要有学习精神。

(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五、领导者的任务。

(一)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

(二)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

(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

(四)审查工作。.....

(五)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原题为《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

提纲论及领导者的立场时,具体化为六点,即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要相信群众力量,要有学习精神,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这六点是对领导者的立场的基本要求,同时具有反对官僚主义的意义。

提纲论及领导者的任务时,提到面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近和联系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相信群众,向群众学习,与群众打成一片,汲取群众经验。这是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贯彻和具体化,仍然具有反对官僚主义的意义。

提纲论及领导群众,结交朋友时,提出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提纲论及工作方法时,提到主要用说服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式的方法。

提纲论及工作作风,教育全党同志要学习列宁和毛泽东的工作作风,要有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谦逊实际,朴素勤勉,好学深思,坚韧顽强。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

按照周恩来提出的对于一个好的领导者的要求,去履行领导职务,肯定可以避免或者少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三)《学习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节选：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

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

(选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4—335 页)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人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

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象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就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间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

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选自同上,第336—340页)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评注:《学习毛泽东》是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录。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收入《周恩来选集》时根据原记录重新进行了整理。

本文概括地论述了毛泽东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锻炼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过程,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所具有的革命家兼学者的高尚品格。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要学习毛泽东。

周恩来论及,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发挥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真理和原则。可见,“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

毛主席坚持原则,坚持方向,实现方向的过程,始终贯彻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了真理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主席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百分之九十”)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官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不可能办到的。

“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没有满足过。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的这个精神。“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

总之，毛主席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坚持原则又灵活运用原则，坚持方向又实现方向的高尚品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作社会调查，耻于下问，不研究政策；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坚持原则，不辨方向，碌碌无为；不学无术，空谈政治，不抓业务的官僚主义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四《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节选：

……

(六)上下关系。

这里说的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比如钢铁生产，就要在工业投资、矿石生产和销路等方面对各产钢

地区进行统一安排。棉花生产计划的制定,也得看各地的条件。航务计划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犯本位主义,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在论及新中国经济中的上下关系,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钢铁生产,棉花生产计划,航务计划,既要统一安排,又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要象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一样,“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

周恩来把发挥地方和人民的积极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同克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指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五)《“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节选：

目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正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紧张地进行,并需要继续深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特别是与贪污、浪费有密切关系的工商界要动员起来。

.....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通过《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决定首先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1—84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刊载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他概括地论述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如何铲除其毒害。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如何去铲除毒害？“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特别是与贪污、浪费有密切关系的工商界要动员起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即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因而必须对之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决定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参加“三反”斗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六)《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节选：

……

三、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

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平时谈生活、谈文艺都要注意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做政治空气浓厚。

(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这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是十分俭朴的。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去提倡那些形式的东西，因为不适合我们现时的经济情况。生活上同他们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92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节录。论及我们的外交方针、外交阵线、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

其中，在论述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时，周恩来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同反对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指出：我们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多听大家的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周恩来要求外交工作要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政

治空气稀薄；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这其中也包含有防御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意义。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树立新中国的对外形象，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七)《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节选：

.....

二

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不但是我国目前紧张的建设事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对知识界加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的前提。

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被大量地动员起来了。要不然，我们前面说的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他们对于国家的巨大贡献，就都是不可思议的了。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这一点，这是事物的主要方面。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少缺点，包含一些严重的缺点。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 and 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

益的专长。

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方面,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形下都做得不坏。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在国家建设负担了很多很重大的任务,而他们的能力在实践中也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但是究竟不能说,我们已经把知识分子使用和安排得恰当了,而没有闲置任何力量。例如在许多机关里,因为工作分配得不适当,或者工作组织得不好,也还有使少数知识分子“闲得发慌”的情形,而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正是因为有某种专门知识,才被分配以这些机关里来的。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又如在全国高等学校里,还有极少数教师没有开课。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并不是不能开课,或者只需要组织他们学习一下就可以开课,这就应该让他们开课;如果确实不能开课,也应该设法分配给他们所能担任的工作,例如编译工作、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而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又如在社会上也还有极少数失业而还有相当劳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根据情况,由地方或者由中央给他们分配一定的工作。

有些地方,在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上,用非所学的情形也还存在。有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愿意作科学研究工作,也以做科学研究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却被分配做机关行政工作或者学校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专家,由于工作分配中的错误,完全没有理由地被指定担任他们所没有学过的工作,有时今天叫干这个,明天又叫干那个,可是就不让他们调回本行。根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轻工业部的所属五个单位统计,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

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67—171 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载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告论及我国当时知识分子的情况、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扩大和提高知识分子队伍、解决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在论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问题时,论及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错误。

周恩来十分重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指出:“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不但是我国目前紧张的建设事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对知识界加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的前提。可见,他是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全局提出问题的,是有远见卓识的。

紧接着,周恩来作进一步分析,回答了如何动员和发挥知

识分子力量的问题。指出：“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 and 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按照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要求，周恩来提出，必须坚决地纠正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工作条件、待遇等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

(八)《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月)

节选：

……

第五，《十五贯》的思想性很强，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也草菅人命。今天干部的主观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差不多。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能这么厉害。巡抚是个官僚主义者，代表了朝廷。戏通过两相对照，称赞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作风，正义的作风。提倡实事求是，是戏的一条主线。这个戏还批判了旧社会的五毒（赌、嫖、偷、杀、骗）恶习。娄阿鼠是很毒的，我们不须问他的出身。这种人在破落地主中往往更多些。五毒恶习

尽管更多地存在剥削阶级中,但在一些劳动人民身上也是有的,这是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不能说凡是坏人都是封建剥削阶级出身。所以,娄阿鼠的家谱可以不交代。这个戏还赞扬了群众公论和社会同情的力量。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有时也会被大浪压下去。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戏也批判了酗酒等坏习气。油葫芦的性格写得很好,他乱开玩笑,闹出了乱子。

正义的线贯串在人民身上。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况钟把金印拿出来,周忱不敢接受。击鼓、退印,就是况钟对付周忱的办法。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最后,希望你们这次成功不要带来了骄傲,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继续前进。希望各个剧种都能发展,在世界的文艺花园里增添我们的花朵。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8—199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十五贯》后的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四月十九日看完演出后对剧团同志的讲话。第二次是五月十七日在关于《十五贯》的座谈会上

的讲话。

《十五贯》是根据清初戏剧家朱素臣的传奇剧本《十五贯》(又称《双熊梦》)改编的昆曲剧目。主要情节是:赌徒娄阿鼠图财杀死屠户尤葫芦,窃去铜钱十五贯,反嫁祸于尤之养女苏戍娟及身带十五贯钱的路人熊友兰;无锡知县过于执主观地断定熊、苏二人通奸杀人,于是将熊、苏判处死刑。苏州知府况钟奉命监斩时发现疑点,连夜去见巡抚周忱,请求缓刑复查。况亲赴现场和民间查访,终于查明了真凶,平反了冤狱。

周恩来在五月十七日的讲话中,客观地评价了昆曲《十五贯》,联系剧情和国务院实际,论述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十五贯》的思想性很强,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也草菅人命。今天干部的主观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差不多。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能这么厉害。”巡抚周忱是个官僚主义者,苏州知府况钟坚持实事求是,罪犯娄阿鼠很毒,屠户尤葫芦是受害者。戏剧通过两相对照,称赞了实事求是的严肃认真的作风,正义的作风。提倡实事求是,是戏剧的一条主线。戏剧还赞扬了群众公论和社会同情的力量。正义的线贯串在人民身上。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有时也会被大浪压下去。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周恩来联系国务院实际指出:我们的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有个坏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有缺点,老百姓见“官”很难。周恩来劝告说:“《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

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昆曲《十五贯》的观感中,把反对主观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结合起来,把反对两种主义和贯彻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这就既新颖,又深刻,给了人们许多启示,对于我们今天反对官僚主义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九)《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节选:

现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是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现在还不是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

到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扩大民主,例如:

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

第二,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

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二十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那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不仅这样,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比如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得不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出来,坐在北京的人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

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今天在座的同志,一级一级算下去,都是做领导工作的,区的工作、支部的工作也都是领导工作,大家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7—210 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他论述了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包括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

革命胜利后,专政问题首先是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专政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而对剥削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地主阶级采用专政的办法,另一种是对民族资产阶

级采用利用、限制、改造的办法。

周恩来结合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进一步论述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其中含有扩大民主,克服官僚主义问题。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时常警惕,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在这里周恩来已触及到国家制度。指出要在国家制度上想办法,以解决问题。

周恩来指出:由于受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不高等条件限制,当时还不是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扩大民主。即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第二,召开全国人大时,要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第三,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以上三个方面,对于扩大民主,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改善政府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

周恩来联系亲身实践,又尖锐地指出:“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

周恩来又清醒地估计到反对官僚主义任务的长期性和权

力过分集中的弊病。指出：“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

(十)《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

节选：

.....

第一个问题，根据刚才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我们从国际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到我们的建设，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

第二点，也就是刚才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

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此外,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29—230 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节录。论述了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其中第一个问题结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从国际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我国的经济建设,

指出有两点值得注意。周恩来在论述这两点时，都论及反对官僚主义问题。

第一点，即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

（所谓沙文主义原指资产阶级反动的本民族至上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它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其它国家和压迫其它民族的思想工具。）

周恩来引用了毛泽东的分析，这种沙文主义错误，就是对外的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沙文主义错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也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他列举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

第二点，即原苏联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我们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中国的特点之一是封建性很大。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

总之，周恩来在论述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时，十分重视人民的利益，反对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特殊化官僚化。

(十一)《加强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节选：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

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的。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毛泽东同志最近几次讲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究实事求是；又说，右要反，“左”也要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

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3—314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节录。其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当时我国实际,联系党的群众路线,解释和发挥了毛泽东在一九三〇年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思想观点。周恩来指出: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毛泽东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进城后,特别是一九六〇年前后几年,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

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比较;要坚守毛泽东的三条原则: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集中起

来,坚持下去。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脱离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就会放弃党的领导。而当时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少。

脱离实际,不从客观存在出发,而从主观想象出发;脱离群众,命令主义,不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十二)《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节选: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象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账,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

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听真话了。

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象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有上游，你才争上游。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是鼓假劲。比如有的提倡苦干几天几夜，过年也不休息。你在那里鼓劲，他就苦战，你走了，劲也没有了，他照样休息，照样过年。

做实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这几年《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等，他们已经做了检讨。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

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9—351 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的第四个问题:检讨的目的。

讲话的历史背景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大跃进”以来的几年中,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搁置在一边。特别是在“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忠诚的、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干部群众,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直到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为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再有,作为党中央喉舌的《人民日报》,在当时宣

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等,他们已经作了检讨。总之,虚报浮夸和说假话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破坏了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危害了党和国家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发表了题为《检讨的目的》的讲话,教育全党要检讨工作中的错误,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场习气、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

周恩来指出:“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在这里,周恩来在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中,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文中关于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和发挥。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尊重客观事物,研究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为此,必须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周恩来指出:“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如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他们是君臣关系,尚能如此。在共产党内,在上下级之间是同志关系,更应该能听真话。鼓假劲,徒虚名,办假事,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强迫命令,正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

周恩来作了概括:“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

过认真调查研究。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与此紧密联系的还有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十三)《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全文: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

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当然,不单单是这七种,但这七种特别突出。

官僚主义有各种表现,我现在把它分开来说。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所以我把这种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惕

的。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大概总是不去抓业务，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也不研究人家讲话的内容，结果就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常有人说：“我做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好象这种官僚主义还能容许似的。我看，这种官僚主义也要批判。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迳；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帽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那里的领导人即使精明强干，也会有官僚主义。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机构搞得那么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吵吵嚷嚷，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

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

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我举了这么多种官僚主义,分析不一定很科学,也不是说在一个机关中所有各种官僚主义都已经发生。但是,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三月一日的指示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422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部分的要点。这是周恩来著作中,最集中地论述反对官僚主义的一篇重要文献。

本文概括地论述了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的联系。官僚主义的有害性和危险性。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本文着重地论述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

第一种,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 第五种,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 第六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 第七种,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 第八种,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 第九种,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 第十种,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 第十一种,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 第十二种,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 第十三种,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 第十四种,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 第十五种,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 第十六种,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 第十七种,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 第十八种,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 第十九种,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 第二十种,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周恩来长期担任党、政、军重要的领导职务,有着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干。他如此精辟地论述官僚主义的表现,如此尖锐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直至一九七六年他逝世时止,在以往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些论述是他的领导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这些论述,大量涉及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也已涉及体制上的官僚主义。至今已有三十四年。然而,今天对于我们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

作风,学习政治和钻研业务,严格自律,清正廉洁,反对蜕化变质;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增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统一等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官僚主义的政治病症,腐蚀党的躯体,污损党的领导干部的清洁面容。“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肩负历史重任的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应当把周恩来关于官僚主义二十方面的表现作为一面镜子,随时随地检查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使之更符合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性的有机统一。它涉及广泛的内容,表现在党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的坚定信念,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和理论修养,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正确态度和密切联系群众,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态度,对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关系的正确处理,对党的纪律和准则的遵守,对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的正确态度等等。我们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加以对照,恰好说明官僚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突出表现。官僚主义——无论是体制上的官僚主义,或者是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都是误党误国误己的。因此,“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

(十四)《过好“五关”》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节选：

我现在讲一讲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题。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第一，过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讲的认识论。这是一辈子的事。……

第二，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所以，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同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看我们的党性，没有入党的看是不是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接受它的思想领导。特别是看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不是知过能改。……

第三，过社会关。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两关，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

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

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第五，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会心情舒畅，才能对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只搞政治斗争，只干工作。人的生活要丰富一点，精神更要舒畅一点。文艺生活总是要有的，但是，我们的文艺生活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提高人的修养，把教育寓于文化娱乐之中。我们的文艺节目要有教育意义。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容忍它。这些东西不仅对我们不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更为不利。还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是颓废的没落的，决不能让那些糟粕影响我们的干

部,影响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们要在这方面加以整顿。上一次我在文联谈过这个问题,要整顿我们的队伍,加强我们文艺界的思想改造。

总之,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23—428 页)

评注:本文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根据《周恩来选集》下卷的注释,关于过“五关”问题,周恩来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亲属多次讲过。

周恩来讲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题,指的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在本文讲得比较集中、比较概括。

过思想关指思想改造,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党性问题。过社会关指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己,防止或抵制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过亲属关指对亲属到底是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的问题。领导干部应该做出表率。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过生活关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在物质生活方面,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过好上述

“五关”，对于抵御政治微生物和政治灰尘侵蚀党的健康肌体和污染我们清洁的面貌，对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无疑地具有重大作用。

此外，周恩来提倡除了干工作之外，还应该有丰富的文艺生活。然而文艺节目要有教育意义，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腐化堕落的东西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容忍它。在这里，周恩来坚持利用社会意识独特的发展规律，即通过思想斗争、说理斗争来解决社会意识领域内的矛盾，而不可采取行政的、强制的、官僚主义的手段和态度去解决矛盾。

(十五)《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电文》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二年)

节选：

藏富于民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的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不下去，不调查，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

土地以多报少，粮食以多报少，人口以少报多，灾情以少

报多。两个以多报少，两个以少报多，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

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一点七吨小麦或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

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然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特别是要消灭敌人在国境内，这就更有必要了。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9页）

评注：在周恩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电文》中，其中的《藏富于民》，是他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这篇简短的谈话节录，对于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强的针对性。周恩来首先引用毛泽东关于“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的思想，然后进一步加以引深。他指出：“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不下去，不调查，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多以多报少。”

请注意，这里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官僚主义者整了农民在先，农民无可奈何，被迫以多报少在后。

“土地以多报少，粮食以多报少，人口以少报多，灾情以少报多。两个以多报少，两个以少报多，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这也说明农民不切实际的做法是被迫的。

怎样才能做到农民讲真话呢？周恩来回答得简明通俗：“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实事求是，必然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他们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四、朱德论反对官僚主义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朱德同志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德同志一生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也有许多著述，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著述。我们将《朱德选集》中，关于联系和依靠群众，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精辟论述辑录出来，加以述评。

(一)《怎样创造铁的红军》

(一九三一年七月)

节选：

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铁的红军必须具备以下六个基本条件。

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

.....

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

三、政治训练的重要。

红军的政治训练与资产阶级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根本不同之点，就是红军完全反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成为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要造成铁的红军，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了解共产党有指导工农联合的责任；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了解革命战争的阶级性质是为全中国的工农及劳苦群众谋解放；了解自己在战争中积极完成其一部分任务就是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了解群众力量

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必须有红军的发展、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士兵暴动四种革命斗争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尤其要了解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和前途,全中国及全世界革命日益高涨的现状;深刻地认识整个敌人营垒中经济政治恐慌高度的紧张都有利于中国革命,充分地相信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定可以战胜到了末日的反革命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

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

四、军事技术的提高。

.....

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

.....

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

.....

(选自《朱德选集》第1——6页)

评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曾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一九三一年七月第二期、第三期上连载,收入《朱德选集》时略有删节。

本文论述了创造铁的红军是当时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铁的红

军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性)、共产党的领导、政治训练、军事技术、遵守铁的纪律、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等六个基本条件。

在论述政治训练的重要——这一基本条件时,论及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概括地指出:“要造成铁的红军,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战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了解共产党有指导工农联合的责任;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了解革命战争的阶级性质是为全中国的工农及劳苦群众谋解放;了解自己在战争中积极完成其一部分任务就是为了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必须有红军的发展、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士兵暴动四种革命斗争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是以为劳动群众谋利益、求解放为出发点所作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红军指战员所信仰的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历史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得到解放,为此,必须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相信和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实行四种革命斗争力量的配合。这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朱德关于创造铁的红军——政治训练重要性的基本观点。这是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权谋私,享乐腐化,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截然不同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25日将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

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10月开始,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运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随着革命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而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毛泽东的这一讲演,同朱德在1931年7月关于红军历史任务的观点,完全是一致的。

以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军队,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更不能变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主人,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

(二)《论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

节选

.....

一、政治战争

.....

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抗日游击队如果以升官发财、大吃大喝,以个人的光荣为目的,是不能团结的。只有以同一政治目标,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才能把抗日游击队团结成为坚强的队伍,才能号令如山,上下一致。个人自私自利、闹意见、闹派别、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人,不配当光荣的抗日游击队员。

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如果抗日游击队不能团结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不能使群众成为游击队的良好依托,那末,这样的游击队将会没有出路。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

存和长大。鱼一离水就死,抗日游击队一离开群众也就无从生存。抗日游击队是由群众之中生长起来的,而不是从群众之外来的东西。就是正规军派出游击队,也要做到使当地的群众认为这是自己的队伍,是与自己切身痛痒相关的队伍,才能生存和发展。

.....

(选自《朱德选集》第41—42页)

评注:《论抗日游击战争》是朱德在抗战初期的一部著作,部分章节曾于1938年初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陆续发表,同年11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全书共分三章十七节,这里收入了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前两节。

“抗日游击战争”,这已经是当时传遍全国的一个新的名词。有不少人在议论它、研究它。

朱德作了精辟的分析: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它是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方式。它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每个抗日游击队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部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史诗。“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因此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

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也当然不能例外。

朱德在论述政治战争这一问题时,指出政治战争的两个要点,贯彻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第一、整顿内部,除

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般的团结。反对以升官发财、大吃大喝、自私自利、个人的光荣为目的。第二、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维护群众的利益。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一离水就死,游击队脱离群众就无法生存。

抗日战争年代,党领导的游击队团结群众,维护群众的利益,取得游击战争的胜利。同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不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和国家的干部应当忠实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能以做官当老爷、升官发财为目的。

(三)《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

(一九四三年)

节选:

.....

我们为什么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坚持敌后的抗战呢?我们之所以能不被这些困难屈服,反而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坚持了六年苦战,是因为:第一,我们下定了决心。……第二,我们坚持了进步。……第三,我们自己动手。……第四,我们实行精简。……第五,我们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

显然地,如果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就必然要失败。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的基本原因。

(选自《朱德选集》第91—94页)

评注:本文是朱德为纪念抗战六周年而写的文章,全文共四个部分,原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延安《解放日报》,收入《朱德选集》的是其中的第三部分。

敌后残酷斗争已进入第七个年度。胜利更加接近,则困难亦将更加增多。朱德先分析了诸多困难的表现。接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六年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这五个方面的原因都是建立在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基础上的。我们的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即来源于群众。我们的敌人是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克服了一切困难。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困难的环境中苦战六年,并不断成长壮大,这确是抗日战争中的事实,自然也应该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正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创造的。

朱德在本文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观点,同毛泽东在1934年1月所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四)《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节选：

……对于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应该注意的地方，还有加以解释的必要。

第一，新英雄主义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需要在正确的工作方向的指导下，为争取实现目前可能实现的目标，发动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开展普遍的革命同志的友谊竞赛，形成一种勇往直前的风气，造成一种热火朝天的运动，使人人积极而愉快地为革命战争贡献出更大的力量。只有把全体群众发动起来，投入实现某种具体任务的浪潮中，才能表现出群众的伟大力量和从群众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如果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工作还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身上，则即使能造出几个突出的人物，其作用 and 意义也是很小的。

第二，这是一个团结群众、培养干部的重要方法。需要作领导工作的同志，在群众运动中，以最关切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部下，很细心地研究与了解他们，很殷勤地培养他们，当他们需要扶助的时候，就去帮助他们，当他们做出了成绩的时候，就去奖励他人，鼓励他们上进。只有这种关切的态度，才能发现群众中的英雄，培养出很好的干部。有了这批积极分子，就有了团结群众的核心，在他们的影响下，使全体群众更积极地

行动起来。因而,这是一件很精细周到的工作,决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或者不慎重地乱加表扬又乱加打击的态度所能收效的。

第三,这是教育群众的重要方法,也是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选自《朱德选集》第120—121页)

评注:本文原载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为在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中,普遍深入地开展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的英雄主义运动而作。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英美盟军已经胜利地在法国北部登陆,苏联红军的夏季攻势已经神速地粉碎了卡累利地峡、白俄罗斯前线的德芬防线,太平洋上美国海军已经突入日寇的内防御圈。我国战场的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浴血苦战,战果辉煌,涌现出许多英雄部队、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开展英雄主义运动的目的在于:树立榜样,鼓舞士气,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的斗争,最后战胜和消灭日本侵略者。

朱德论述了开展英雄主义运动的性质。他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

革命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因而,革命的英雄主义必然是群众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则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一是相信群众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

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

新英雄主义是新时代新社会的产物,只有具备共产主义的高尚品质和伟大气魄,才能具有彻底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才能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

新英雄主义运动是群众运动,要有正确的工作方向的指导,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新英雄主义运动是一个团结群众、培养干部的重要方法,也是一个教育群众、进行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因而,这是一件很精细周到的工作,决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或者不慎重地乱加表扬又乱加打击的态度所能收效的。”

总之,朱德论述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贯穿着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

(五)《论解放区战场》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节选:

.....

二 论解放区战场

解放区抗战的经验

若问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既缺乏武器,特别是缺乏新式武器,又无外援,并且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夹击,

为什么解放区在极残酷的战争中,竟能日益壮大起来?毛泽东同志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的部分,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我在这里再稍为说一些经验。

总的经验何在呢?简单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团结,也因此实现了抗战一元化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

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这三者一致的东西造成了各解放区战场,又恰是各解放区战场作战的特点。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是我们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抗日人民战争的经验,都是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及抗日人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所压碎了。

(选自《朱德选集》第149—154页)

……

三、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

……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

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

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我们的政治工作：第一，是在于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发扬他们爱国、爱人民和改造自己的热情；第二，是在于团结本军和友军；第三，是在于团结军队与人民，提高人民保卫祖国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觉悟，帮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是在于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敌伪，使之丧失战斗力；第五，是巩固和提高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保证命令之执行，深入政治、军事、文化、生产各方面的学习。而这五方面工作，又是互相关联、互相一致的东西。这些，是我们政治工作的特点。我们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我们进行的战争之所以是人民的战争，所以能进行人民的战略战术，所以能打胜仗，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选自同上，第 170—171 页)

.....

五 结束语

胜利的光芒很快要放射到全世界全中国，中国人民八年来所努力的伟大工程，业已逐渐接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方向。我的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军事的经验，主要是解放区抗战军事的经验，为的是如何在军事上去完成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完成其所提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建国任务。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是经过我们无数同志、无数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所有已牺牲的同志们和战士们，将永远不朽。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支人民军队曾作了这样的论断：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

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同志这个有力的、英雄式的论断,是真实的,是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深厚力量的。这支代表中国人民力量的军队,这个中国人民力量的精华,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这个力量将永远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存,将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战胜日寇,战胜一切妨碍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障碍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们党的这次大会,便是要引我们走到这胜利之路。

.....

(选自同上,第 181—182 页)

评注: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思想认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党的七大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战争将近八年的时候召开的。在这八年中,中国人民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条战线上,不分男女老幼,轰轰烈烈,与日寇作殊死的斗争;不管日寇如何凶暴残酷,也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及其统帅部的指挥有如何错误,中国人民仍以一往无前、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的精神,坚持了这伟大的、爱国的反侵略战争。

在这八年中,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与一切抗日的友军,协同保卫祖国。在各解放区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流血奋斗,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朱德在总结解放区抗战的经验时,贯穿着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了人民,保卫祖国,团结、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他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这三者一致的东西造成了各解放区战场,又恰是各解放区战场作战的特点。”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那么,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就不能压碎敌人,反而被敌人所压碎。

朱德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特点,包括互相关联、互相一致的五个方面。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能进行人民战争,能打败敌人,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朱德在军事报告的结束语中,引用了毛泽东在政治报告

中关于人民军队的论断：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战争年代必须贯彻党的宗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贯彻党的宗旨。背离党的宗旨，必然陷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的泥坑。这是应当引起高度警觉的。

（六）《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

（一九四七年九月七日）

节选：

关于军队里边的群众路线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首先，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

其次，战术运用要走群众路线。……

第三，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

第四，实行奖励也要走群众路线。……

（选自《朱德选集》第 208—210 页）

评注：本文是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报告的第五个问题，即整军问题一部分。

朱德集中地论述了部队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他从军事教育、战术运用、政治工作、实行奖励等四个方面来论述。部队的群众，由三种战士组成：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解放战士、老八路、土改后参军的新战士。三种战士各有各的优缺点。指挥员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即把部队每个战士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关心战士，爱护战士，使人人精神振奋，就能把每一件事做好。“如果我们在部队中工作的同志不断加强群众观点，遇事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吃饭在一块，行军在一块，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那我们就一定把部队带好，带成一支模范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人民，以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为己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是与欺骗士兵，勒索士兵，奉行军阀主义的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

(七)《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

节选：

……我想趁这个机会来和大家谈谈下面几个问题：

一、纪律的重要性和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

……

二、目前党内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

二中全会以后,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有了迅速而巨大的发展。一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全部国土,党员也由三百多万发展到今天的四百五十万以上。一般说来,我们的党员干部,在中央正确政策的领导下,工作是努力的,有成绩的。如果没有全体党员干部的努力奋斗,则我们的成绩不会有这样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少的党员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这些行为已引起群众对我党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很好地加以克服,将使我党严重地脱离群众。下面几种是表现得比较突出的:

第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很多党员干部,特别是下级党员干部,他们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各项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地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采取了蛮横的不讲理的方法,随便捕人、吊打,或者纵容坏分子随便捕人、吊打而不闻不问,这已成为相当多的事情。这些同志不了解:国家为了完成革命战争和稳定金融物价而进行的征粮、收税、推销公债等工作所不得不加于人民的负担已经不轻,为了使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就要很好地向群众做宣传解释的工作,很好地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否则群众就会埋怨甚至反对我们。可是我们这些同志却没有很好地去考虑这些问题,虽然党曾再三地告诫过他们:必须密切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凡事要和群众说清道理,商量着办。毛泽东同志也再三地告诫过我们:做事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善于与非党群众团结合作,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而我们这些有特权思想、习惯于简单强迫命令作风的同志,不但不很好地学习和重视党的指

示,反而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因此就发生了很多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的行为,使党在政治上遭受到相当重大的损失。

第二,官僚主义的作风进一步滋长起来。有些党员干部,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痛苦,不了解共产党员的重大任务是要随时随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同志对工作疲塌松懈,得过且过,逐渐失去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如拿生产救灾来说,有些地区不少的党员干部,就没有把这个关系千百万人民生命的重大问题很好地重视起来,所以在反映情况、布置工作上都产生过一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结果使人民的痛苦加深,使党和国家的损失加重。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对这个问题注意得早一点,情况反映得确实一点,布置工作比较切合实际一点,那末生产和救灾工作是可以做得比现在好一点的,人民的痛苦和损失也就可以减少一些或避免一些。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这是官僚主义作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不负责任或不大负责任的态度。这种工作态度,已产生了极端严重的恶果。如铁路、矿山曾连续发生了重大的命案;工厂器材不断地遭受破坏或损坏;许多仓库被毁,物资被盗、霉烂,等等。这些损失,计算起来是十分惊人的。如果再加上浪费方面的损失,则其数字之更加惊人,就可以想见。在目前国家财政仍是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凡是有这种态度有这种作风的同志,如果不痛加改正,将不能取得党、国家和人民的原谅。为了有

效地纠正这一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行为和作风,除了经常地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还要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做到使党员干部提高自觉,并在群众的监督之下逐渐地把官僚主义这个坏毛病克服。

第三,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在我们某些党员干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以功臣自居,认为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党和人民就必须给他们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他们看不起党外人士,看不起群众,轻视党的组织和纪律,轻视政府和法律。可惜得很,这些同志的落后思想和行为,恰恰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失掉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不错,目前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的?这份功劳应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而在我们党方面则应首先归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试想想,在将近三十年与反革命敌人残酷的斗争中,不知有多少先烈付出他们的鲜血和头颅,如果没有他们的英勇牺牲、前仆后继的英雄行为,那我们要取得胜利是很难想象的。在我们党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地纠正了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就不能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则胜利的获得也同样地是很难想象的。如果哪一个同志以为自己有了了不起的功劳,要党和人民给予他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人物,即使你做得最好、贡献最大,也不过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们共产党人胸

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所谓“善则归诸人,过则归诸己”。这点我们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所以,我想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你们就会在革命队伍中掉下队来,失去了和革命同伴共同前进的机会。

看不起党外人士,看不起群众,这也是一种极端幼稚、落后和错误的思想。这些同志不但不了解党外人士在广大群众中的作用,也不了解只有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要知道,天下是不能由少数人去包打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脱离了群众而把天下包打下来的人物。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本事很大,大到可以不要群众就能把天下打下来,那你不妨试试看,看你能弄个什么结果出来?我看结果不会有旁的,只能有一个:群众必然会把你抛弃掉。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团结党外人士,一定要密切联系并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就会犯错误,就会使党和国家受到严重的损失。

轻视党的组织和纪律,轻视政府和法律,也是不对的。如果你有意见,可以在党内提出来,提得对,组织就会采纳。有些人不相信组织,说:“某某人比较差”,“某某人我根本看不起他。”他们把个人问题和组织问题混淆起来。有些人没有认识到纪律的重要,认识党的纪律只是给一般党员遵守的,自己可以例外。更有些人轻视政府和法律,认为政府算什么,管不着我这个老党员;法律也只是给老百姓遵守的,我可以不遵守。

所有这些,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尊重和爱护政府,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令。

总之,我们这样不厌其详地谆谆告诫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目的无他,只是为了帮助他们,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致因此就掉下队来,仍能继续和我们一道走向更高级、更美满的社会里去。

第四,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据北京市委报告:一年来党员干部违反政策、违犯政府法律者共一百八十二人。济南市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的一年中,党员干部因犯党纪而受处分者五十八人,其中属于右倾、享乐、贪污腐化等原因者占四分之三。只从北京、济南二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我党自进入城市以来,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是发展了享乐思想的,因此贪污腐化的行为就增多起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为了更有效地制止贪污腐化的行为,我们将请政府制订并颁布一个《惩治贪污条例》,使任何一个贪污国家财产的人,都逃不脱应有的惩处。

以上就是党员干部违反政策和纪律的主要情况。

为什么上述违反政策和纪律的事件在今天增多起来,而且显得特别严重呢?这个原因可以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去找。

在客观上,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容易使我们产生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等许多坏东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周围环境的包围与影响,如与其他阶级合作,与留用人员共事,城市的花花绿绿,等等。虽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几个曾经是强大的敌人,已基本上被我们打倒或即将完全被我们打倒,但是它们所遗留下来的恶劣的思想、作

风和风俗习惯等等,还必须经过十分艰巨的、长期而坚韧的斗争才能逐渐消灭。因此,这些根深蒂固的坏东西,不但在目前,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可以通过各个方面来不断地影响、侵袭和腐蚀我们。这就是我们在胜利局面下所处的客观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战胜它、克服它,那它反过来就会影响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在进入城市之后,看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便眼花缭乱,学起样来,把衣、食、住、行样样都弄得很阔绰。就以住房子来说吧:有些同志总说房子挤、房子不好,其实我们过去在山沟里的时候,成千成百人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也还觉得不算挤,可是到了北京这样大的城市,却说房子不够住了。这看来好象是个小问题,其实却反映了一种严重的思想状况,应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否则,发展下去就有蜕化的危险!

党员干部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在今天之所以特别严重,除了上面分析过的客观原因之外,在主观上则由于我们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具体表现在:党内的教育往往不够认真经常,不完全切合实际;党内的生活也不够正常和健全,特别在政府部门,在下级组织中,表现得较为显著;党内的制度有些组织和单位执行得不够严格。如请示报告制度不按时认真执行,有个别的单位到现在还存在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严重现象;特别是党内纪律,一般都执行得很差,因此党员干部的违犯党纪和违法事件就相当普遍。今后,我们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三、如何克服党内违反政策和纪律的错误?

上面讲到的那些党员干部严重地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的现象,中央正在注意纠正。最近中央已提出了整党的任务,发布了整党的指示,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党员干部中的那些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作风以及享乐腐化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克服。各级党委必须根据中央最近关于整党指示的精神去进行整训干部的工作。这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教育工作,必须从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中来反复教育党员干部,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使之克服缺点,改正错误。为此,就要接受过去整风时期和土改整党时期的经验。过去整风时期,主要是靠教育,主要是改造思想。在毛泽东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下,在改造党员干部思想上,特别是在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的思想上,曾经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其成绩之大,影响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但其缺点是很多地方对于改造思想片面的理解,对于必须执行的纪律也不执行了。因此,有些思想不好的同志,动辄以思想未搞通为借口,掩盖其不服从组织和违犯党的纪律的错误行为。这不能不说是经验教训之一。在土改整党时期,同样也收到了很大效果,这表现在:大大地打击了某些党员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纯洁和巩固了农村党的组织,并很好地教育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可是在进行过程中,有些地方简单地、片面地用组织手段来解决问题,因此处分党员干部过多,使一部分错误不很严重的同志也受到了不应有的惩处。这也不能不说是经验教训之一。这次我们在执行整训干部任务的时候,就要吸收过去整风时期以及土改整党时期的成功经验,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错误缺点。要以思想教育为主,同时以执行纪律为辅。对于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政策和纪律以及违

犯了纪律仍拒不改正的党员干部,必须给以应有的纪律处分。

在我们中央一级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里,虽然象上述那种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的事件并不多,但是不是就没有违反政策和纪律的行为呢?不能这样说。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不愿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情绪,对革命的工作和国家财产的不负责态度,以及摆老资格、闹地位、闹享受的个人主义等等,依然很多。因此,在我们中央机关里,也必须执行中央关于整党的指示,认真地检查一下我们的党员干部有没有坏思想和坏作风?有没有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行为?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检查和反省自己。一定要把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不愿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情绪,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不负责态度,以及摆老资格、闹地位、闹享受的个人主义等等坏东西加以克服。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今天到会的同志,都要认真地把这个任务担负起来,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最大的努力协助同级党委去完成这个任务。

.....

(选自《朱德选集》第281—289页)

评注:本文是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朱德选集》时略有删节。

1949年11月9日颁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由朱德担任书记。

朱德在这篇讲话中,论述了三个问题:即一、纪律的重要

和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二、目前党内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纪律的情况,三、如何克服党内违反政策和纪律的错误?

朱德在论述当时党内违反党的政策和纪律的情况时,曾尖锐地指出:“这些行为已引起群众对我党不满的情绪,如果不很好地加以克服,将使我党严重地脱离群众。”他列举了四种突出表现,说明其严重危害,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四种突出表现是:

第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第二、官僚主义的作风进一步滋长起来。

第三、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在我们某些党员干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第四、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

这四种表现实质上都属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失掉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相当重大的损失。

关于产生错误的原因。在客观上,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容易使我们产生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等许多坏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周围环境的包围与影响,如与其它阶级合作,与留用人员共事,城市的花花绿绿等等。在主观上,则是由于我们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

朱德指出:要通过整党,通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一定要把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不愿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情绪,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不负责态度,以及摆老资格、闹地位、闹享受的个人主义等等坏东西加以克服。”

朱德当年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克服官僚主义的论述,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八)《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节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以后,通过检查和处理有关在执行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违反党纪的各种案件,保证总路线的顺利执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坏总路线的行为或倾向,就是我们纪律检查工作部门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任务。分别地来说,就是下列几项任务。

一、保护财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

……

二、防止并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

几年来,我们党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整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锻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并清除了一部分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出党,大大地巩固和纯洁了党的组织。但是,敌人还未完全消灭,帝国主义及国内被打倒的阶级还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还要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方法来破坏我们的事业,破坏我们党的团结,企图在中国复辟。而且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同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

的复杂环境中,因此我们仍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并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

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我们党处在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党员干部就容易犯“左”倾冒险的错误;相反,当我们党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党员干部容易犯右倾麻痹的错误。在我国对私营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对这一改造的反抗是必然的,而其中的一种形式,就是在政治的、经济的事务中,以他们的思想来影响、麻痹甚至攻击我们。因此,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将是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今后除了密切配合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了解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加强党内纪律教育之外,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严肃地、慎重地、有力地展开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侵蚀的斗争,并把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继续清除出党。只有从思想上、组织上两个方面来巩固和纯洁我们的党,才能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决议的正确实施。

三、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

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必须时刻注意巩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反对党内任何破坏这种联系的现象。我们的党只有在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监督的条件下,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阻力,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在过去几年里,党中央所发起的整风,整党,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农村中“五多”现象的斗争,以及对几起重要事件的处理,其重大的意义就是为了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纠正党员干部中不注意工作方法、不关心群众利益、不倾听群众意见、脱离群众、压制民主错误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使党真正成为群众所信赖和拥护的领导力量。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党员干部的思想和政治得到了提高,工作作风也有了显著的改进,党同群众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因此,今后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决议时,必须认真改进工作方法,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坚决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坚决反对违法乱纪的行为,进一步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今后应协同组织部门、宣传部门随时了解、检查和纠正党员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并认真处理对党员干部的检举、控告、申诉案件,切实做好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以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使我们的党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取得广大群众的真诚拥护,坚强地立于不败之地。

四、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

.....

(选自《朱德选集》第314—317页)

评注:本文是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上的报告。他论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以后,通过检查和处理有关执行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违犯党

纪的各种案件,保证总路线的顺利执行,防止并克服一切破坏总路线的行为倾向,就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分别说来,有三项任务:

一、保护生产,保证国家计划的切实执行。

二、防止并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想对党的腐蚀,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

三、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

朱德在论述第三项任务时指出:为了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伟大任务,必须时刻注意巩固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反对党内任何破坏这种联系的现象。“在过去几年中,党中央所发起的整风,整党,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农村中‘五多’现象的斗争,以及对几起重要事件的处理,其重大意义就是为了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纠正党员干部中不注意工作方法、不关心群众利益、不倾听群众意见、脱离群众、压制民主的错误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使党真正成为群众所信赖和拥护的领导力量。”

朱德的以上精辟论述,对于克服党员干部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破坏党群联系、不注意工作方法、不关心群众利益、不倾听群众意见、脱离群众、压制民主等等,正是官僚主义作风的表现。我们的党员干部,如果官僚主义严重;那就不可能得到群众真诚的信赖和拥护。

(九)《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节选: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同志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

关于我们党如何能够保证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在政治报告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我都完全同意。我们只要接受过去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方法,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反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反对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发扬民主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压制民主和压制批评的倾向;坚持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和“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方针,反对对待党内错误的自由主义态度,反对机械的、粗暴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坚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总之,我们只要能够在新的情况下,正确运用我们三

十五年来所获得的丰富的建党经验,我们就能够防止发生严重的错误,就能够及时地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使小错误不致变成大错误,使暂时的错误不致变成长期的错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的统一和团结。

.....

(选自《朱德选集》第 336—343 页)

评注:本文是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载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中共八大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是在我国已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即将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势下召开的。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代表党中央作重要报告。朱德作了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发言。

朱德引用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接着,朱德分析了能够完成这个基本任务的有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最后归结到我们党的领导和党本身团结的问题。认为“只要我们党能够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而不犯重大错误,只要我们党能够保持自己队伍本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巩固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团结六亿人民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关于党如何能够保证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朱德作了实事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论述。其中包括接受过

去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经验教训,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反对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和个人专断;发扬民主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压制民主和压制批评等等。

五、邓小平论反对官僚主义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他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是几经沉浮的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他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袖,即领导核心。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了中国革命在三十年代的第一次万里长征的话,那么邓小平则领导了八十年代的第二次万里长征。

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关于祖国统一、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国防建设、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论,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

在这里,我们将《邓小平文选》第1——3卷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精辟论述辑录出来,加以述评。

(一)《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节选:

一、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

二、群众运动的规律

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过去由于我们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执行不够,所以今天的群众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

什么是我们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呢？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事，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地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

三、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

.....

四、党与群众团体

.....

五、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

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用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但是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自动的运动，所以政府也不要采取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之下的政权，它的施政纲领和法令，是符合于党的政策的，是既照顾了工人、农民又照顾了地主、资本家的，所以是有利于基本群众的。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有利于基本群众的事情，就是在执行政府的法令；而政府在公布了这些法令之后，还必须保障其实现，所以把群众运动和

政府态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所以群众团体和政府对于群众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其不同的态度和作法。

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

(一)当某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并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

(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的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这种干预、包办的方法在表现上可以使群众容易得到利益,但是妨害了群众的自觉性,使群众不会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更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是有害的方式。

(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群众运动。

(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取坚持法令秉公办理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

(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地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就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

(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

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不能在地主面前去打击或批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以致增高地主气焰。如群众团体或干部有失理处,可以加以解释,同时指出地主的不合理。

(七)政府人员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同时,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如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

六、村级工作

……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64—76 页)

评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结论第三部分的第一节。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掌握群众运动的客观规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对于群众运动应采取扶植的态度,而不应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邓小平结合抗日战争中根据地建设的实际,从七个方面论述了人民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严肃地批评了官僚主义态度。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节选：

.....

中央指示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在中原区更为严重。由于反攻后处于比较紧张和分散的情况,各个区域的工作不能不带着较多的独立性。但因此而发展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相当普遍地缺乏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工作的松散、迟缓和效能之低,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错误倾向的自由主义,都达到相当惊人程度。因此,应在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中详细讨论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中原的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在完全战胜敌人,保障几十万大军供给等等方面,困难还是很多的,亟需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成解放中原全区的任务。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23页)

评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

示》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指示。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代表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原局这个指示。邓小平当时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实际，指示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上述错误现象，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和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邓小平坦诚地指出，这些现象在中原区更为严重。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按照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

(三)《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节选：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进行第三次整风。这次整风是处在工作任务更加繁忙的时候。我们面临三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这次整风要吸取前两次的优点，避免前两次的缺点。

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

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那末，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指出，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拿川东的征粮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有些县完成得很好，有些县则完成得很差，而同志们都是很努力的。检查一下，完成任务的往往比未完成任务的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入情人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动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

督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少一些。这就说明,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

重庆的工厂企业也是这样,凡是正确执行政策和工作作风好的,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南桐煤矿,干部并不多,但是工作做得好,原因就是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上级还未提出废除把头制时,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制度不合理,而且改革了。又如码头,干部也不多,而且工作复杂难做,但是他们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能够走群众路线,先摸清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又如兵工厂,由于生产尚未恢复,开始只发生活维持费,工资较低,工人普遍不满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简单下个命令,出个通告;二是开代表会,说服工人。他们采取了后一种办法,由工人推选代表,开了几天会;刘司令员也去讲了话。结果,包括原来准备向工业部作斗争的代表在内,全体举手赞成不增加工资。究竟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好,还是依靠群众、说服群众好?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我们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执行政策上和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而是埋怨上级给的任务重,干部少,群众条件不好。重庆码头和南桐煤矿的工作经验,对于这种错误的说法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批评。

有的同志还一遇到困难就怪到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身上。这是不应该的。由军队和老区来的三万干部,到新区做地方工作,是新干部的老师,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而且学会了之

后很难改变。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所以,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

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2—155页)

评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是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第一次整风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了第二次整风运动。在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进行第三次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是在取得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进行的。主要任务是查思想、查作风,纠正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邓小平指出:努力工作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不能赞成“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

两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有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不必努力了。于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贪污腐化,这是非常危险的。

(四)《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节选:

.....

当前工会的工作:

第一、必须进一步地组织工人到工会中来。.....

第二、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

第三,建立工会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一经初步整理,就应开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工会必须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认真而妥善的处理。

第四,必须加强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就长远来说,工人教育应以文化技术为主;就目前情况来说,仍应着重政治教育,同时注意文化技术教育。

第五,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今后仍应防止提出

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同时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即不经过工会和工人的讨论)观点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178—179 页)

评注: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论述了城市工作诸方面的问题。其中论及工会工作问题,提出要建立工会民主生活,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今天,仍应克服工会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以充分发挥工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五)《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节选: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

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很显然的,上面所说这些国家和党的状况的巨大变化,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我们向大会提出的党章草案,就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而对原有党章作了适当的修改。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14—215 页)

在说到我们党由于实行群众路线而得到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决不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都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末,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他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们往往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过实际的可能。

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

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恶劣的反人民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这种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义错误,往往是

同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分不开的。

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我们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党章草案在总纲部分和有关条文中,都提出了这个任务。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并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我们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

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

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必须使这些同志了解,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

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21—225 页)

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点,现在在许多组织中也还存在,这就是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过多过长的会议,不但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缺少深入群众和进行具体领导的时间,助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而且妨碍许多党员和群众的劳动和休息。这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同时出由于滥用会议的方式,把许多不需要提到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提到会议上来了。这种缺点也必须坚决地克服。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31 页)

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在过去几年中,党中央曾经多次组织全党范围的“整风”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中央领导的同志在召集下级同志开会或者同他们谈话的时候,主动地要求他们对于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批评,并且对于批评中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迅速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党内的由下而上的批评,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对于压制批评的现象,党中央也进行尖锐的斗争,处分了一些专横地压制下级批评的领导人员。

但是,必须承认,至今还是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少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打复的办法。这个事实,也是官僚主义病菌正在侵袭我们党的严重信号之一。每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为消灭这种恶劣的现象而斗争。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40—241 页)

评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在十一年前,即一九四五年召开过七大。在这期间,我们的国家和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党员数量极大增加,党成为执政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各地。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建国七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共产党员滋长骄傲自满情绪,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告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同时,要正视官僚主义病菌正在侵袭我们党的事实。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论述!

邓小平在这长达 3.5 万字的报告中,用较大篇幅,结合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论述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即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骄傲自满情绪,命令主义。过多过长的会议,助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侵袭党的肌体,每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为消除官僚主义而斗争。

(六)《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节选：

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革命当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在建设当中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也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64 页)

评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是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从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是党和国家很长时期的任务。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

建国以来,我们已经搞了七年的建设。要善于接受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善于利用国际国内好的条件。否则就会犯错误,栽跟头。

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节选:

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

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

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70—271 页）

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

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所以,对这十六字方针应当想通。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基本不合理,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但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总是会有的,所以有时闹事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不要紧,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

评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是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报告强调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执政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所谓监督来自三方面,即党对党员的

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扩大各方面的民主,但不提倡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的“大民主”。共产党不能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去领导,而要用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思想去领导。“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自己”。

邓小平关于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这些论述,同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结合起来,同党纪政纪的规定结合起来,成为现今执政党建设的指南。

(八)《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节选:

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虽然是十分艰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深信,青年团员和中国全体青年必须能够克服自己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这是因为,中国青年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的关怀,而且有自己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近年来的建设工作,中国青年已经有了良好的表现。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吃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不仅要把这个光荣传统继

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大大地加以发扬。应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顺利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朝气蓬勃的,但是也有弱点。这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往往害怕困难,不愿吃苦耐劳,或者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但是,这不能责备青年,而在于党和团对他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充分。只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改善对青年的思想工作,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美好的将来的必由之路清楚地告诉他们,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并且努力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那末,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广大的青年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勇敢地、愉快地迎接自己的战斗任务。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在这个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青年团员的模范行动和创造精神将起重大的作用。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上写下青年们的光辉的一页,我们就一定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戒骄戒躁,克勤克俭,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用艰苦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278—279 页)

评注:邓小平的这篇祝词,回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年中积极参加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祖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青年运动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适

应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新民主主义的青年团将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亲密助手和中国优秀青年的旗帜,共青团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幸福的生活,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为此,党和团的组织必须改善对青年的思想工作,努力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这是邓小平联系青年团工作,青年肩负的繁重任务,论及纠正党团组织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等错误倾向。

(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节选: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在过去我们无非是闹革命,革命胜利以来,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同志们不要以为建设社会主义

没有问题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里也讲到,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

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过去多次讲过的。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将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就可以使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等以外,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在这一方面,我想谈四个问题:第一个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第二个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第三个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第四个是学习的问题。

题。

第一个问题,民主集中制。……

第二个问题,建立经常工作。……

第三个问题,培养和选择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择各级的领导核心。……

第四个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03—317 页)

评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在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报告,总结了建国十二年、特别是近四年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十年的奋斗目标。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问题。邓小平结合执政党在国际、国内的责任,就健全党的内部生活,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对我们党作了一个总的估价,即党有五好: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中央,有大批好的干部,有好的传统,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接着尖锐地指出:“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的缺点。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受到了削弱。”这给党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危害,值得全党严重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进了城,执了政,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因此,必须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纠正错误,注意全党的生活,树立好的榜样,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十)《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节选：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的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

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 344—347 页)

评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是邓小平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两次谈话的节录。他介绍了我们党和毛泽东从一九三五上遵义会议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经验。

邓小平指出：“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所谓成熟的党，必须具备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中，在组织上必须具有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概括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显然同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的品格和作风是不相容的。

(十一)《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节选：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

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有的单位问题成堆，老是解决不了，主要是领导班子没有真正调整好。要坚决执行军委会议关于哪些人可以进领导班子。哪些人不能进领导班子、不能重用的规定，抓紧把各级领导班子选配好，整顿好。一九七五年我们讲过软、懒、散三种情况，现在有些领导班子还是这个问题。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

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

军队的作风要做个好样子,就要解决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要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紧张快干。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军队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整顿,还有一个恢复政治的职能、作用、威信的问题。我们多次讲过,要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这次会议之前,我又讲过,通过这次会议,要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起码要起这个作用。

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整顿,一定要从严。不论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整顿政治机关,没有一股子劲头不行。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2—124页)

评注: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各方面进行整顿的形势下召开的。

邓小平在会议上讲了四个问题:实事求是、新的历史条件、破和立、干部以身作则。整顿就要有破有立。整顿,主要

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要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十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节选：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企业要

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49—152 页)

评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讲话包括四个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在论述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时指出：“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他警告说：如果不克服官僚主义祸害，不实行改革，那就会葬送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

(十三)《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

节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

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评注:这是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讲话的节录。他强调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级。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又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的一些同志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居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执政党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中肯的,至今值得执政党及其党员警惕的。

(十四)《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节选：

.....

代表们，同志们！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

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209页)

评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是粉碎“四人帮”三年之后召开的专业性一次空前盛会。邓小平号召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和其它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它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作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恢复和发扬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

(十五)《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

节选:

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

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像是理所当然。近来上访人员很多,其中确实有少数坏人;也有一部分人反映的问题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当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策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这就是非常错误和不能允许的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总之,搞这个生活待遇的规定现在是时候了。

我还说一说,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比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

因。顺便说一下,我们现行的有些做法非改不行。过去规定,机密文化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章程嘛。现在没有办公制度,有些高级干部习惯于在家里办公。我不是说少数年老体弱的同志不可以在家里办公,但是一般的人不应该这样做。好多事情,集体办公一下就解决了,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

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官僚主义自然而然会减少一些。当然,我们的生活会没有过去那么舒服,但比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是不知要好多少。有时也会有些不方便,比如坐小汽车去看电影,就要出点钱。你不愿意花那个钱,不看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考虑到高级干部在工作上的某些需要,今后他们的工资标准不再降低,但也不能同一般干部和职工差距太大,不能同群众的生活差距太大。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的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

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且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18—220 页)

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有人说他们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现在庙也太多了,我们最近考虑,国务院的部委分得那样多好不好?部委下面有没有必要设那么多司局?军队是不是需要搞那么多兵种?可不可以适当改革一下?我认为,把我们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军队的指挥机关搞得这样庞大、这样臃肿是不行啊!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

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了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这个问题,同我们每个人有密切关系,请同志们好好考虑一下。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休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但当时感到不那么迫切,当时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四十七八岁。一九六六年到现在十三年,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六十岁左右了,这个问题迫切了,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实行退休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不少同志提出这个意见,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25—227 页)

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管理人员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就是困难。又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下的人怎么安置,这也是困难。又如我们要建立退休制度,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思想抵触,这也是很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培养、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老干部对他们要传帮带,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作风,要使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

同志们!我们的高级干部都是长期受党的培养教育、久经考验的老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坚决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是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的,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的,是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道路上,大家一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模范地带头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地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一定会认真选拔、培养好接班人,逐步地做好交班工作,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9—230页)

评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讲了三个问题,即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认真选拔接班人、切实关心群众生活。这三个问题都紧扣着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纠正一切不正之风来论述。这个报告是邓小平著作中较多地论述反对官僚主义的一篇。同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内容是相通的。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干部特殊化是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高级干部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

事情。对群众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漠不关心，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不但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做官当老爷，脱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实在不像话！

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使高级干部同下面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考虑到高级干部在工作上的某些需要，今后他们的工资标准不再降低，但不能同一般干部和职工差距太大，不要享受那些比工资还多的特殊待遇。这些论述，同一八七一年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雏型——巴黎公社关于“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与革命》，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6页），以使他们同广大工人、农民结合起来的原則精神，是吻合的。

根据当时国家机构庞大、臃肿，年轻干部上不来的情况，邓小平指出：“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他作了形象的比喻：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以致年轻人上不来。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地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前几年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这只是过渡性的。要真正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使庙里的菩萨让出来，新菩萨去坐位，这是一个紧迫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千秋万代的事业。

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

艰苦奋斗，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同甘苦，共命运是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毫无隐讳地、实事求是地指出：林彪、“四人

帮”极大的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但是,把问题统统归到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包括特殊待遇在内的一些脱离群众的制度,文化革命前已经有了,但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厉害。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我们较长时间以来相当地脱离群众,“衙门作风”严重,“做官当老爷”。因此,“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

邓小平的这个报告,至今已经十七年。大批老“菩萨”退下来了,新“菩萨”上坐位了。报告的精神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十六)《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节选:

我今天讲三点:一、讲这次会议;二、讲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三、讲工作方法。

第一个问题,这次会议很重要,开得非常好……

第二个问题,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第三个问题,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

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

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应该说，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这样能够搞四个现代化呀？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各有专责，有管技术的，有管科研的，有管财务的，有管后勤的，等等，需要商量的事也可以几个人商量决定。上下都要研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这次会议的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较好。中央全会带了个好头,我看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74—283 页)

评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讲三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即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

我们党从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党面临着艰巨繁重的任务: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各方面的整顿等等。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

平论述了“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要着重研究体制改革，即从社会体制的改革方面克服官僚主义，但也要从改进工作方法方面克服官僚主义。要发扬民主，同时需要集中，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讲实话，话不离题。

(十七)《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二日)

节选：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我讲的不是像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好应付。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比如有好多干部没有打过仗，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装备又比较落后，等等。但是经过对越作战可以看出，勇敢这两个字我们还是有的。军队勇敢，这很好。仗打起来，开始可能吃些亏，经过一段时间情况就会变化，有勇敢这一条，我们就能学会打仗。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这件事在一九七五年我

他们就提出过,做了一些工作,也见效,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经过这几年,军队的各级机构又加大了,随之官僚主义现象也发展了起来。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在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加强国家建设。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84—285 页)

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体制有很多问题。比如,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出一个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

体制、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五十年代搞了个军官服役条例,一直没有行通,后来放下了。其实那个条例基本上是个好设想、好办法。如果那个东西执行了,就不会有现在的困难。这次会议后,就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国务院也

要办这件事。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队要打仗。当然规定要切实可行。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否则一个人一个人地处理问题,处理不下去。军队老同志退休,办法是军队把房子盖好,再转给地方。现在只能这样做,因为地方一下子接管还很难。还有,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军事院校的好多教员,也可以用文职人员,不一定用军人。教数理化的为什么一定要军人呢?该当教授就当教授,该当讲师就当讲师。军队医院也可以实行医务人员的制度,定技术职称,搞那么多行政职务干什么?这些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

这次精简,有了一个编制方案。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编制、体制。有些同志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很值得我们思考。比如,有的同志提出,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就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87—288 页)

评注:《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

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了四个问题：“消肿”、改革体制、训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其中的“消肿”问题和改革体制问题，论及提高效率，提高战斗力，克服官僚主义。

军队机构重叠、臃肿，由此带来各级指挥不灵，官僚主义现象发展起来等问题。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就提出过军队“消肿”问题，做了一些工作，也见效，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经过几年，军队各级机构又加大了，随之官僚主义现象也发展起来。一九八〇年召开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制定了比一九七五年更进一步的措施。认为不“消肿”就不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地方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也需要“消肿”。

军队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精简机构，建立退休制度，军队和地方都要办这件事。邓小平从社会性高度，即从体制、制度上涉及克服官僚主义问题。换言之，即克服体制上、制度上的官僚主义。

(十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

节选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同志和我不兼任副总

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王任重同志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经过与有关各方协商,也准备建议做一些变动。以上这些变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反复研究过的。这次作为中央的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

关于国务院负责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工作。

四是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

措施。……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

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22页)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位,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

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中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过分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

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一九五

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

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327—332 页)

现在说一下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主义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的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多。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34—335 页)

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此外,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社会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还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36—337 页)

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经过多次酝酿,有一些已经在五中全会以后开始实施,有一些即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其他也将在条件成熟时陆续采取具体步骤。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以外,正在考虑逐步进行的如下重大改革。

第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第二,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委员会,都由党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的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第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

第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

第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责

任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

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在中央制定并正式公布新的制度和条例以前,有关各方面的工作,仍照现行制度办事。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 and 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任务。……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39—342 页)

评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邓小平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高度、较多地较集中地论述官僚主义的著作。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于一九八〇年二月召开。会议解决了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这次中共全会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许多问题。中央书记处成立以来，工作很有成效。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方面，党中央带了好头，已经迈出第一步。

同年八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讨论研究了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问题，以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问题。作为中央的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这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

关于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的调整，中央做了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四是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这是富有远见的考虑，也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因此，必须进行改革。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它制度的目的：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邓小平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应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即经济上、政治上和

组织上的要求。这些要求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政治权利,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发达兴旺。体制、制度上的官僚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同这些要求是不相容的。

邓小平坦诚地、直接了当地表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的主要的弊端有五种现象,这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把官僚主义现象摆在首位,击中了最主要的时弊。然而,根据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其余四种现象正是产生和助长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的一系列的表现和危害。向全党提出警告:“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大问题。”“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者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诸种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包括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上述警告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应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分析官僚主义的根源时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的党和国家现存的官僚主义,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在这里,邓小平应用了共性和个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分析了官僚主义。

邓小平又指出: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这是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

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

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呢?“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把体制、制度的改革作为根本。这就抓住了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同时受到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影响。因此,邓小平认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除上面提及的以外,中央当时正在考虑进行六个方面的重大改革: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切实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二、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四、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

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六个方面的重大改革,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也有利于克服党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此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全面展开和深化,就是围绕着这篇讲话的思路进行的。

(十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节选:

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确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中央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报纸上的正确批评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

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

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

.....

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6—368页)

评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强调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各方面调整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我们的宣传要实事求是，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邓小平指出：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确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但应注意不要把个别现象当作普遍现象。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同时，他又指出：“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脱离群众，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必然要犯官

僚主义的错误。

(二十)《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节选：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們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

第二点,这个问题要涉及到几百万人……

第三点,我建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的精简方案。……

第四点,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96—401 页)

评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效率低……这种状况必然败坏党和国家的声誉,同时又是产生和助长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人民不赞同,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机构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因而,这是一件大事,要求我们决心要大,工作要细,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选比较年轻的人来接班,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要德才兼备。

(二十一)《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节选: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十年、两届还是需要的,一届恐怕不好,太急促了。顾问委员会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

我们都是老同志,说话开门见山。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

第三,我们还可以起一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

评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对顾问委员会的性质、设置顾问委员会的目的、任务、开展工作的注意事项都作了概括的说明。

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在党的十二大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将来取消。设置的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批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按照新的党章办事,任务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它任务。注意事项有三点:第一,顾问委员会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顾问委员会成员要联系群众。第三,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

顾问委员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尊重生活和历史辩证法的结果。又根据邓小平一贯的思想,这一过渡性质的组织对于消除机构臃肿,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起到积极作用。

中央顾问委员会从一九八二年召开十二大时成立起,至一九九二年召开十四大止,完成历史使命。江泽民在党的十

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十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性功绩。中央顾问委员会向这次代表大会建议，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中央委员会。”

(二十二)《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节选：

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前景如何，会遇到什么障碍？我想，是不是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

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

二是外汇问题。……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力又收了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上半年经济发展速度比较低，就有这么一条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从何入手，要很好研究。一九八〇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9—160页)

评注: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时经济情况时的谈话,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邓小平指出:看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八〇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应该提到日程上来解决。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如果不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体制,必然要阻碍经济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原理,来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二十三)《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

节选:

迈: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

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情,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70 页)

评注: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的谈话,就广泛的国际国内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当记者提出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包括贪污、受贿,还有官僚主义,邓小平是否了解这些情况时,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回答:“我了解,是有这些现象。”表示: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教育干部。

外国人也知道中国存在着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而不正之风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必须下决心,花大气力加以克服。

(二十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月)

节选：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76—177。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

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77 页。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第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

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78 页。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

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这不是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完成得了的。但是制定一个目标十分重要。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在这方面，严格说来我们刚刚开步走，需要思考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还很多，必须认真去做。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如何做还没有考虑清楚。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

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领导层有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9—186页。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评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邓小平在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的四次谈话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内容节录。这篇重要的文献。同另一篇重要文献。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在思想内容上是完全相通的、一致的。这两篇重要文献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论述了涉及克服官僚主义的以下四个问题: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部分或环节带来的障碍。因此,“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邓小平在两处谈到这个问题。

(一)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二)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指出：“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两处的表述是一致的。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两处都提到克服官僚主义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显然，人民群众万分憎恨官僚主义，只有克服官僚主义，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换言之，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邓小平在这里所指的官僚主义，主要指制度上和体制上的官僚主义，也指思想方法上和工作方法上的官僚主义。

三、政治体制

改革的内容。包括：第一，党政要分开。第二、权力要下放。第三、精减机构。邓小平区分了主次，认为第一点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在会见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指出，总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同样区分了主次，认为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思路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在这里，他至少应用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此外，邓小平还提出反对

教条主义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照抄照搬原苏联的政治体制。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不言而喻,可以借鉴别国的改革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

邓小平在会见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又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邓小平的思路是: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邓小平先后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和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都论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含有克服官僚主义,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搞好四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等重要内容。

(二十五)《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节选: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地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

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

增强活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党的都要大,我们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也都偏大。我们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打倒了,后来解放了,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凭自己的经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但步子要稳妥,也不是只讲年龄这一条,还要德才兼备,并且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队结构。年轻化这件事障碍不小,不克服不行,还要做许多工作。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包括精减机构,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是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正在议论,要在十三大以前理出个头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用三年时间见效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复杂,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1—243 页)

评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是邓小平会见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谈话的一部分。

邓小平在谈话中,论及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

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从农村推广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并取得显著成效,面临的问题是加快改革的步子。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日程上来,其任务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

论及改革的总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要达到这个总目的,要做到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基层的积极性。其中,邓小平把提高效率和克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论述。指出:“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包括精简机构,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这些论述,同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总目标的论述是一致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场所论述了这个重要问题。

(二十六)《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节选: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

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动乱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次事情总的说还没有完啊！目前学生还没有上课，就是上了课，也还会上街。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总之，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

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297页)

评注:《组织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是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他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一九八九年动乱平息之后,党和政府确实有些事要向人民作出交待。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班子。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实事,体现出反对腐败是真正的、不是假的。在全国范围内抓一二十件腐败、贪污、受贿的案件,公布于众,按照法律严惩。根据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中的论述,滥用权力,徇私行贿,贪赃枉法,腐败,贪污,受贿等等,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因而,扎扎实实做几件人民群众关注的事情,无疑具有克服官僚主义的意义。

(二十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节选: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

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

下面谈谈最近抓什么工作的问题。不能等暴乱完全平息,现在就要一面抓彻底平息暴乱,一面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哪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急迫需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要统统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

第一,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

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而在原材料的分配中,小企业吃了大企业,结果国家损失大。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

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开放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国务院来做。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有什么了不起。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

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

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

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这是个好机会，一下子就把全国的非法组织取缔了。这实在是好事情。……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314页）

评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是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历了两代领导集体。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从一九八九年平息动乱之后，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全党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问题，有意识地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是关系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的最关键的问题。

新的领导集体刚建立，邓小平就提出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人民满意、高兴的事：第一、经济不能滑坡。要在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邓小平指出：“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这几件人民满意的事，都具有克服官僚主义的意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邓小平以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提出警告：“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时指出：“一步实际运动胜于一打纲领。”（《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14页）第三代领导集体建立以后，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扎扎实实做了几件人民满意的事情，卓有成效的开展工作，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逐步树立起威望。

（二十八）《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全文：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一九八〇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

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小平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22—323 页)

评注:邓小平写给中央政治局的短信,大约有 700 字。然而,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他首先表述了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局着眼,当时提出辞去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进而将向全国人大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请求的缘由。

邓小平深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并于

一九八〇年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其中包括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和完善干部退休制度。他身体力行,一再提出退休的愿望,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为清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弊端树立了典范。鉴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一九八九年六月),选出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邓小平适时地提出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实现夙愿。用他的原话来说:“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这也体现了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怀。

邓小平抒发了一个老党员、老公民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忠于党和国家事业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的决心和信念。

(二十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节选: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

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

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在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为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

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80—382 页)

评注:一九九二年,八十八岁高龄的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就广泛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其中,在本文第五部分论及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干部。“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的论述,是一致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关键的或决定的因素在人,在干部。

邓小平批评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

人读的。要求大家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邓小平当年批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言论,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会议和文件,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开会、发文件。在吃透上级文件和指示,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一定的和重要的会议,下发一定的文件,总结经验,提出指导意见,用以推动面上工作,是必要的。然而,会议成灾,文件成灾,这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群众对此很有意见。文山会海是一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党风不正的一种表现。邓小平要求我们重视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这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弊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精简会议和文件,节约时间和金钱,办实事,讲效率,多做少说。

至于利用会议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请客送礼,游山玩水,徇私舞弊,挥霍国家和集体财物,大轰大嗡,搭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等等,也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群众是极为不满的,都在应该解决好的问题之列。

第二篇

官僚主义的根源

官僚主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对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反动。无论是制度上和体制上的官僚主义,还是思想作风上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都具有深远的、浓重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因此,正确地揭示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前提。铲除了官僚主义由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之时,正是官僚主义寿终正寝之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批判官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掌握这个思想武器,采取实际步骤克服官僚主义,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艰巨任务。

一、官僚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

官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一定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恶性膨胀,有着深远的、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历史根源。正确地揭示官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它进行武器的有力批判的前提。

(一)源远流长的官僚制度的影响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从原始氏族制度演变而来的。社会学家把原始社会区分为前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社会组织又区分为原始人群、血缘家庭、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几种形式。部落联盟的出现,表明原始氏族社会已进入军事民主制时期,这一时期是原始公社解体到国家产生的过渡阶段。在中国,部落联盟的出现距今有 5000 多年,形成奴隶制国家的夏朝距今有 4000 多年。在这之间的 1000 多年的时间里,标志着我国辽河流域当时产生了基于原始公社、又凌驾于原始公社之上的具有国家雏形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也就是部落联盟组织。换言之,我国的原始氏族社会经过若干万年的发展,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终于分裂为阶级,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国家及王权的早期形式,阶级统治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官僚制度的早期形式也就逐步建立起来。

我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古代的官僚制度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史的一个有机内容。它反映了历代的政权性质和统治阶级施行的统治手段。它在每一个固定的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内,都有它自己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各种职官的名称、建置、职掌的变迁,品级、员额的增减,不仅历代王朝根据需要有因有革,就是一个朝代之中,也往往废置不常,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

在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官僚制度,中国老

百姓见得最多的、最坏的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人们对体制性的官僚政治和技术性的官僚主义作风都十分痛恨。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学术界，对于在中国大地上无所不在地飘荡了几千年之久的这个幽灵——官僚政治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幽灵进行彻底清算，这在今天以前还是做得不够的。为了清算这个幽灵，我们注意吸取传统的断代史分类提举的优点，本着有简有繁的原则，按朝代依次叙述官僚制度。诚然，在这里只能做到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1) 夏朝的官僚制度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中国历史发展到夏朝，即原始社会解体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研究中国的官僚制度，当然应该从夏朝开始。但是，由于至今发掘的文化类型遗址和史料有限，因此这里只能作简要介绍。

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记载^①：公元前 21 世纪左右，大禹之子启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夏朝。传说中舜命禹治水，治水成功后，禹被任命为司空。其后禹受禅而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他选定协助其治水有功的东夷伯益做自己的继承人。由于禹的部落有治水之功而超越于其它部落之上，大禹之子启借其势杀死伯益，帝王自为，从而破坏了民主选举制的禅让制度，建立了传子制度，这就是夏朝的开始。夏朝的建立，使氏族民主制崩溃，公天下而转为家天下，家庭、私有财产制更加发展，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其中有扈氏不服夏启杀伯益，起来反抗。结果有扈氏被夏启用兵所灭，将其部族降为奴隶。

启建立夏朝后，淫佚享乐，其子太康，荒淫不减乃父。由于内部和社会外部的矛盾斗争，发生过“太康失国”之事，即东夷族首领后羿“因夏氏以代夏政”，但因政启家族毕竟强大，到

了夏启的第四代——少康复国中兴。这足见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历史发展的曲折反复。

夏族为加强奴隶制国家的残暴统治,加强行政效能,设立官守,即所谓“夏后氏百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僚机构或官僚制度。

夏后氏之下,有三正、六卿,有祭司史官,设有太史令。官僚中管理音乐的称乐正,管理车辆的称车正,管理膳食的称庖正,并设有采风之官。夏朝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军事制度,赋税徭役制度,文化教育制度一以“五礼”即军宾嘉吉凶为教育内容。这一切使奴隶主在政治实体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加强了对奴隶的统治。

(2)商朝的官僚制度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奴隶制在商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逐步建立了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

根据《中国历代官制简表》记载②:商王是商朝的最高统治者,王以下由政务官和事务官组成了商朝的中央官僚机构。

政务官是处理外廷的官吏。它们是:

尹:治理商王国内政的大臣,职似后世的相,权力很大。

司空:王左右的重要官吏,受商王之命,辅佐商王处理内政和外部事务。

卜:掌商王占卜的官吏。

巫:掌商王祭祀的官吏,地位和卜相似。

乍册:商朝的史官,掌握神权,主持册命,地位很高。

卿史:商朝主祭祀的官吏有卿史、御史、史三职。

亚:商朝的武职官吏。

服:服和多马亦为商朝的武职官吏。

射：亦为商朝的武官。有管理特种部队的“多射”、“三百射”等。

犬：为司犬的官吏，卜辞中常见“犬”、“多犬”。

戍：戍字从戈从人，人在戈在，亦属武官。

事务官是管理王室内廷事务的各级官吏。它们是：

宰：宰在殷代为奴隶的总管，主要管理奴隶主的家务和家奴。

臣：商王的近臣，掌为王征战，具车马、占卜等事。除臣之外，还有“小臣”、“多臣”之职，他们受王之命征战邦方。

小臣：管理王室田庄的农耕事务的官吏。

小多马羌臣：主要管理羌奴，或管理养马奴隶及商王车马。

六宫官：商朝的六宫官近似后世的皇后中宫官。

如果说以上是商朝的中央机构的话，那么受封在商王朝中心地区以外的侯、甸、男、伯可以说就是地方机构了。

(3) 西周的官僚制度

武王灭纣，建立了西周王朝。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

周王又称“天子”，是天下的共主、西周的最高统治者。周王下的职官设置是：

师、保、傅：所谓师者，天子之师；保者，保安天子；傅者，相傅天子。

太宰：太宰即大宰，本是王室家事的总管。因为平时与王亲近，又负责总管王室内廷事务，进而助王总领百官。太宰与后世的相职相似。

三事大夫：指管理民政的常伯（即牧），管理官吏选任的常

任(即任人),管理司法的准人(即准夫)。

司徒;管理民事、王田、军务和卜事的官吏。

司马:司马主军,并参预周王册命典礼。

司空:管理筑城及其它工事。

司寇:管理刑狱。

三左三右:三左即大史、大祝、大胥,三右即大宰、大宗、大士,均为国王左右的近臣。

尹伯:处理周王朝外廷日常事务的总头目。

大都:管理诸侯和国王子弟采邑的官吏。

小伯:管理卿、大夫采邑的官吏。

艺人:指卜、祝、巫师、工师等技术官吏。

表臣百司:管理处廷政事,职近似后世的办公室主任。

太史:负责记事和制作册命的官吏。

庶常吉士:具体办事的士官。

林(牧):管理山林、牧畜的官吏。

田人:管理王田的田官。

司射:主射事的官吏。

大亚:武职官吏。

虎贲:负责保卫王的安全,职近似后世侍卫官。

缀衣:掌管王的衣服。

趣马:管理王的马匹。

左、右携仆:管理王用器物或御车的仆夫。

庶府:管理王廷库藏。

周武王灭商以后,对西周王朝直接控制的王畿以外的广大土地,实行了分封制。分封的诸侯分“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被分封的诸侯国自然成为西周的地方官僚机构。

官制区分为内外服之称,起源于周朝。所谓内服,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吏;所谓外服,指被分封在王畿范围以外和边远地区的贵族、侯伯。^③

夏商周三朝是我国处于奴隶社会的三个王朝。它们都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和剥削直接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社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社会的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是:奴隶主是统治阶级,主要由大土地所有者、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组成,它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并占有奴隶本身;奴隶是被统治阶级,毫无人身自由,作为会说话的工具任凭奴隶主役使、宰割。奴隶主为了维持统治,镇压奴隶的反抗,建立了国家官僚制度,设立了军队、法庭、监狱等一整套暴力机构。据历史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官员人数是“夏百二十员,殷二百四十员,周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④。这些数字虽然不够精确,但它说明了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官僚机器从产生到不断扩大和完善的过程。官僚机器和官僚制度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正是由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作用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这正是最原初的或最早的体制性官僚主义,技术性官僚主义的政治作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历史渊源。至今为止,官僚主义从产生到恶性膨胀,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因此,克服官僚主义无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官僚主义之多,原不足怪。人类社会要铲除官僚主义,不是速决战,而是要经历很久的历史时期的持久战。

(4)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僚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从政治制度上看,是由以各诸侯国君为核心的专制和以贵族政治为主的政体结构,向中央集权君主专

制和以官僚为辅佐的政体结构的时期。从社会性质上看,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从时期界限上看,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其中从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476 年为春秋时期。从公元前 475 年到公元前 221 年为战国时期。

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即春秋时期的开始。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列国争霸,相互兼并,有的封国灭亡了,有的封国扩大了。特别是春秋中后期,随着各国新兴力量的不断壮大,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列国的官僚制度先后突破了“周礼”的框框,越“周礼”的事情到处发生。大致情况是:

第一,东周王室的官制仍沿袭西周,变化不大。第二,鲁、齐、晋、郑等国表面多沿用西周的官名。第三,宋、楚、秦三国各成系统,皆不采用周制。比如宋国以太宰、大司马对掌文武二柄。楚国则以令尹、大司马分掌文武大权。秦国又是庶长、大浪造执掌大权。秦孝公正是从庶长手里夺回大权。任用商鞅为左庶长进行变法的。^⑤

战国时期概况:春秋时期的大诸侯国相互兼并称霸,战争此起彼伏,最后形成战国时期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强并立的局面。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相互之间兼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地盘也随之扩大。这不但要求中央机构变更,也要求地方机构增改。就中央机构来讲,国君之下文武对掌二柄。如秦国开始确立了丞相制度,同时国尉、将军之称号也出现了。秦武王置左右丞相各一人,丞与承通,丞相就是承君王之旨,体现了君王的权威,是辅助国君治理天下的大臣。而楚国不置相,仍沿用令尹,不置将军而以柱国或上柱国为最高

武官。各国在相、将军之下的官职是不完全相同的。大体上三晋是一个系统，齐国则另是一个系统，秦、楚又各成其系统。七国的地方机构是郡县两级。郡和县的长官都由国君任免，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精神。^⑥

战国时期各国官制越来越趋向统一，特别是秦国官制到了战国末期已大体接近了统一之后的情形。这一切都为秦汉乃至以后封建官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 秦朝的官僚制度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嬴政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从此，我国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根据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秦始皇在原有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一套职官制度。其中包括中枢官制、地方官制、军事官三大部分。^⑦

中枢官制：在皇帝—最高封建统治者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及九卿等，以掌握全国的政治、军事，成为秦朝中央行政中枢。

地方官制：分郡县两级（开始设三十六部，以后扩建至四十余部），郡有郡守、郡尉、监御史，分管一郡之政治、军事。郡下有县，为全国的基层政权。县设县令、县丞、县尉，掌一县之事。县以下有亭、乡等，但不属于一级政权组织。

军事官制：秦设将军统兵，但又往往其它官职统兵出征。秦有位在卿上的前、后、左、右将军。此外象郎中令的属官中郎、外郎、仪郎以及调护诸将军关系的护军都尉，皆属武官。

(6) 西汉官僚制度^⑧

公元前 202 年，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官制，大体沿用秦制，而有所增减。

中枢官制：设有相国（丞相）、大尉、御史大夫，谓之“三公”。设有属官，以佐政务。“三公”之外，又有“九卿”。武帝以后，往往以“大将军”掌大权，则与秦不同。

地方官制：与秦颇有不同之外，大体是：

第一、在全国各地普设郡、县，而又分封王、侯两级爵。郡有守，县有令，各有属官，与秦制相同。而王、侯封国中，则仿汉中枢之制另设一套官制，这与秦制不同。

第二、武帝时，在全国范围内划为十三州，每州设部“刺史”，其官秩不高，但“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权力很大。

第三、品秩如秦制，以“石”计禄。高至“万石”，低至“斗食”，多寡颇为悬殊。

第四、爵，沿用秦之二十级爵，但主要为“关内侯”、“彻侯”二级。

第五、西汉官吏，依品秩不同，佩不同之印绶。佩印之制，战国已有，汉沿用之而加详其制度。

西汉时期二百多年中（公元前 206 年——公元 8 年），对于官制作过四次重大改革。

军事官制：武职仍有大将军、将军之称。大将军是将军的最高称号，多由功臣贵戚担任，或统领兵征，或预闻国政。九卿中的光禄勋守卫宫殿，卫尉守卫宫门，皆属武官。

（7）东汉官僚制度⑨

元元 25 年，刘秀称帝建汉，史称东汉。东汉官制基本上同于西汉，但“三公”拥有虚名，天下事尽入尚书。权力归台阁，九卿亦衙，这与西汉不同。

中枢官制：以太傅为“上公”，不常设。以太尉、司徒、司空

为“三公”，与西汉之名号不同。“三公”所属有长史、属、令史、御属等。如太尉之史属 24 人，分为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等。另设“黄主簿”等官。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其与西汉不同者，“光禄勋”设中郎将（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东汉末又有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少府”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尚书在西汉成帝时，初分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尚书”又设左右丞相 2 人，侍郎 36 人，令史 18 人等。“尚书”之组织庞大，职权渐重，所谓“政归台阁”，实为后世政府之雏形，此为东汉之特制。

地方官制：仍沿行西汉分封王、侯与州、郡、县双轨并置之制。县侯、乡侯、亭侯之封为东汉所设，但东汉王侯之权力已远远弱于西汉。

东汉以司隶校尉管一州称“司州”；治京畿之地。外设 12 州，每州设刺史 1 人。州部之下有郡、国，郡国之下为县，在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设“道”，事实上已形成州、郡、县三级官制。东汉末改州刺史为“州牧”，权力增大，目的在于镇压农民起义，但又为豪强割据创造了条件。

军事官制：高者设将军，以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四者品秩比“公”。又设前、后、左、右将军，均位“上卿”。将军之下设长史、司马及从事中郎等。其领军皆有部曲。如大将军营五部，每部有校尉 1 人，军司马 1 人。部下有“曲”，每曲有军侯 1 人。曲下有屯。灵帝时设“西园八校尉”防守京都洛阳，以宦官负主要责任，开宦官统兵之恶例。

东汉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加强对少数民族控制，设有

专官多种,如“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卫”等。

(8)三国时期的官僚制度

汉末丧乱,群雄并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南北统一)近400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既亡,孙吴、刘蜀、曹魏三国鼎立,各霸一方。

三国时期的官制多与汉同。但也有变化。⑩如秩禄改为九品;尚书别为一台不属少府;创立中书、秘书二省;屯卫不归于南北军,别置领军之职等等。然因各国置官多寡不一,职官升降纷乱,这里只求提供轮廓。

三国诸公秩禄一品,职位很高,是执掌国家文武的大员。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魏置相国,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改称司徒,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复称相国,蜀吴两国分别在章武与黄武初年置丞相。太傅、太保蜀吴不设专官,或以他官兼领。又因三国时期兵事频繁,三国都在立国不久设置大司马、大将军,蜀国曾设置右大将军,吴国也曾以上大将军和大将军并设。蜀的太尉不常设置。魏黄初称司空为御史大夫。此外还有称为从光的光禄大夫和右骠骑将军,秩禄二品,或比三公,都是很重要的国家大员。

九卿是次于诸公的重要官员,其职掌除廷尉、大鸿胪、大司农三卿有国家政务性质外,其余皆是宫廷服务性质。九卿中太常仍居首位。

建安18年(公元213年),魏于少府之外设尚书台,置尚书令。建安24年(公元219年)蜀吴亦置。录尚书事一职,魏以公卿权重者为之,仍是职无不总的大官,但非常官,死辄罢之。蜀称平尚书事,吴称领尚书事或省尚书事。尚书台的主

官是总领纲纪无所不统的尚书令,左右仆射是他的副手。蜀吴不分左右,但称仆射。尚书台仍分曹办事。

三国时期的中央监察机关称为御史台。御史台的主官本是御史大夫,魏文帝黄初2年(公元221年),改御大夫为司空,又改御史中丞为宫正,后皆复旧名。属官治书执法掌奏劾、治书侍御史掌律令,侍御史之下又统八曹。

魏黄初置散骑常侍,这是汉代散骑和中常侍的合称。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是皇帝的近侍官。

建安4年(公元199年),曹操任丞相时,自置领军,后改为中领军。蜀国也有中领军,复有领军、前领军、行领军等官号。吴国称领军将军,复有左右领军。

三国时期地方上最大的武职官员是官秩二品的四征将军。所谓四征主要指东西南北四方,并兼统诸州刺史。地方行政仍行州郡县三级,其首官仍称刺史、太守、县令(长)。刺史又分为两种:一是持节都督即领兵刺史,二是普通州刺史即单车刺史。皇帝诸王各有封国,仍是王国相当于郡,侯国相当于县,各置属官治理其国。

(9)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僚制度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出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从公元317年起又出现了东晋与16国的对立,接着又是南朝与北朝的对立,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消灭陈朝重新实现统一。^⑪

两晋诸公依然是官居一品的大员,但丞相(相国)与司徒省置无常。以太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西晋之初不设“丞相”、“相国”。宰相无定员、无定名、无定职,制度上无此官名,而实际上则有其官。东

晋初年设有“丞相”，并非定制。^⑫

两晋的“尚书”组织，密于东汉。有以太傅“录尚书事”大权独揽。另设“尚书令”、仆射、列曹尚书，曾设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尚书”之下设左右丞相，又设书郎多人

两晋的地方官制仍为州（设刺史、别驾、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官吏）、郡（设太守、主簿、主记室、功曹等官吏）、县（设令、长、主簿等官吏）三制。

晋代官制，仍以品级与禄秩并行。又因战争频繁，州刺史多带“将军”称号。持节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等以统帅军队。

宋、齐、梁、陈，偏安江左，建都建康（今南京市），合称“南朝”。四朝统治时期共 170 年（公元 420—589 年）。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官制大体沿用魏晋制。四朝各有不同的官制，可是增设官额，虚立官名以安置功臣、贵戚、豪门的情况相同。当时的政府中，人浮于事，朝臣、镇将之间矛盾日深，统治不稳定，权臣趁机夺位，都成了短命王朝。^⑬

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王朝，合称为“北朝”。五朝统治时期共约 140 余年（公元 439—581 年）。五朝官制也大体沿用魏晋制。^⑭

举北魏官制为例。北魏统治集团是鲜卑族拓跋部上层分子，他们既统治鲜卑人民，也统治其占领地区的汉族及其它各族人民。拓跋（太祖道武帝）立国之初，沿旧制分设南北二部，各置“大人”，以对治二部，又设“都统长”以统宫廷禁兵；置“幢将”以护卫宫廷；设“外朝大人”以统“侍中已下，中散已下”各官。中枢官制初设“八部大夫”，也称“八国常侍”，是皇帝下

的最高统治集团。以后又设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天赐元年(公元404年)设四等爵:王、公、侯、子(无伯、男二爵)。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三品,子第四品。又制散官五等。地方官制仍为州、郡、县三级,但与前代不同者,为每级各设三长;州置三刺史,其中宗室1人,异姓2人;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

(10)隋朝的官僚制度^⑮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依据过去的统治经验,制定了一套比过去细密、完整的官制,对唐宋的官制发生了深刻影响。

隋代沿魏齐旧制,仍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皆正一品,但无职事,不置僚属。

中枢官制设“五省”:

1、“尚书省”,总揽中央政务,掌管一切政令,有尚书令、左右仆射及吏部、礼部、兵部、都部、度支、工部六曹尚书,令、仆、六尚合称为“八座”。每部于尚书下设侍郎若干人,分别掌管各司事务。隋代的“尚书省”是一个机构完备的中枢政务部门,与前代不大相同。“侍郎”掌一司之事,与后代之“侍郎”不同。

2、“门下省”,有纳言、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事、谏议大夫管官吏。又辖城门、尚食、尚药、符玺、御府、殿内等六局。

3、“内史省”,即“中书省”,有内史监,内史令及侍郎等官吏。

4、“秘书省”,有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等官,领著作曹、太史曹。

5、“内侍省”,有内侍、内常侍、内给事等官。内侍省各官

均用宦官，领内尚食、掖廷、宫卫、奚官、内仆、内府等局。

设“二台”：“御史台”，有御史大夫、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吏；“都水台”，有都水使者、都水丞以及参军、河堤谒者等官吏。隋代将水利事业提到比较重要地位，专司水利的官吏较前代为多。

设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各寺有卿、少卿、丞、主簿等官吏。分掌各项事务。

设“国子寺”，掌管教育。有祭酒、博士、助教等官吏，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算学等学校部门。

封爵有九等：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

隋代采用北周制度，设“勋位”十一等：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又设散官之号。

隋代的地方官制，开始设州、郡、县三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州、县原各分为九等（如上上州、下下州等），后改为州、县各分为上中下三等。

军官制度沿用北周的“府兵制”，其军设十二卫：左右翊卫、左右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侯卫、左右御卫。十二卫各设大将军、将军、长史、司马等官。和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府，合称“十六府”。

隋代有上大将军、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官号，其职权隆重，不属于一般军官。四征将军（东西南北）、四平将军（东西南北）等均为高级军官。

（11）唐朝的官僚制度^{①⑥}

唐代官制，其名号禄秩虽然有时增损，但大抵沿隋代官制。

中枢官制大致如下：

设“尚书省”，有尚书令 1 人，掌典领百官。属有六部尚书：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省设左右仆射各 1 人，掌统领六部。为尚书令之副，在不设尚书令时，则总揽尚书省政务，劾御史纠察不当者。尚书省设左右丞相各 1 人。六部各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各部分司办事。六部合共 24 司。

设“门下省”，设侍中 2 人，掌出纳帝命，相礼仪，设门下侍郎 2 人。为侍中之副，设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左补阙、左拾遗等官吏。

设“中书省”，有中书令 2 人，掌左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有侍郎 2 人，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中大政。有中书舍人，掌侍禁奏，参议表章。又有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等官吏。

设“秘书省”，有秘书监、少监、丞等官吏。掌管经籍图书之事。

设“殿中省”，有殿中监、少监等官。掌管皇帝衣服，用品及日常生活等事。

以上合称为“五省”。加上内侍省，称为“六省”。六省中以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最为重要。中书省掌定策，门下省掌封驳，尚书省掌执行政令，三省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加强封建皇权。

设九“寺”、国子学及御史台分掌政、教之事。

唐代地方官制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为一州之长。又设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及各曹军事等官。县设县令，唐代之县有京县、畿县、上县、中县、中下县、下县之别，其县官

之品级亦不同。

以京兆、河南、太原为“三京”，称为“三府”或“三都”。每府设“牧”1人，“尹”1人以及“少尹”等官。各地设都督府，各府有都督、长史、司马等官吏。

军事官制。唐沿用北周及隋之制，建立“府兵”，各地府兵均归轻廷统辖，设16卫以统之。16卫是：1、左右卫。2、左右骁卫。3、左右武卫。4、左右威卫。5、左右领军卫。6、左右金吾卫。7、左右监门卫。8、左右千牛卫。每卫设上将军1人、大将军1人、将军2人，管理该卫之事。

唐代府兵制度于10道之内(唐初划全国为10道)，设军府六百三十四，关中地区占二百六十一。每一军府设“折冲都尉”以统帅该府之兵，另设“果毅都尉”以副之。

唐代官制虽然沿袭隋制，但有其特点：第一、屡有变更的宰相制度。第二、唐代设节度使。第三、唐代制定系统的品爵、勋、阶之制。第四、唐代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都卫府。第五、比较严密的军事官制。

(12)五代十国的官僚制度

唐代灭亡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建立过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五代”。东南、南方、西南、以及北方之地，先后建立过十个小的割据政权，合称“十国”，即吴、南唐、吴越、闽、前蜀、后蜀、南平、楚、南汉、北汉等。

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的官僚制度基本上沿袭唐朝。但时处动乱，兵革之祸未断，以至军队在这些割据政权中的地位显著加强，军事官僚机构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显重要。

五代十国的官制，在此从略。

· (13)宋朝的官僚制度①⑦

经过五代十国大动乱之后,国家的统一局面,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科学文化的进步,都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全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又造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

宋初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封建割据势力再起,借以维持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宋太祖赵匡胤将地方军权、政权、财权、司法权全部收归中央,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

宋朝官制,中央执掌军政实权的最高机关是中书门下政事堂和枢密院“对掌大政”。另有最高财政管理机关—三司(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地位仅次于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合称为“二府三司”。二府三司互不统属,均直接隶属于皇帝,从而构成宋朝最高权力机构的组织体制。宰相大权实际上一分为三。中书门下的长官“同平章事”是宰相,一般设二、三人,多以中书门下两省侍郎为之,无定员。此外并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协助宰相管理政务,同时也起着牵制和分割宰相权力的作用。

宋初中枢机关的机构重叠,冗官过多,严重影响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使得整个行政机构臃肿失灵。神宗时恢复了三省制度,将宋初设置的一些机关归并到三省之中,使宰相与三省重新联结起来。宋末,国难深重,二帝蒙尘,都城南迁。中枢机构也多变易,直到南宋孝宗时始,最后确定正宰相为左右丞相,副宰相仍复为参知政事,沿至宋末未变。宋代六部与九寺五监机构之名虽存,但是官无定员,无专职。

宋代地方行政分三级,最高一级政权是路,初分十五路,

后分成二十多路。路下是府、州、军、监，相当于唐的州府。府州之下是县。宋朝最盛时期全国共有府三八。州二五四，军五九，县一二三四。府、州、军、监职掌宣布教化，劝课农桑，赋役钱谷，法令狱讼，兵民之政。因此，这是宋政权统治人民的重要地方机构，分别以知府、知州、知军、知监为长官，且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央文官担任，防止过去由于武将兼领地方官所造成的拥兵自重现象。此外，各府、州还设立了“事得专达”皇帝的通判官，以分知州的职权。

诸府州知事通判以下，设有录事、户曹、司法、司理等参军。府州军监之下为县，有府县、州县、军县、监县之别。州领县多至十余县。王安石变法，实行保甲制度，在县之下设立都保、大保、保三级。分别设都保长、大保长、保长主之。

全国军队为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四种。此外，还有弓手、士兵、水军等。各军种均有相应军官统领，皇帝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兵权集中是加强君主极权专制的重要环节。

(14) 辽、金、元的官僚制度^⑬

辽(公元 916—1125 年)、金(公元 1115—1213 年)、元(1271—1358 年)，是我国北方三个少数民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

辽是以契丹族为主的政权。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史称辽太祖。建立了一种“胡汉分治”的制度，即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北面官与南面官体制。北面官统治机构设于皇帝的牙帐之北，官吏均由契丹人充任，专管中央军政机密，以及契丹人、其它少数民族事务。南面官统治机构则设于皇帝的牙帐之南，官吏由汉人和契丹人充任，管理中央政府文治丁赋之政，以及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的地方行政制度，大略多用

唐制,实行州、县两级制度,分设刺史、县令,以及治理地方。

金是以女真族为主的政权。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了金国,史称金太祖。采用宋制,在皇帝之下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在中央,设三师三公,以为论道辅弼之官;设尚书六部,总理行政;置枢密院管理军政;设御史台和谏院为最高监察机构。在地方,仍沿用宋制,分路、府、州、县四级。

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蒙汉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封建政权。这是在军事暴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最野蛮、最黑暗的朝代。元朝统治者根据民族标准,将各族人民强制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充分表现了民族压迫的特点,也反映了蒙古贵族企图借此分化各族人民的团结,削弱人民的反抗力量,以利于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

元朝设中书省一省制代替沿行已久的三省制。其目的在于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中书省之下设六部。元初以吏、户、礼为左三部,兵、刑、工为右三部。后又以吏礼为一部,兵刑为一部,户工为一部,其后始分列为六部。元代从属于六部的行政管理机关院、寺、监、府等,基本上沿袭唐朝的九寺五监,略有增损而已。

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沿袭宋制,继续设置枢密院掌管军事,照例由皇太子兼领枢密使。元初为了征战需要,曾沿用金朝旧制,在四川、江淮等地设置行枢密院。元世祖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各地废置无常。行枢密院有知院、同知、佥院、院判等官职。

元朝的地方官制,大体上仿照宋、金旧制,初建时期,分为路、府(州)、县三级。并设行中书省作为中央临时派出机关,

以便加强对地方控制。由于行中书省制的创设,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贯彻。因此,不久便以行省为常设的固定行政区,形成省、路、府(州)、县四级的地方政权。

元朝是凭借军事暴力征服手段建立起来的,又是实行军事统治的国家。因此,军队是元朝的重要支柱。其军队分宿卫禁军和驻防镇戍军两部分。宿卫诸军在内,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关于军队的调动权,统一由中央枢密院掌握。军队来源是实行普遍的征兵制度。军队的编制,以十人为牌,设牌头,牌以上有百户、千户、万户。万户府是地方驻军的最高单位。各级军官都是世袭职,地位比文官尊贵。元朝武功,震铄欧亚。元朝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和陆上大帝国。

辽、金、元的政治制度(含官僚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统治色彩,也保留了奴隶制国家体制的落后残余。

(15)明朝的官僚制度^⑩

公元1368年元月,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正式建立汉族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政权,国号“明”,年号“洪武”。

明初的官僚制度,仍沿元朝旧制。以中书省总政务,以枢密院主军务。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下设六部。各部设尚书、侍郎为之长贰。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六部升格独立,直接隶属于皇帝。枢密院后改为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又析置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明军事制度之严密,为历代所不及。以兵部主军政,五军都督府主军令。为将者战时统兵作战,战事结束还军于卫所。将帅可高封公爵侯位,但不能进入内阁以预机密。

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君主专制,到了明朝得到了极端发展

并真正恶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废除宰相制度，皇帝直接管理政府；第二、建立庞大的宦官机构和厂卫制度，实行极端专制和残酷黑暗的特务统治；第三、宫殿、陵寝制度完备化、使皇权专制更加神圣而腐朽。明初以南京为首都，成祖定都北京，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机关随迁北京。

明代中央政府除内阁与六部之外，还有大理寺、大常寺、光禄寺、国子监、钦天监等寺监督机关。此外，还有职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的翰林院。历代中央政府均有“议事”之制，明代亦然。明代的议事体制是“廷议”制度。

地方官僚制度。实行省、府、县三级制。其间虽参有省、州二级制和省、府、州、县四级制，但比例甚小。

省是明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为“三司”，共同组成省级政权机关，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省之下是府。直隶于布政司。县是明代地方第三级行政机构，设知县 1 人，县丞 1 人。其属有主簿 1 人，典史 1 人。乡村制度是实行里甲制度，后改为保甲制度。

为了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明朝初年即已建立起一支将近 200 万人的庞大军队。明代的基本军事力量是卫所军。到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指挥使司，京都和外地共置有三百二十九卫，六十五守御千户所。据《太祖实录》记载：京师卫所驻军有大小军官二千七百四十七人，军士二十万六千二百八十人；地方卫所军有军官一万三千七百四十二人，军士九十九万二千一百五十四人。卫所兵制是朱元璋创立的新的军事制度。除卫所军外，还有乡兵、边兵、江防和海防兵。

(16)清朝的官僚制度^{②0}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皇权专制统治空前加强,封建官僚制度腐败衰落。早在清入关前八年已经正式建立皇帝的称号。在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历史上,皇帝“乾纲独断”,对军国大政拥有绝对的权力。清朝整个国家机构的设置,都以加强君主极权专制为原则。这是一个重要特征。皇上的旨意就是法令。至于制度的意义甚微。

在清入关后,仍沿用明制,废除宰相,以内阁总理政务。内阁大学士官至一品,位尊权重。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设一个军机处,内阁大权渐为所夺。在清代,有几位皇帝都是幼主即位。如顺治即位时六岁,康熙八岁,同治六岁,光绪四岁,宣统三岁。因此都曾为他们设置摄政王或辅助大臣。

军机处设军机大臣,无定员,均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特旨召入。其名称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处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之别。军机大臣以下设军机章京若干人,协助军机大臣处理政务。军机章京分为二班,每班满、汉各八人,设领班、帮领各一人。军机处是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和内阁等中枢机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适应极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

内阁是国家行政的中枢,因此在大学士之下,又分设十二个从属机构:即(1)典籍厅(2)满本房堂;(3)汉本房堂;(4)蒙古房堂;(5)满票签处;(6)汉票签处;(7)诰敕房;(8)稽察房;(9)收发红本处;(10)饭银库;(11)红批处;(12)副本库。总共官员一百余人,比明代内阁组织复杂。

清代的中央行政管理机关,沿袭明制设尚书六部。但清代尚书六部的职权,比明代要小得多。其组织机构如下:

(1)吏部:设尚书,从一品。左右侍郎,从二品,为正副长官,均满汉各一人。下设文选、考功、稽勋、验封四清吏司。各司置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为正副长官,由满、蒙、汉人充任。吏部职掌文职官吏铨选、考课、俸给以及勋阶黜陟之政。官吏分九品,每品有正从,共十八级。封赠分为十八阶。命妇封号分九级,自一品夫人至儒人,因子孙封者则加太字。

(2)户部:设尚书、侍郎为之长贰,员额、品级与吏部同。其属有山东、山西、河南、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四清吏司。总共设郎中三十二人,员外郎五十二人。户部总掌天下户口、土地之籍,军国一切经费出入,悉为统理。

(3)礼部:设尚书、侍郎,掌五礼之秩序,教育与贡举之政。其属有典制、祠祭、主客、精善四司。另设铸印局,掌铸宝玺及百官印信。乐部乐典大臣,掌考乐律,以辨祭祀、朝会、宴飨之用。

(4)兵部:设尚书、侍郎为之长贰,掌武职铨选、简核军费,以及镇戍、马政、兵器、绘图、邮传之政令。下设武选、车驾、职方、武库四司。

(5)刑部:设尚书、侍郎,掌折狱审刑,简核法律。其属有直隶、奉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都捕十八清吏司。另有秋审处主核秋录大典。

(6)工部:设尚书、侍郎掌工虞器用,办物庀材,其属有陵寝、官府、城垣、仓库诸营建大事,各率所司,分督监理。有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司。

清代的寺监机构,经过裁并,九寺只剩下大理、太常、光

禄、太仆、鸿胪五寺；五监只剩下国子监。负责训练封建统治人才的翰林院仍旧维持着明代的地位。

理藩院为清入关之前太宗所创设的机构，是管理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最高机关。凡诸藩封授、朝觐、贡献、黜陟、征发之政，控制抚绥，悉皆理之。理藩院设尚书、左右侍郎为之正副长官，俱各满员一人。亦间有蒙古人为之。其属有旗籍、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徠远六清吏司。各司有郎中、员外郎。另有院直机关满档房、汉档房、领办处、司务厅。

为了巩固腐朽衰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清朝统治者建立了会议、会奏、会审制度，以保证皇权专制政治权力的行使。

清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州、厅）、县三级。省是地方最高一级政权。清代前期分为十八省；即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四川省。此外还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亚苏台五个将军辖区，西藏、西宁二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政区和内蒙古地区盟旗等。光绪年间，在原十八省基础上又增建新疆、台湾、奉天、吉林、黑龙江五省，共计二十三省。省一级官制颇为杂乱，或置总督，或设巡抚，或督抚并置。省之下为府及直隶州。府设知府一人，掌一府之政，统辖属县，宣理风化，平其税役，听其狱讼，考核属吏，兴利除害。府以下为县，设知县一人，掌一县之政令，主赋役，听治狱，兴教化，厉风俗。清代的县有府属县、州属县、厅属县。县以下为乡村组织，亦即保甲制度。

清代的军事官制两个系统：一是八旗兵，一是绿营兵。八

旗兵有的驻防首都,其机构有领侍卫府、八旗骁骑营、八旗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八旗步军营以及健锐营、火器营、虎枪营等。八旗兵满、蒙、汉军共二十四旗,每旗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以下设参领、副参领、佐领等。八旗兵还分驻全国各地,统领者为将军、都统、副都统等。绿营兵(军旗用绿色),士兵为汉族人,驻防各省,大体上驻于省者设提督,驻于道者设总兵,以下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军官。由各总督直接统帅的绿营兵称督标,由巡抚直接统帅的称抚标,由提督直接统帅的称提标。

以下作简要的概括:

我国的官僚主义制度,由来久远。大约自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出现了阶级,形成奴隶制国家,建立奴隶主政权,就逐渐构成了一套职官制度,即官僚主义制度。这一套维持奴隶主专政的官僚主义制度,即《周礼》所谓“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由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或皇帝,各级官吏和大小奴隶主对奴隶实行残暴的统治。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被称为“畜民”或“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随意役使、买卖和屠杀。奴隶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终年在监工的皮鞭下,甚至带着脚镣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我国奴隶社会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奴隶主专制政权和官僚机构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奴隶主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作风,都是由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决定和产生的。它们一经产生,就反过来为维护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奴隶主的残暴统治服务。

我国夏、商、周三个奴隶制王朝经历了建立、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然而,4000 多年以来,为奴隶主服务的制度上、体制上的官僚主义和奴隶主的官僚作风,以及俯首听命、唯命是从的奴隶主义并没有随着奴隶制王朝的灭亡而灭亡。相反地,由于历史的惯性和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官僚主义的影响经过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直遗留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官僚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经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是我国历史上继奴隶社会之后,又一个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统治的社会。国王或皇帝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下有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分封许多等级,建立有一整套封建官僚制度,用以巩固封建统治。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度、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的地主阶级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宣扬天道不变、死生有命的世界观和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

在我国延续 2000 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封建主专制政权和官僚机构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封建主专制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家长制作风,都是由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决定和产生的。它们一经产生,也必然反过来为维护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和封建主残酷的压迫剥削服务。

举秦皇朝为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定了一套在全中

国范围推行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官僚制度。它的组织比较完整严密,职掌比较明确,有利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套较完备的官僚制度。秦皇朝以后,王朝更替频繁,历代官僚制度有因有革,即使一个朝代,早、中、晚期的职官置设也常有变化。在王朝更替中逐渐形成更加完整严密的官僚制度。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有一套适应当时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经济状况的官僚制度。

封建社会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个人专断,封建特权,封建世袭,封建家长制,官僚机构庞大臃肿,部门林立,层次繁多,冗官冗员充斥。官吏企求高官厚禄,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强迫命令,役使百姓,做官当老爷等等。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僚主义,也遗留到社会主义社会,毒害着干部和群众,腐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诚如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

研究奴隶社会的官僚制度和奴隶主专制主义,研究封建社会的官僚制度和封建主专制主义,肯定能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二)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的官僚制度的影响

(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制度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革命浪潮席卷各地。到11月份,全国24省已有14个省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在革命怒涛的冲击下,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为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的建立。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政府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1912年2月,孙中山辞职。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遂为袁世凯窃取,从此中国开始北洋军阀长达17年的统治。

北洋军阀政府,包括袁世凯的统治(1912.3—1916.6)。皖系军阀的统治(1916.4—1919)。直系、奉系军阀的联合统治(1919—1922)。直系军阀的统治(1922.6—1924)。段祺瑞“临时执政”时期的统治(1924.11—1926.4)。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1927—1928.6)。他们的统治范围,大体以华北地区为中心,以北京为首都。

北洋军阀的各个政权,均为武人政权。掌政者虽然更迭多次,但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对外依附某一帝国主义国家,对内压迫和剥削人民,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实行带封建性的统治。

这些政权的中央机构一般都有“大总统”、“副总统”。其中,段祺瑞统治时,称为“临时执政”,张作霖统治时,称为“大

元帅”。设“国务院”，有“国务总理”，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国务院下设各部：如内务、外交、陆军、海军、教育、财政、司法、农工等部。各部设有总长、次长。各部分司办事，有司长、科长等官吏。

设“大理院”，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设“国会”，分为“参议院”、“众议院”两院，为立法机构。设“平政院”，以监察官署。

地方政权以省为单位，省有省长，主政；有督军（督办、督理）主军。省设各厅，如政务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警察厅、审判厅等，有厅长、科长等官吏。省下有时设“道”，省分为数“道”，有“道尹”。设县，有知县或知事。

军官制度，有将、校、尉、士等级别。“陆海军大元帅”为最高级别的军官，不常设。设“军”，有军长（军统），不常设。一般以“师长”为最高军官，下有旅长、团长、营长等各级军官。一省之军事。由督军统之；省内分区设“镇守使”，为统治该区的驻兵。兵又设“巡阅使”统治教育，以大军阀任之。

（2）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制度②

现分两个时期加以说明：

第一个时期：初期国民政府，即指 1925 年 7 月至 1928 年 10 月，国民党所建立的中央政府。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7 月 1 日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于是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早期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的指导与监督下掌握全国政务。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形式。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任期不定。委员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 5 至 7 人为常务委员，执行日常政务。设主席 1 人，这是近代政府

制度中，政党政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

国民政府的内部机构，先后设有秘书处、副官处、参事处等。秘书处受主席或常委之指导，常理秘书事务。设秘书长 1 人，秘书、办事员（科员或处员）、书记官若干人，此外酌情配备雇员。处下起初设总务、机要、撰拟 3 科，后从总务科抽出人组成第 4 科。副官处设副官长 1 人、高级副官 4 人、副官 6 人、差遣 12 人，亦可酌情配备雇员。参事处设参事 14 人，设参军会议。其职权是：政府咨询、办理特交事件、各参事建议提案审查、参事处收支经费审查、参事处职员成绩考核及其它重要事项。

行政各部，1925 年国民政府刚成立时，仅有军事、外交、财政 3 部。后来陆续增设交通、司法、内政、工商、农矿等部，以及教育行政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禁烟委员会等等。

初期国民政府正处于新、旧军阀交替时期，各类政治集团、各派政治力量都在进行较量与争夺，各种制度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1928 年，北伐战争已告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初步趋于相对的统一。

初期的国民政府处在北伐战争时期，因而军事机关显得很突出。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其组织法屡有修正。1925 年公布的组织法规定，军事委员会受国民党指导及监督，管理和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军、陆军、航空队及一切有关军事各机关。军委会由若干人组成，并推主席 1 人。1927 年 7 月 12 日公布的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事最高机关，负全国陆、海、空军的编制、统御、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

国防之责。除军委会外,当时还设有总司令部。总司令由国民政府特任,并兼任军委会主席。参谋长以军委会参谋部长兼任,或由总司令呈请国民政府委任。另设参事厅襄助政务。1928年以后,蒋介石不断完善军事制度,占居总司令和军委会主席职务,独揽军权。军官制度也采用特任、简任、荐任、委任等四级制度,军职为将、校、尉、士等级,与北洋政府相同。

第二个时期:即1928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是中国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定五院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于是国民党的中央政制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所谓五院制国民政府时期,指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分治的时期。所谓五院,即指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各院长、副院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国民政府委员中选任。国民政府设主席1人,委员12至16人。主席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其权力比早期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提高了,加重了,蒋介石曾一度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长。《国民政府组织法》曾经几次修改,当然是在以党治国、以党御政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1938年以后,国民党实行总裁制,蒋介石又成为国民党总裁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实行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人之下的独裁统治。这完全可以同封建帝王专制制度相提并论。

国民政府的直辖机构有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

文官处掌理国民政府一切文告之宣达,印信、关防、勋章、奖章之铸发及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暨其它机要事项。设文官长1人,秘书8—12人。

参军处掌理典礼总务及宣达命令,承转军事报告事宜。设参军长 1 人,参军 8—12 人。

主计处掌理全国岁计、会计、统计事务。设主计长 1 人,主计官 6 人,秘书、科员等各若干人。下设岁计、会计、统计 3 局,各置正副局长各 1 人,由科长、科员襄助之。

五院中,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于 1928 年 10 月 25 日正式成立。由行政部署及各委员会组成。行政院设院长、副院长各 1 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行政院本身的组织有行政院会议、秘书处、政务处等。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农林、社会、粮食、司法行政等部,蒙藏、侨务、赈济等委员会,卫生、地政等署。

立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于 1928 年 12 月 5 日成立。由院长、副院长各 1 人,立法委员 49—99 人组成。为便于审查各种法律案,下设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军事等委员会。

司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于 1928 年 11 月成立。设院长、副院长各 1 人。院内办事机构为秘书、参事两处。实行三级三审制度,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

考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独立行使考试权,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考试院于 1930 年 1 月 6 日成立。设正、副院长各 1 人,综合处理全院事务。内部机构设秘书处、参事处。下设考选委员会与铨叙部两机关,分别掌握考试、铨叙事务。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该院于 1931 年 2 月 16 日正式成立。设院长、副院长各 1 人,监察委员 29—49 人,并分区设区监察使及审计部。院内设秘书、参事两处。

国民政府的五院,各自享有(掌握)规定的权力和履行相应的职责。

五院并非五权分立。五院之上还有国民政府总其成,实际上是蒋介石这个独裁主席说了算。而且各院对各自的职权,除了蒋介石当行政院长时以外,均不能独立行使。实际情形是蒋介石占据哪一个位置,哪一个位置的权力最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近代中国的统治,是代表一小撮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以及他们背后的主子帝国主义的利益的。蒋介石适应中外反动势力的需要,集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之经验,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的旗号,贩卖专制、独裁的货色,口头上高喊中华民国,实际上大搞中华帝国,实行法西斯统治。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方制度,设省、县两级。此外,与省的地位相同的,有直属于行政院的市;与县的地位相同的,有直属于省政府的市。另外还有一些特别行政区,以及省、县之间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省政府主席,初期由省务会议或省政府委员推选,后来改为由国民政府在省政府委员中任命。省政府由秘书处、各厅及各直属处局组成。各厅的设置历年并不一致,有增有减。但基本的有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厅。各厅设厅长1人,由国民政府在省政府委员中任命。司法机关分为司法行政机关与司法审判机关两种,均配置相应官吏。各县设县长1人,下设2至4科。县以下为区、乡(镇)、闾、邻,配置区长,乡(镇)长、闾长、邻长各1人。乡(镇)组织中,以10保为原则,不得少于6保,多于15保。保甲组织中,以10甲为原则,不得少于6甲,多于15甲。每保设正、副保长各1人。每甲设甲长1

人。

1949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从中国大陆被赶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以下作进一步论述和概括: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总计产生过7届5个大总统、1个临时执政、1个大元帅。产生过44届内阁、20多名国务总理,先后成立过13个立法和制宪机构。这一时期是我国近代史上封建、买办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其总的性质和特点是:每一个军阀执政,对外都依附某一帝国主义国家,对内压迫和剥削人民,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在民主共和旗帜掩盖下实行封建军事独裁统治。

从1912年袁世凯窃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掌握着一个比较松散的全国性政权起,中国经过北洋集团走向分裂,在政治上形成直、皖、奉三派混战、轮流坐庄的混乱局面,到1928年6月因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迫使张作霖退守关外,再到张学良在东北易旗,承认国民政府止,共17年时间。北洋集团从开始掌握中央政权到覆灭,依次经历了“临时约法”、“新约法”、“洪宪帝制”、“南北政府”、“临时执政府”、“军政府”等6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官僚机构,都实行封建军事独裁统治。最高军政首脑可以独断专横,带有浓厚的封建家长制的官僚主义作风。举以下实例为证:

袁世凯在总统制的外衣下,一步一步地向帝制的道路上推进。他一方面恢复了某些封建时代的职官制度以至名称,另一方面又大力削减以至摒弃议会的权力,将一切大权集于大总统,为实施帝制逐步铺平了道路。袁世凯处心积虑地做

皇帝梦，而一批趋炎附势、吹喇叭、抬轿子的无耻政客们则为其大造帝制的舆论。1915年12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怂恿与支持下，袁世凯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在全国各地反对帝制的怒吼声中，过了皇帝瘾3月个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最后终于在众叛亲离、万众唾弃的局面下，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1924年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总执政。为了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于1925年1月电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在北上途中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段祺瑞对孙中山的正确主张却置之不理，而是迅速召集了军阀政客们的政治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对于军阀们这种一意孤行的独裁，孙中山非常愤慨，国民党宣布不参加善后会议。可见，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抵制，并没有阻止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段祺瑞的执政府垮台以后，张作霖于1927年6月在北京组织军政府，自立为大元帅。规定国务院是辅助大元帅的执行政务的机关，国务总理、各部总长直接由大元帅任免。军政府在官僚制度上与执政府如出一辙，只是名称有所改变而已。如果说执政府是间接的军事独裁的话，那么军政府就是直接的军事独裁。

此外，袁世凯为欺世盗名，曾于1914年12月公布过一个《地方自治试行条例》。然而，在北洋军阀军事独裁的制度下，所谓地方自治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军阀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诚意让人民去自治，至多只是沽名钓誉，借以粉饰场面而已。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政治舞台上，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争斗不休，广大劳动人民不可能得到任何自治权利。

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在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下，

其主流是革命的、积极向上的。特别是 1924 年 1 月,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进行了彻底改组,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确立了新的三大政策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以后不久,正式成立了初期的国民政府,即“军政时期”的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在经过初期国民政府和北伐战争时期以后羽毛逐渐丰满,并窃得了军政大权。于是便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由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客把持的独裁政权,以及与之相应适的庞大的官僚机构。

在这里,我们主要对从 1928 年 10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试行五院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起,至 1949 年 9 月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独裁统治崩溃时止,这 22 年间的官僚机构作概括。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和北洋军阀政权阶级本质相同的、代表帝国主义和豪绅买办阶级利益的新军阀政权。他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下,依仗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挫败了其它国民党派系和新军阀,通过 1928 年 2 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国民党曾进行过 10 年反共内战,又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八年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恢复其在全国的独裁统治而发动全面内战,结果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最后移据台湾,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抗。

在这期间,建立起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由垄断政权到垄断经济,到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建立和发展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他们聚敛国家财富的手段和步骤是:(1)从控制政权入手,控制财政。(2)通过财政手段,逐步建立金融垄断。(3)把一批原有的官办资本变成四大家族资本。通过官僚资本榨取民脂民膏。

1928年10月,蒋介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颁布了《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官僚政治体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蒋介石“依法”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独裁地位。

在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又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并建立法西斯组织,加强法西斯残暴统治。正如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则以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为阶级基础,是在半殖民半封建国家里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它继承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因而在镇压人民方面显得尤为野蛮残酷,对外无力进行侵略,以媚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为特征,带有浓厚的买办性。蒋介石实施的法西斯主义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

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在政治上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即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一人独裁。在思想上提倡“力行哲学”和“诚”的哲学,为国民党、

蒋介石集团及其法西斯独裁统治服务。在文化教育上开展一个“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为中心的道德行为规范推行于人民大众。使之规规矩矩地接受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要有丝毫反抗。

抗战开始后，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利用全国上下一致，抗日救亡的形势，不断强化专制统治，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官僚机构更加臃肿庞大。

其步骤是：首先，蒋介石独揽一切大权。1938年3月以后，蒋介石先后任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和海陆空军大元帅。此外，他还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四行联合办事处总处理事会主席，中央大学、陆军大学、中央军校、中央政治学校、警察学校等学校的校长，全国童子军总司令等等。他身兼数十种要职，专凭“手令”、“手谕”指挥，成为包揽全国党政军一切大权的最大独裁者。其次，推行“全国党化”，“全党特务化”。宣扬中国人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中国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权利与义务。国民党规定，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随时都有加入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干特务活动的义务。再次，推行新县制，强化农村保甲制度。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开始推行保甲制度。抗战后，为了强化县以下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大力推行新县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独占受降权利，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推行独裁内战方针，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调动百余万兵力，企图扼杀解放区。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不得人心，打内战的

战线愈拉愈长,兵力分散,再加上危机四伏,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重点进攻。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蒋介石于1947年6月在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党团组织合并”与“戡乱总动员”两项决策。经过两年多的垂死挣扎,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独裁统治及其官僚机构,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所推翻。

(三)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和环节的影响

以下分两个问题进行论述:

第一、对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简要论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4个时期。

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起,即从1927年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起,迄今已有7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可划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创建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组织工农民主政权,开辟了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然后,党为实现全面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而斗争,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阶段总体来

说可分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是相同的。

第二、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工农劳动人民是国家政权的主体。

第三、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原则来组建政权,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体制。

第四、党和国家机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或勤务员,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第五、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广泛地吸收人民群众参加管理,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第六、实行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

以上六点说明,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不同于历史上一切旧的官僚政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她对政权的领导,则是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基本标志。

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各族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作主的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权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通过自己的政权机关,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统治的新型政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确保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不是其它社会性质的国家。国体和政体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国体是内容,政体是形式,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为国体服务。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建国后制定的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先后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内容是:(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2)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权力,集体决定问题。(3)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4)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分别审议、决定全国的和地方的大政方针。(5)在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作为我国政权的构成形式,是因为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长期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结合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经验制定出来的,长期的实践证明它是最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它,发展它,使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坚持

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②这对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克服官僚主义,反腐倡廉,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建国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和环节的影响

在前面,我们对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人民民主制度作了肯定和简要的论述。紧接着,我们集中地论述建国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和环节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在如下的意义上使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两个概念(或政治范畴),即:政治制度指居于统治地位的一定社会阶级为实现其阶级专政而采取的统治方式和组织政权的形式。包括国家的管理形式、结构形式、选举制度和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等。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总是同该国的根本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因而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各国有不同的阶级属性,不同的历史条件,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按政权组织形式分,有君主制、共和制、议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按国家结构分,有单一制和复合制。按管辖权限分,有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政治体制则是政治制度的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即以政治制度为基础和依据,以政治权力的配置为中心内容,由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和方法、各种政治组织、政治设施及相应的政治和法律规范构成的政治体系。它以实现既定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为职能,以巩固和发展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目标,与政治制度相比,它具有明显的可变性。

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正是在坚持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的^①政治体制,即改革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和环节。

我国的政治体制从 1949 年建立迄今,已经有近 50 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不寻常的、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以下按照 5 个时期作简要论述:

第一个时期: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1949 年 9 月—1957 年 4 月)

这一时期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到中共中央于 1957 年 4 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时止,近 8 年时间。

1949 年 9 月 21 日—30 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共同纲领》作为建国初期一个历史阶段的临时宪法或根本大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其国体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翻身解放的人民“当家作主”。这次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 56 人为政府委员,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林柏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当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对外代表国家,对内领导全国政权。其职权包括:立法,批准、废除或修改条约,处理和战问题,批准或修改预决算,任免高级国家机关负责人民,颁布大赦特赦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由它任命、组成并受其领导的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5 个部分组成。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全国共分 6 个大行政区、1 个自治区及西藏地方,共辖 29 个省(包括待统一的台湾),8 个相当于省的行署区,13 个中央或大行政区辖市。各省、市、自治区除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外,其余省市分别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领导。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行政区划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至 1954 年下半年,全国共 25 个省(包括待统一的台湾)、3 个直辖市及内蒙古自治区、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区。省、自治区、地区下,一般划分为专、县、区、乡四个级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五年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暂行最高国家权力,坚持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和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实行单一主权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央两级政府体制和大行政区制度,确立党管干部的原则及其基本制度,司法体制,意识形态管理体制,调动社会群众团体参

与国家事务管理和自我管理。这就使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结构和格局大体形成。由于《共同纲领》作为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法制规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建国初期的政治体制无论就其结构还是功能来说,都具有明显的雏形特征和过渡性质。

1954年9月15日—28日,在全国完成普选和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五个组织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由国家主席任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名,由毛泽东主席根据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决定,任命陈云等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为秘书长,同时还任命了各部、委的负责人。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通过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的决定,由毛泽东主席予以任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五个组织法,总结了我国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以来政权建设的经验,并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

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规定了国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步骤,从而结束了以《共同纲领》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的过渡时期。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也结束了由政协全体会议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过渡状态。以此为新的起点,过渡形态政治体制各范畴中的主要原则、制度、活动方式和结构关系,围绕着正式形成的基本格局进一步发展,逐步具备了社会主义类型政治体制的一般特征。

第一部宪法在确立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承认过渡时期社会既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四个阶级共同行使国家权力的经济和政治特点,在法律上依然保护资本所有权和个体私有制。又明确肯定了实际生活中已经开始的重大社会变革,宣布“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实行国家行政事务管理的统一与集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加快了国家立法工作的发展和司法体制的初期正规化建设,进一步改善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贯彻实行科学和文

化工作中的“双百”方针，共产党加强了领导国家事务的各项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同年9月15日—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之后，党和国家开始酝酿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并加以实施，取得一定成效。

这一时期新中国的政治体制由初创、过渡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基本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实现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挫败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军事进攻，克服国际性经济禁运和封锁的重重困难，维护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调动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各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正如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是可以分析的。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运行过程中有伟大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暴露了其中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已经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领导所察觉，并且进行了一些改革。

以下，我们作进一步论述：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初步建立。它的显著特点是：强调权力的集中统一而忽视权力的合理配置，突出国家的阶级职能而忽视国家的管理职能，权力过多地纵向集中于中央和横向集中于各级党委与政府部门的党组，必然发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专断、机构臃肿和官僚主

义的弊端。

贯穿于整个过渡时期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大变动,繁重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以及复杂尖锐的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体制的创立和发展,在总体上必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结构形式。这种一元化集权型的政治体制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在初期运行中,在总体上发挥了积极效应和重大作用,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弊端。这些弊端则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地加以克服。这正是事隔40年之后,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任务,必然要涉及建国初期政治体制及其弊端的原因。

关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从中央来看,自党的七大以来,毛泽东一直担任着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三位一体的职务。过去由于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所采取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特殊措施,在建国以后并没有改变过来,仍具有实际的效力。所以,党的最高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人。由于毛泽东还同时担任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最高国家领导职务,并担任从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最高军事职务,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并实际享有最后决定权。”^④实践证明,在已转入和平建设的人民民主国家,党的领袖个人拥有“最后决定权”的领导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把对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

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交付执政党的某一位领袖,显然不能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必然会出现失误和偏差。

“从地方来看,各级党委作为本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拥有决定地方一切重大政策问题的权力;并随时通过严密、健全的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机构,领导和监督其它一切国家机关、政府部门、群众团体、军事组织的工作。但是,各级党委的领导成员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却没有具体、明确的制度规定。”^⑤因此,虽然党强调要建立和加强经常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但是“它不能防止某些权力集中在党委少数人、甚至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手里的现象发生^⑥。

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潜伏着党和国家的领导出现严重失误的因素,潜伏着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流于形式的可能性,最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

关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是与权力高度集中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权力高度集中于基层党委、势必产生职权混淆、包办代替的弊端。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精神的新的方针和设想,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鉴于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教训,批评了神化领袖人物的观点,重申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大会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党和国家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然而也有不足的方面,比如八大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对本单位的工作“负有

领导责任”。项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肯定在政府机关各部门和文教事业单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但在实际上是倾向于党的基层组织全盘领导本单位的工作。于是造成各单位各部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机构重叠臃肿的现象。各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党委直接统揽生产、行政事务的现象日益发展起来。企业内部行政系统原有的行政决策、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等职权,逐步被党委系统所代替。从而企业中普遍形成多头领导或无人负责、工作秩序混乱、职责不明、挫伤干部职工积极性等消极现象。这显然不利于调动国家各管理系统主动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体现党的政治领导作用。这个问题被长期遗留下来。

关于意识形态管理中的行政干预。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管理上,特别是在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的方式上,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失误和偏差。1954年8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央宣传部关于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决议,确认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及向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开展严肃的斗争,作为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根本任务,10月,毛泽东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通过给中央政府局委员和其它有关负责人写信的方式,直接干预了当时学术界在古典名著《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争论,提出开展对古典文学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于是学术争论的性质被严重地歪曲了。争论的一方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代表人物”遭受政治围攻。有关报刊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和粗暴批判。此后党开始强调在全部思想文化战线上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严重意义,在全国范围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

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这次批判运动的突出特点是对本属学术性质的不同观点进行严厉的政治批判,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牵连。一些持独立文艺见解的文化人士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的立案和错误处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此,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开始把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批判,当作马列主义教育的有效方法。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措施对理论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活动进行不适当的干预和限制的错误倾向,日益发展起来。实践证明,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学术争论问题,违背了意识形态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

对思想、学术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政治批判运动,对于政治体制的合理建设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忽视了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彻底批判和清理,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家长制、个人专断等积病得以产生的深厚政治文化土壤未得到根本改造,致使政治体制在形成、发展中受到领导职务终身制、个人集权等旧的观念的影响。二是笼统地否定和排斥资本主义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政治文化方面的积极成果,没有对当代西方的行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经验和制度进行必要和可能的吸收和借鉴,从而逐渐形成了政治体制的封闭性和固定化。三是挫伤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干部和群众对被神化的领袖发动的政治批判运动心有余悸,延缓了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曾注意到党在领导科学文化工作方面

受苏联学术批判中的粗暴作风和行政干预方式影响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过程中，确定了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即文艺创作实行“百花齐放”，学术研究实行“百家争鸣”。党确认在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流派可以自由发展，在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可以自由讨论。反对采用简单粗暴的干预态度和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对待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国家工作中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重要任务，重申了“双百”方针的实质在于：“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⑦

“双百”方针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方针，它的贯彻执行，对于纠正意识形态管理中的行政干预倾向，具有积极作用，在当时缓解了从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思想文化领域全面紧张的不正常气氛。

上述诸方面的弊端，无疑是在政治体制上产生或助长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从1956年春天开始，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注意到政治体制的某些问题。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政治体制上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和机构过于庞大两个方面。针对这些弊端，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⑧刘少奇、周恩来也多次阐释过同样的观点。可见，他们都注意到权力配置上的过分集权问题。到这一年秋

天,即党的八大则不仅提出要解决中央权力下放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政治体制的主要职能转变的问题和健全国家各项制度的任务。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刘少奇的论述,实际上说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向经济文化建设转移,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

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又坦率尖锐地指出:“为了克服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为了广泛地发挥地方和下级国家机关的积极性、主动性,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必须在国家所已经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②这些论述实事求是,具有远见卓识。让人痛心的是: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为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所干扰和破坏。这就延续了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第二个时期:政治体制向高度集权的演化(1957年4月—1966年5月)

这一时期从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时止。历时9年。

这一时期对政治体制既进行这某些局部的改进和调整,又不断地积累起一些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体制自身原有的某些弊端不但没有革除,反而滋长起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还有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细微末节的无所不包的状况,强化了统治职能,强固了集权型体制模式,中断了政治体制向强化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转轨换型的进程。共产党组织国家化,司法体制局部削弱。党内个人决策的权力结构形成,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开始变成单向监督,社会群众团体变为“党的驯服工具”,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管理,权力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向党的系统集中,党政不分的程度加深,机构不断膨胀等等,将已经不适应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的集权体制,推向了高度集权。于是,人们仍然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来理论和处理共产党与政权机构的关系。党内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党派互相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不是被取消了,就是被严重削弱了。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无疑是以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我国政治体系发生畸形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官僚主义继续滋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6年春天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逐步酝酿从两个方面消除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一是实行以简政放权为内容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二是进行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党中央经过一年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于1957年夏天开始将这两方面的计划付诸实施。遗憾的是,由于领导者的失误,良好的动机和起点,却引发出不良的后果。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几年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欢迎广大党外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

在这里应当指出,党中央在这一段指示中,把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仅仅归结为作风问题,并希望通过整风运动来加以解决,这是远远不够的。就整体而言,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即政治体制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并没有这样的认识。

关于政治体制中的官僚主义,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我国的政治体制加以说明:“建国以后发生的种种官僚主义现象,都与当时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能深入一步探究,就会发现体制中的弊病为它们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使各级党委的负责人直接发号施令,干预政务;

臃肿冗杂的管理机关运转不灵,效率低下;尚不完备的监督系统难以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实行有效制约,等等。官僚主义等现象与体制的弊病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逻辑联系,要真正消除官僚主义等现象,主要必须从体制的弊病上‘开刀’。”^⑪

我国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他于1948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从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和社会制度的官僚政治两个方面,深刻地论述了官僚政治和专制官僚在中国统治了二千余年。他也是着重分析研究作为社会制度的官僚主义政治,并论述了克服和根治官僚主义政治的办法,提出了不少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价值的见解。

在整风中和反右派斗争中,在一般的政治观念上,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视为同一概念,将对政治体制弊端的善意批评与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蓄意攻击混淆起来。于是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整风过程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党欢迎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的机会,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退出,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党中央当时决定,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教育干部群众。

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于是一场全面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

应当肯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因而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⑫运动结束时,划定右派分子55万人,性质定为敌我矛盾。

被划定的“右派分子”中,只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建议的,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其中许多正直忠贞的有才干的共产党员和党外同志、知识分子和满腔热血的青年,被背上“右派分子”的黑锅,长期受到委屈、压抑和打击,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整个党和国家的严重损失。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的恐惧心理和压抑,是无法用数字来标示的。同时,严重地影响了党中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错误判断,致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逐步向共产党的机关转移,我国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化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

在1957年以前,党在认识上是否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方式的。但在1958年以后,党在认识上不仅不否定这种领导方式,相反地从正面肯定和强化了这种领导方式。毛泽东指出:“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③自此以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迅速发展起来。

1958年提出“大跃进”,标志着在反右派斗争结束之后,党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在贯彻执行中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基层政权合为一体,二者不仅在职能上不分,而且在机构上也不分,比较城

市的“政企不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其程度更深，范围更广。人民公社给亿万中国农民带来的不是丰收的喜悦，而是国民经济的三年严重困难。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党的建设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党的建设从50年代后期开始走上了弯路。一是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毛泽东多次强调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等。二是从强调和夸大个人的作用转到对个人的服从。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违背马列主义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原理，把个人崇拜分为两种：即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开绿灯。于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作风就迅速发展。从1958年起，他开始超越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之上，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受破坏。毛泽东对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们被迫作了检讨。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随后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出于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考虑，彭德怀等同志承认和检讨了“错误”。毛泽东对此表示欢迎。

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政治生活开始不正常。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迅速发展，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党内不同的意见难以提出，正好给一些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

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大失误。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会议特别关注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第一，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第二，强调党内民主，反对压制不同意见。大会后，党的民主集中制，较之三年“大跃进”时期有所恢复和加强。以个人决策为特征的党内权力结构有所松动。党政关系作了重新调整，划分了党与政权机关的职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有所改善，意识形态领域有所活跃，干部管理体制有所改进。这一切为党和国家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尽管就整个政治体制而言，根本性的弊病并未消除，但是政治体制的某些调整，毕竟缓滞了高度权集的发展趋势。

在国民经济调整全面铺开之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对60年代初期国际和国内出现的矛盾激化的暂时现象，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估计。1962年9月，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它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并强调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此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迅速发展，政府机构逐年膨胀，行政管理系统出现某种程度的准军事化，政治工作机构的大量建立，冲销了原有的调整成果，使高度集权的体制结构又日益强化起来。怀有个人野心的林彪等人神化毛泽东的“造神运动”逐步升级，也强化了个人决策结构。“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更加滋长。他可以任意批评、指责那些与他的思想不完全一致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他个人的意见往往成为党中央政治局和

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使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集体讨论徒有形式。中央领导层集体讨论问题之后形成的共同意见,必须经毛泽东个人认可方能成立。毛泽东个人基本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不受这个集体的监督和制约。”^{③④}与个人专断、个人决策形成鲜明对照,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却处于停顿状态。各民主党派、社会群众团体被忽视,其作用的发挥又转入了“低谷”。这无疑助长体制上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

第三个时期:政治体制的严重瘫痪与畸形演变(1966年5月—1976年10)

这一时期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时起,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从而结束“文革”动乱时止。历时10年。

毛泽东以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身份,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党内、国内的形势做了违背实际的、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形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③⑤}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估计,在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离开了唯物论,走向了唯心论,离开了辩证法,走向了形而上学,离开了实事求是,走向了主

观主义,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中国大地,其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惨痛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从严重瘫痪到畸形发展的曲折过程。“打倒一切”的全面动乱,遍布全国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串连,“踢开党委闹革命”。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被揪斗迫害,无政府思潮泛滥,武斗严重等等,使除中央和军队中某些单位以外的各行各业、各级党政领导系统普遍停止工作,使我国政治体制的结构、功能陷于瘫痪和严重紊乱。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动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支持。此后发展为遍及全国的“全面夺取。”

从1967年初至“文化大革命”中期,为了控制大部分的地区和单位的动乱局面,把“文化革命”进行下去,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了相当广泛的军管或派军事代表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甚至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都派驻了军管小组或军代表。在军管会里,一般设两套班子。其中一套班子负责抓革命,另一套班子负责促生产。在各级党政机关、企业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军管即告结束。

自上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起,至1968年9月,经过20个月的夺权运动,全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如同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革委

会也是在排斥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革委会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的畸形儿。

革委会是“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按当时的提法,即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在革委会成立过程中,特别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实行“精兵简政”,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的滋生。革委会的成员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要把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融合在一起,等等。然而革命委从产一一的那一天起,就以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其主要依据和职能,机构设置简陋,无法应付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

革委会发展了以往政治体制中的根本弊端,把以往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发展到极端,成为一种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体化混沌体。与以往的高度集权相比,革委会的集权具有如下特点:即集权程度更高,并带有所谓无所不包的性质,高度集权与严重无政府主义并存,高度集权带有更浓厚的个人迷信色彩、个人专断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结合,高度集权成为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滋生、繁衍的土壤。高度集权、没有监督、没有民主的领导体制,保证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无法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召开作准备，于1968年10月召开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为了坚持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向说成是正确的，他在讲话中继续不顾事实地赞扬“文化大革命”，并要会议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林彪、江青等人趁机组织围攻参加过二月抗争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组织攻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全会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冤案。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达2万8千余人。此外，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还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被加上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等罪名而惨遭诬陷和迫害，有些人被摧残致死，这是党的历史上继30年代苏区肃反扩大化之后，又一次极为沉痛的教训。③

1969年4月，召开了党的九大，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通篇贯串着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也写进总纲。这是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从未有过的，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九大突出的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这次

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进而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①

“文化大革命”中期,自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国内形势逐渐趋于平稳,党政各级领导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四届人大开始着手准备,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基层组织也陆续恢复。各种工作、生产秩序、组织纪律有所恢复。这些变化相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动乱、大破坏、大瘫痪而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不过是以以往僵化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同时在发展以往政治体制的弊病。

党组织恢复后,革委会这种党政一体、无所不包、至高无上的特点发生了变化,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正式领导机构,从革委会中分化出来,并成为革委会的直接领导机构。它不再是党政合一的混合体,而成为同级党委领导之下的政府机构、行政领导机构、企事业单位行政和业务的领导部门。实际上,革委会和党委会是两块牌子一套办事机构,两个班子的一套人马,实行党的一元领导,党政职能混同。

革委会成立时,曾经把工作机构和人员都精减到难以维持正常工作的最低程度,但不久就开始了机构的膨胀和人员的增加,形成庞大的、无所不包的政府行政系统。1970年—1971年间,在省一级革委会中,新设置的编内和编外的常设机构就有一打三反办公室、整党建党办公室、农村工作指挥部、征粮领导小组、知青办公室,革命大批判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等20个左右。机构膨胀、人员增加,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主要靠抓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来搞经济工作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因此,不论当时党的文件和领导人怎样强调精兵简政、怎样强调革命化,都只能在

“膨胀——精减——膨胀”和“下放—收回”的老圈子里徒劳地循环。

干部管理制度遭受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严重破坏。他们一直把攫取对干部的使用、提拔、罢免大权当作篡党夺权的重要手段，并从各方面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他领导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虽然不能从全局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不能着手对政治体制的积弊进行全面改革，但是减轻了“左”倾错误的危害，缓解了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它在两种政治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再次出现反复。“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帮派势力、野心家不能忍受正常秩序对他们的束缚，不能忍受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和对各方面的整顿，更不能忍受对造反派地位的挑战。从1974年起，他们以“反复旧”、“反右倾回潮”为号召，又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政治体制遇到严重冲击而陷于混乱。工作制度、生产秩序和纪律遭到破坏。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力挽狂澜，领导全面整顿。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的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超凡胆略，由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顺应历史潮流，全面整顿在短期内进展迅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各个系统的全面整顿，有力地遏止了“四人帮”所造成的破坏和动乱，缓和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气氛，程度不等地恢复了比较正常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和纪律。

“1975年初召开的四届人大,虽然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它毕竟挫败了‘四人帮’妄图组阁的阴谋,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使我国政治体制正常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③

整个“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把以往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发展到极端。这些弊端造成了严重的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压制民主、官僚主义、封建特权、违法乱纪和不正之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化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政治体制中严重弊端的认识,启发和坚定了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

第四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初步实施(1976年10月—1987年10月)

这一时期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从而结束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动乱时起,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时止。历时11年。

1976年1月8日、7月6日、9月9日,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分别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其势咄咄逼人,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深感忧虑,认为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痛疽。华国锋同叶剑荣、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采取断然措施,于10月6日晚上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由1977年7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追认。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由于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没有统一,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维持坚持“左”的错误,“按既定方针办”,因此,迫切需要的拨乱反正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受到严重的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只能在徘徊中艰难前进。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徘徊前进的局面,结束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不仅提出了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而且对改进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全会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所以应该有领导地大胆地实行权力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关于民主集中制、民主与法制建设,全会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但是必

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维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任何人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可见,“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使全党痛切地感到,只有破除个人专断和权力过分集中,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才能有助于实现党内民主生活的制度化和社会稳定,也才能确保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全会虽然在强调克服权力过分集中时,注重的是经济管理体制,在强调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时,仍讲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但是这毕竟标志着党在拨乱反正中,对政治体制严重弊端的初步纠正和改革政治体制的初步探索。这种初步纠正和初步探索无疑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它对我国继续进行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其影响是重大的、持久的。

从全会召开至以后的两年时间,至上而下,党的组织制度、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构、司法机关、政协和民主党派及

社会团体组织逐步恢复,企业领导制度重新调整。“革命委员会”这一“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权力机构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从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它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③此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全面、深入的展开,就是围绕邓小平的这篇讲话的思路进行的。

1980年8月以后,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的七年时间里,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进行了理顺党政关系的初步实践,围绕健全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展开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进行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精减政府机构,适当下放权力,调整 and 改革人民军队,“一国两制”重大战略构想的理论的提出与实践,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这些初步的改革探索和改革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党的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化(1987年

10月—1998年3月)

这一时期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时起,到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止。历时近11年。

党的十三大针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没有被彻底克服,由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严重阻碍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状况,明确而全面地论述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政治体制建设的新起点。

诚如前面所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是好的。即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不可动摇和削弱的。然而,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还存在着一些没有克服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等。只有全面地、深入地、持久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党和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1986年9月,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这个蓝图要立足我国国情,实事求是,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承受能力,同时还要兼顾长远和近期两个方面,避免只考虑长远而不顾眼前,或者只顾及眼前而忽视长远的倾向。

198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绘制的蓝图,赵紫阳在代表党中央作所的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体现了效率、活力、积极性、兴利除弊、需要和可能的有机结合,为达到长远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④体现了民主、法制、效率、活力的高度统一。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党的十三大以后,各项改革措施,紧紧围绕着近期目标,从解决业已成熟的以下问题着手进行:(一)实行党政分开、(二)进一步下放权力、(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的制度、(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采用坚决、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兴利除弊,适应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需要,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妥善处理民主与安定、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各项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克服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的组织活动和

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五年。在国际国内的复杂艰难情况下,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④①}1992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江泽民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提出了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项主要任务。其中第六项任务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④②}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高度重视法制建设。第七项任务是: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强调“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④③}

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五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阶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矛盾和困难,工作中也有缺点和不足。其中之一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和状况人民群众

还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问题较为严重。

1997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五大。这是一次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极为重要的大会。江泽民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④④}指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必须通盘考虑,组织专门力量,抓紧制定方案,积极推进。”^{④⑤}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程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了深化阶段。

1998年3月召开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提出了199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建议新一届政府要着重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第七个方面的工作是: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李鹏指出:“政府机构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密切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客观要求。现有政府机构设置的基本框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过去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取得一些进展,积累了经验,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和宏观环境制约,很多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机构设置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④⑤}这段论述,分析了政府机构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现有政府机构形成、调整和改革的历史过程。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击中时弊的。

李鹏进一步指出:“机构庞大、政企不分,滋长官僚主义,助长不正之风,也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人民群众痛恨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机构庞大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归根到底是压在人民群众肩上的。因此,由国务院带头,上行下效,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这次机构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的一个重大举措。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和撤销那些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按照权责一致的要求,调整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关于机构设置。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到29个。国务院直属

机构与办事机构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政府机关的人数准备分流一半。这个任务要在三年内完成,相应地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在三年内完成机构改革。

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把新一届政府的任务概括为如下几件事:即“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即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确保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八,通货膨胀率小于百分之三,人民币不能贬值。

“三个到位”,即(1)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2)确定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彻底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3)三年内完成政府机构的改革。

“五项改革”,即(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2)投资融资体制改革。(3)住房制度改革。(4)医疗制度改革。(5)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完善。

朱镕基强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④7}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给予全中国和全世界耳目一新的感觉。善良的人们期盼着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圆满成功。在这里,我再次引用1875年5月5日,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即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时的那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胜于一打纲领。”^{④8}中国政府推行的这项机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都是迫切需要的。这次机构改革的成功,将大大地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

也将大大地推动中国从体制上,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克服官僚主义的历史进程。

以下作简要概括:

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界定。政治制度指居占统治地位的一定社会阶级为实现其阶级专政而采取的统治方式和组织政权的形式。包括国家的管理形式、结构形式、选举制度和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等。政治体制则是指政治制度的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即以政治制度为基础和依据,以政治权力的配备为中心内容,由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和方法、各种政治组织、政治设施及相应的政治法律规范构成的政治体系。

我国的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最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要坚持它,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使它的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政治体制中不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和环节,而不是对原有的政治体制全盘否定,一笔勾销,更不是削弱和动摇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前面,我们已经分五个时期,对我国的政治体制建立以来所经历的不寻常的、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政治体制上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政治作风上、思想作风上和工作作风上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了概括的论述。毫无疑义,我国社会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受到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的官僚制度和官僚作风根深蒂固的影响。同时,与党和政府在路线和政策上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与执政党长期执行“左”倾路线的关系最大。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克服官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初步探索和初步实施、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的阶段。1997年9月召开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1998年3月召开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采取重大的实际步骤,推行政府机构改革。这表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克服官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艰难曲折的,形势是令人鼓舞的,前途是光明的。

社会历史根源注释：

①罗辉映主编：《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

②卫文选：《中国历代官制简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

③、④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30页、第29页。

⑤、⑥：卫文选：《中国历代官制简表》，山西人民出版，1987年1月，第9页。

⑦、⑧、⑨臧云浦 朱崇业：《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徐州师范学院《教学参考资料》，1980年6月。

⑩、⑪卫文选：《中国历代官制简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

⑫、⑬、⑭、⑮、⑯臧云浦、朱崇业《历代官制、兵制、科举表释》，徐州师范学院《教学参考资料》，1980年6月。

⑰、⑱、⑲、⑳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

㉑臧云浦 朱崇业：《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徐州师范学院《教学参考资料》，1980年6月。

㉒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㉓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②④、②⑤、②⑥郑谦、庞松、韩钢、张占斌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1月，第70—71页。

②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第42页。

②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0页。

②⑨《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

③⑩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③⑪郑谦、庞松、韩钢、张占斌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6页。

③⑫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46—347页。

③⑬、③⑭、③⑮郑谦等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92页、第141页、第149页

③⑯、③⑰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28页、第429页。

③⑱郑谦等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第214页。

③⑲《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页。

④⑩《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第35—36页。

④⑪、④⑫、④⑬：《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8页、第30页、第32页。

④⑭、④⑮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六部分。

④⑥、④⑦《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文件汇编，第 20 页—22 页、第 35 页—37 页。

④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 卷，第 14 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1955 年，莫斯科。

二、官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官僚主义在社会实践中违反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背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对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反动;在理论认识上坚持唯心主义历史观,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原理。坚持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背离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一)官僚主义者坚持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背离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如何评价人民群众和英雄豪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这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彼此存在着根本对立的观点。自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焦点和根本分歧之一。因此,如何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如何对待人民群众?这不是一个枝节问题,而是社会历史观方面的重大问题。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消除剥削阶级的偏见,正确认识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问题。

(1)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出发,对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颠倒和歪曲的解释,主张个别英雄豪杰的意志或某种超自然的精神

力量(英雄豪杰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体现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因而断言:个别英雄豪杰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供英雄豪杰役使的、消极被动的力量。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理论上通常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

一种是唯意志论。它认为少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天才人物的愿望、意志、品格和才干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广大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一批“愚昧无知”的“群氓”,是少数英雄豪杰的盲目追随者,其命运只能依靠“超人”来拯救。这是历史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治国”就是“牧民”,即把群众看作被他们任意驱使的牛羊。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梁启超说: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竭力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他把杰出人物看成社会强盛的原因,说什么“罗马繁盛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国王都是伟大的人物。”他把君主说成是可以决定人类命运的决定力量。鄙视、污蔑人民的力量,认为“胆怯、愚昧、沮丧的人民”,为感情所激动,“往往把事情推向极端”。因此,他反对人民掌握政权。这个世纪法国的另一位思想家伏尔泰认为,“瑞典的历史,就是瑞典历代国王的历史。”他把社会历史看成是帝王的历史。19世纪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说:“照我看来,世界历史,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完成的历史,实质上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劳作的伟大人物的历史。”“这些伟大的人物真正构成了全部世界历史的灵魂”。世界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

19世纪俄国民粹派把人民群众视为“群氓”，认为他们不过是数学上一连串的“零”，少数英雄人物才是“实数”，只有把“实数”放在“零”的前面，方能构成有效的数字。更有甚者，19世纪末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大肆宣扬的所谓“超人哲学”。他认为历史总是要堕落、退化、毁灭，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只有依靠“超人”来拯救。“超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决定一切的力量”，而人民群众则是“畜群”、“愚民”、“贱民”、“败类”、“粪土”、“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等等。尼采极端仇视人民群众的学说，后来成为德意日法西斯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另一种是宿命论。它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是“天命”、“上帝”、“绝对精神”等神秘力量，而少数杰出人物，少数帝王则是“天命”的执行者或“绝对精神”的体现者和受托者。他们受命于“天”，承天意行事来主宰人类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这是历史观上的客观唯心主义。

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的天命观认为，“天”即上帝，“天命”即上帝的意志或命令，这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歪曲反映。这种天命观主要以宣传“王权神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所谓赏善罚恶等等为阶级压迫和剥削进行辩护。唯心主义的天道观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之“人格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受“天道”，即上帝意志的支配。这种天道观通常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所利用。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只有神才是真正智慧的”。他自命是神赐给雅典国家的，以神的代表、救世的“英雄”自居，吹虚自己心中有一种“神物”或“灵机”，与众不同，是来促进雅典国家进步的。13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托马斯·阿奎那则认

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它创造一切，统治一切。社会只能有一个统治者，他代表上帝来管理尘世生活，“上帝通过先知答应他的人民：作为一个巨大的恩惠，他要把他们放在一人之下，只有一个群主来统治他们大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理性统治了世界，也统治了世界历史。因此统治世界理性的伟大人物，也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他把拿破仑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者，全世界的统治者。他认为“历史是统治的王朝的历史，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历史”。

总之，唯心史观不论采取唯意志论或者宿命论的形式，它们都信守精神力量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观点。片面夸大英雄豪杰的作用，贬损人民群众的作用。以这种错误观点指导社会实践，必然导致脱离群众，役使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旧的历史观基本上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当然，这也不排斥历史上有些思想家、政治家具有有一些重视群众作用的思想因素。比如中国的孟轲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魏徵认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比如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国家是人民通过协议、订立契约而产生的，因而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的（他称这种普遍意志为“公意”）。在国家中人民并没有失去自由，只是限制了“自然的”自由而得到了约定的自由。主权是属于人民的，政府只是执行公意的机构，不是人民的主人。如果政府不执行公意。那是破坏了契约、篡夺了主权。一旦契约被破坏、主权被篡夺，人民就有权推翻政府。以上这些思想观点，在旧历史观中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其中孟轲、魏徵的“贵民”和“重民”

思想并不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以维护和完善剥削制度,巩固反动统治者的统治为目的,以承认和肯定统治与服从关系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因此仍然没有超出英雄史观的范围。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认识方面的原因。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人类社会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中最高级、最复杂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它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有其不同于一般自然物的特殊性。在自然界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完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根本无需人的参与。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历史是人类有目的活动的历史。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个人的意志和动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起作用,而英雄人物所起的作用又比普通个人要大得多,突出得多。英雄人物是历史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们的活动显露于历史现象之上。而社会历史的物质动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是隐蔽的,被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所掩盖。如果人们对社会活动的认识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停留在人们的思想动机上,特别是少数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上,那就看不到人们活动的物质动因和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进而片面夸大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当人民群众要求通过自己的英雄人物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愿望,英雄人物确起到这种作用时,由于斗争的需要或者出于叙述历史的方便,常常出现对于英雄人物过分赞扬。这些都容易把人们的认识引入歧途,产生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错

觉。

其次是社会历史原因。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生产力有了发展而又不夠发展,生活资料有了剩余而又不丰富。人们被加以分割,造成单个人的分散和疏远。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包括官僚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决定了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无权地位,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聪明才智受到摧残。而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则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似乎能够为所欲为地主宰历史。广大人民群众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被剥夺了从事政治和精神文化活动的权利。剥削制度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大众和掌握统治权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差距扩大化、固定化。这就使得产生英雄史观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

最后是剥削阶级的偏见,别有用心地歪曲社会历史。①历代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总是对历史的真相作歪曲的宣传和教化,百般地吹捧他们的领袖人物和政治代表,竭力夸大精神活动的作用,贬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意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他们从哲学历史观上加以错误的论证,使其理论化、系统化。这就使英雄史观的产生由可能性变为现实。其流毒至今还未能肃清。

(2)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前提出发,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史,归根结底,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②克服了旧的社会历史观的两个根本缺陷:一是只局限于考察人们的思想动机,看不到人们活动的物质动因;二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③把被

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第一次真正地、彻底地、全面地、科学地解决了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恢复了人民群众作为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本来面目。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

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基础上,正确地说明了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里所说的杰出人物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要求,代表先进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对社会发展起进步作用的领袖人物、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及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杰出人物不是从天而降,他们来自群众,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同群众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的作用,由普通个人的作用到杰出人物的作用,都毫不例外地受到他们与群众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受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因此,对人民群众作用的肯定本身,就内在包含了对于杰出人物在内的个人作用的肯定。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有量的规定性,又有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是指在居民中的大多数;质的规定性则指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包括一切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④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的纳税第三等级属于人民的范围。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人民群众则包括

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剥削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那些靠脑力劳动谋生、不剥削他人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群众的一部分。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道理今天已成为一般人的常识。然而,在理论上能背诵这个道理是一回事;在社会实践中贯彻这个道理又是另一回事,并且经常容易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官僚主义者的实践活动,或者不自觉地背离这个道理,或者故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严重地违背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道理。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温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关于人民的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就无法生存,也不可能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因而也就没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换言之,物质生活资源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最基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喝、穿、住、用等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⑤劳动群众则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直接承担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同时,劳动群众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生产经验,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推动了生产

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历史的进步。劳动群众由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组成。社会物质财富归根结底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共同产物。按照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脑力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将会越来越突出,脑力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增大。

总之,人类社会赖以存在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由人民群众承担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人类的其它活动。人民群众之所以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讲,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客观物质力量。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产生精神财富的物质基础,而且是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科学是在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生产斗争经验的结晶。生产实践为自然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课题,不断地推动自然科学向前发展。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和其它社会斗争经验的结晶。人民群众变革社会制度的实践,也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课题,不断地推动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离开了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就不可能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理论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

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楚辞》就是吸收了当时大量的民歌、民谣写成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也都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精华发展而成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世界名著,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修琢提炼

而成的。古代医药学名著《本草纲目》就是历代的药物学家、医学家总结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由李时珍加工整理而成的。西汉后期的《汜胜之书》、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也是直接总结农业生产和饲养经验写成的。孙武的名著《孙子兵法》,是他总结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而创立的军事理论。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上述名著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劳动群众直接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在阶级社会里,在剥削阶级统治下,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受到极大的摧残和压抑,但是由于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因而仍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科学、文化、艺术财富,在他们中间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艺术家。例如在国外,英国工人瓦特发明蒸气机。美国工人爱迪生发明电灯、电影和留声机,俄国工人斯蒂芬逊发明火车。德国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狄慈根,英国电磁学家法拉第,美国电学理论家富兰克林,俄国伟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世界大文豪高尔基,也都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在我国,著名发明家鲁班,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设计和组建世界上第一座拱桥——我国赵州桥的李春,第一部记述木工技艺的《木经》作者喻皓,也都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

在人类历史上,被称为“创造天才”的人物中,如前面所述,许多人本身就是生产劳动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许多人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艺术家,然而他们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知识分子,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

论他们出身于剥削阶级,还是劳动阶级,都应该界定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我们应该肯定杰出人物个人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指出:任何发明创造,任何科学文化活动,都必须以基本的物质条件为前提。而这些物质条件,无一不是出自人民群众的创造。

第三、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仅表现在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上,而且还表现在社会变革时期,以巨大的历史主动性,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成为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形态的更替准备了经济条件。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进入存在着压迫剥削制度的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当一种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民群众就会通过社会革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的更替开辟道路。因此,每一个社会的巨大变革,都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的主体,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奴隶社会的崩溃,主要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奴隶暴动;封建社会的覆灭,主要是由于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奴隶和农民的斗争严重地破坏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对于地主阶级建立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起了决定性作用。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他们曾参与革命斗争,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但是他们都是借助于劳动人民的力量才获得成功的。恩格斯指出在英、法、德“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

战斗部队,……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⑥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只能依靠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广大劳动群众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结果。1976年4月,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四人帮”的蹂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人民群众自动地集合到首都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向万恶的“四人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党和人民同这个反革命集团进行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同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人民群众的人心背向,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主流,代表了时代精神,预示着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这是为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观点。

官僚主义者在社会实践中,违反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即背离人民群众的人心。在理论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背离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因此,树立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是正确认识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

(二)官僚主义者坚持脱离群众和做官当老爷,背离党的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经历了一个自发到自觉的漫长历史过程。无产阶级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的过程。⑦自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就开始领导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斗争。而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的伟大作用,正是依靠党对人民群众的正确领导来实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集中到一点,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要实现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使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没有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密地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形成了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的实践结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同时,它是我们党的宝贵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能否继续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和党的盛衰兴亡的关键。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从根本上背离

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败坏了党的事业,即亿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

(1)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无产阶级政党对群众的领导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基础之上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的理论基础。坚持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党的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解放只能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人民群众的自由和幸福,也只能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去争取和实现。正象《国际歌》歌词所写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是无法取得成效的。

与此相反,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贬低群众的作用,片面夸大个人的作用,以救世主自居,以恩赐观点对待群众。这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地相信、依靠和发动群众。他们狂妄自大,主观片面,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和以少数人包办代替。这就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向人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是党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只有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才能把群众的经验和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了起码的知识。”⑧只有甘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够最终带领群众完成时代赋予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重任。

与此相反,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不平等待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同级干部和下属、捧上压下,欺上瞒下。孤陋寡闻,不调查研究,不了解下情。不虚心向群众学习,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什么都行。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必然会把自己孤立起来,禁锢起来,在自己和群众之间划上一条鸿沟。这就不可能把群众的经验和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唯一的宗旨。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在党的一切活动中,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除了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任何特殊的私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自觉地把自已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工具,坚决反对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为人民服务,必须倾注全心全意,而不可半心半意,或者三心二意。这是检验共产党员党性的最高标准。

与此相反,官僚主义者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不是把自己当作为人民谋利益的工

具,而是把人民当作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他们喜好和习惯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遇事敷衍,相互推诿,老于世故,与人无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糊涂无用,当官混饭吃。贪图享受,害怕艰苦,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嫉妒贤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多吃多占,执法犯法,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争名夺利,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对国家利益全然不顾,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领导无方,政绩平平,滥竽充数。文山会海,游山玩水,搞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一切都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四、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新型国家。全体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权力。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领导,其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推及众多的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决不容许他们高居于群众之上。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⑨这就要求广大干部要十分珍惜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辜负人民的重托。

与此相反,官僚主义者无视赋予自己权力的人民,损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颠倒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官气熏天,唯我独尊,对人民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做官当老爷,使人望而生畏。官越做越大,脾天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摆官

架子越来越大。讲排场,搭花架子,挥霍国家和集体资财。对上级投其所好,逢迎拍马,对下级和普通工作人员冷若冰霜,熟视无睹,不关心群众疾苦,精心经营自己的安乐窝。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物质文化生活腐败。厚着脸皮到处要官、要钱、要物。官官相顾,利益均沾。这样的官僚主义者不可能履行公仆的职责,完全辜负了人民的重托,势必引起群众的公愤,最终要身败名裂。

第五,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坚持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看成自己的根本利益,把党的成员看成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每一言论和每个行动,都以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向人民负责为最高标准。党的干部无论是按选任制,还是按委任制任用,都应该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干部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就是为了党的利益。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同理,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与此相反,官僚主义者或者不掌握,或者不愿意应用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党的基本知识,于是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割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也有的官僚主义者深受历史上官僚政治的毒害和世俗观念的影响。因此,他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往往只对党负责,而把对人民负责置于脑后。无论是按选任制,还是按委任制任用的干部中都有官僚主义者,其中尤其以委任制任用的干部居多。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有的对上级及其负责人竭尽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能事,对下级对群众则凶神恶杀,蛮横无礼,动辄破

口骂人。有的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害民。这样的官僚主义者作恶的时间不会长久,肯定要翻船的。

第六、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就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离不开人民大众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人民大众从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斗争,并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实现的。只有党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灌输到人民群众之中,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沿着彻底解放的道路前进。

与此相反,官僚主义者中,有的从根本上就不相信和依靠群众,那就不可能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只能采取官僚命令的态度去对待群众,去役使群众。有的虽然懂得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但是不善于或不用心去教育和引导群众。当进行某项革命或建设事业的条件已经成熟,群众的觉悟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却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这就不可能正确地领导群众,甚至会把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意见当作广大群众的意见,因而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落在群众的后面,失却对群众的领导作用,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反之,当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条件不够成熟,群众的觉悟程度较低时,他们却过高地估计客观形势,贸然行事,强迫群众去完成任务,犯了命令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错误。

总之,官僚主义者在党的群众观点的六个方面,都反其道而行之。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特别是在我们执政党内,的确是十分有害的、非常危险的。在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但是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成为带普遍性的问题,并且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⑩

(2)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党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的。它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辩证统一的,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在社会实践中的贯彻和具体化。没有坚定的群众观点,就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反之,单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和责任心,而没有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不可能把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完成好。

以下概述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

一切为了群众。这是由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是政治上、思想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来就是党

的根本立场和宗旨。

无法设想：不坚持党的根本立场和宗旨，会得到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一切依靠群众。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所决定的。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的主人，直接参与各方面的决策和管理。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群众，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同呼吸、共命运。依靠群众还应注意：群众的一切斗争都必须建立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当群众尚未觉悟时，领导者只能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等待多数群众觉悟，要防止犯命令主义的“左”倾错误；当广大群众已经觉悟时，领导不能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这也批评，那也指责，要防止犯尾巴主义的右倾错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是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为其思想基础的。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①}在这里，毛泽东把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统

一起来了。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从群众中来,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这同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即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一致的。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集中的和正确的意见坚持下去,这同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即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是一致的。在党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形成的领导意见、计划和办法,还需要在群众实践中加以检查和发展。“实践—认识—实践”与“群众—领导—群众”是统一的。我们尊重和依靠群众,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⑫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它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这就是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必要性。任何工作任务,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

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这就是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

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或者不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败坏人民的事业。毛泽东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⑬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要求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求的。

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所谓政治路线，指党规定的每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纲领和基本路线。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建国初期制定的“一化三改造”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这些政治路线都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经过若干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是依靠群众去贯彻和实现的。党制定这些政治路线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除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之外，它没有自己的私利。我们过在贯彻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中所出现的“左”的或右的偏差，归根到底，都违反了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所谓组织路线，指党为了保证其政治路线的贯彻和实现在组织工作中

所实行的路线。其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从民主到集中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从集中到民主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党的组织路线必须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组织上真正当家作主。只要客观条件许可,无产阶级政党和它领导的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成员,都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党员和人民群众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并且能够对公职人员行使监督权和罢免权。应该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定期召开各级代表大会。各级党政机关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请求审议和批准。刘少奇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⑭

群众路线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以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路线。群众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三者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群众路线贯彻于党的全部活动中,贯彻于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

官僚主义者在社会实践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僚老爷。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背离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整体上讲,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是党实现正确领导的基础,是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官僚主义者的危害作用正是在于:动摇这个基础,破坏这个关键。

(三)官僚主义者坚持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背离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在哲学史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一条是坚

持“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另一条是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坚持了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背离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1)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原则立场出发,否认和歪曲人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用不同的方式来否认人们认识的本质。错误地认为人的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是从人的主观思维和感觉到自己要认识的客观事物的过程。在社会实践中,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具体化为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使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

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头脑里固有的,主观自生的,把认识的对象归结为所谓各人不同的感觉、“感觉的复合”、“观念的集合”等等。如我国古代的孟轲就认为人有先天的“良能”,人们不需要学习和接触实际事物,只要进行自我“内省”,就可以获得知识。英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则宣扬“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完全来源于自己的感觉,感觉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东西,没有感觉就没有世界,也就没有人的认识。我们周围的事物,都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而已。

另一种是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来自独立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客观精神。这种客观精神,我国宋代的朱熹称为“理”,他提出“理在事先”的观点,认为人在没有接触到具体事物前,就有了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德国的黑格尔称为“绝对观念”,认为人的认识是对“绝对观

念”的认识,他颠倒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希腊的柏拉图则认为,人的知识完全来源于人对所谓“理念世界”的回忆,把人的知识说成是先于感觉经验的东西。

上述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两种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人的认识是观念认识观念、精神认识精神,把认识看作是先于物质、先于实践、先于经验的东西。它们都坚持意识决定物质或思维决定存在的错误观点。

主观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和作风。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和具体化。它的主要特点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忽视客观事物的具体特点,单凭个人的想象、愿望或书本知识盲目地决定和处理问题。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两者都是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教条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知识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不顾具体情况,到处生搬硬套。无视客观规律,盲目蛮干,急躁冒进,只凭主观意志,闭门造车,不倾听群众意见。经验主义者拘守于自身局部的、零碎的、狭隘的经验。轻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到处搬用。他们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主观主义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基础,也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观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曾经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有极大的

危害性。毛泽东精辟地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⑮

官僚主义者的实践活动，正是坚持了“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主观主义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大敌，同理，官僚主义也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大敌。官僚主义者脱离实际，不尊重客观规律，脱离群众，不相信和依靠群众，不顾群众的利益，甚至独断专行，压制民主，强迫命令，专横跋扈，称王称霸。这样思想、行为和恶劣作风，必然败坏党和人民的事业，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是根本对立的。

无论是专横跋扈、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者，还是辛辛苦苦、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者，都是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周恩来指出：“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⑯

(2)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立场出发，自始至终坚持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客观物质世界是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对象。认为离开了客观物质世界，离开社会实践，就不可能有人的认识。在社会实践中，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人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概括出一条正

确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党的思想路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虽然各有侧重，但它们又是互相依赖、互相贯通、互相补充和互相包含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党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为了确保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尊重客观实际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求达到按客观规律办事，把对革命、对建设、对每一项有益于社会的政治活动和业务技术活动的高度热情，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实事求是的基本途径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也就是说，人们是否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只有通过实践及其后果才能最终确定。人们的认识只能在实践中产生、检验和发展。

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各组成部分的科学精神，它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最主要之点。因此，我们通常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是客观存在着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乡内外的实际出发，从自身从事的工作环境和对象的实际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实事求是也是一种唯物的辩证思想和作风。它深刻地体现着彻底的唯物论和彻底的辩证法，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即体现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的统一、客观规律性

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实事求是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们应用对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去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从必然中获得自由。因此,它也体现了必然和自由的统一。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面,它和其它两个基本方面,即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有着密切联系,是互相渗透的整体。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要做到实事求是,就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就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这个结论不但包含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也包含了党的群众路线。由此可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求坚持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就从整体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⑮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曾经出现过严重地偏离这条思想路线的时期,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它。并在以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它。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我们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这条政治路线的同时,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依据这条思想路线去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虚心体察下情,调查研究现实情况,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

又通过实践而检验和发展真理。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应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3)脱离群众,不为群众谋利益的官僚主义者,背离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史,是从物质资料生产和作为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决定力量。从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杰出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起着重大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上述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基本观点出发,在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观点,制定了党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是:①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②向人民群众学习。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④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⑤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⑥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然而,官僚主义者在实践活动中,无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的客同事实,不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不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脱离群众,不为群众谋利益。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我们应当指出:“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①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进而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使官僚主义恶性滋长。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所恢复。但是,治愈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创伤,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按照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顺利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党的关心和培养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各级领导班子和整个干部队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锻炼成长,涌现出象孔繁森、李润五、马恩华、李国安和吴天祥等这样一些深受人民爱戴的优秀干部。这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主流。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其阴暗面。正如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开始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向全党打招呼,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②①}“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确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党的事业的要求。有的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由于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经验不够了解,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在思想作风和组织纪律上还需要进一步锤炼;有的干部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不注意大局,不注意政治,甚至分不清基本的原则是非界限;有的干部作风漂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有的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堕落为腐败分子、犯罪分子。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②②}江泽民的这两段论述,坦诚地揭露了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阴暗面,含义精深。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克服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②③}

独断专行,特权思想,做官当老爷,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作风漂浮,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等等,都是脱离群众,不为群众谋利益的官僚主义者的突出表现。概括起来,他们颠倒了两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方面,颠倒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真理。这个真理在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但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经济制度都是建立在剥削阶级的私有制基础上,政治制度都实行剥削阶级的专政,因此剥削阶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剥削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凭着自己的权势,拼命地歪曲历史,宣传少数达官贵人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当官的是社会的主人,可以对民颐指气使。庶民百姓是奴仆,民应该侍候官。这种反动统治和宣传的流毒很深,一直遗留到社会主义社会,至今还在毒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队伍。这是一个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事实。

社会主义社会同以往的阶级社会不同。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或勤务员,是人民的儿子。新社会的干部已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官老爷”。他们的职责是千方百计地从政治上、经济上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常的主仆关系。

官僚主义者在思想认识上,恰巧颠倒了这种正常的主仆关系,即人民与干部的关系。在行动上,他们丢掉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官当老爷,凌驾于群众之上,作威作福,甚至称王称霸。利用职权搞特殊化,谋私利,堕落腐败。这一切必然引起人民的愤慨,使人们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对党的信赖。这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方面,颠倒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和杰出人物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起重大作用。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因此,完全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错误的,把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和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加以颠倒也是错误的。

诚然,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对于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文化的积累和传播起了重大作用。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如政治家、革命家。他们由于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比其它人看得较高较远,他们的思想能够及时地集中反映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进步愿望和要求。他们是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斗争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们对于历史的发展起重大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决不能将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改换为决定作用。

官僚主义者在思想认识上,无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或者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和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颠倒过来。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懂得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对党和人民负责,也不懂得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不依靠群众,无法或者不可能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他们自视聪明,自以为了不起,高人一等,可以指挥一切,命令一切,包打天下。他们高居于群众之上,对人民的疾苦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冷漠无情。这也是十分危险的。

(4)脱离实际,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官僚主义者,背离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党的干部在工作中,要尊重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尊重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在实践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贯彻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反之,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按主观意志办事,在实践中坚持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贯彻了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联系。其特点是客观性、必然性和重复性。规律是看不见的,只有对十分丰富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够认识它。科学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并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造福于人类。规律是不可以抗拒的,不论是任何人,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受到惩罚。

官僚主义者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懂得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不调查研究。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以感想代替政策。不听人言,蛮横专断。脱离实际,不尊重客观规律,发号施令,胡乱指挥。对工作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研究脱离实际,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官僚主义。

第一方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非科学决策。我们知道,决策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发挥作用的条件的一定认识,在决策者意志参与下而进行的选择目标和制定行动方案的活动。决策活动的

本质特征在于,对未来目标的确定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方案的选择。这种确定和选择不是盲目的或主观任意的,而必须在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还包括决策者的意志因素的作用。决策程序大体上分为提出决策问题、确定决策目标、收集信息、制定方案、方案分析评价、选定方案、审查报批、执行反馈等阶段。各阶段之间又构成统一的过程。

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哪一条战线,决策都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能。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决策,称为科学决策;错误的、违反客观规律的决策,称为非科学决策。科学决策和非科学决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截然不同。

决策所处理的是可能性问题。领导者决策,力图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即达到预定的目标)。所以,决策其实是一种立足于现实而决定未来的活动。因此,决策要避免主观片面性。领导者制定出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目的在于确保社会实践达到预期效果。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即决策是否符合实际,这是至关重要的。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错误的决策,可以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损失。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所证明了的。

建国 40 多年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在某些时候,也曾经一度出现过决策失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58 年的“大跃进”和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都是由于决策的失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浪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全国性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的领导干部盲目地决定项目、施工、投产。

在全国范围内重复建设比较严重,建设施工周期太长。在对内、对外的经济贸易活动中,不切实际地批准签订合同,盲目购进和重复引进不合格和不适用的设备、技术。重视引进,轻视消化、吸收和创新。信息情报不灵,玩忽职守,上当受骗等等。这都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样的领导干部,即便是为了国家建设用心良苦,然而都犯了官僚主义错误。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策有高低不同的层次。有国家决策、地方决策、部门决策和企业决策等。不同层次的决策,其影响面不相同。国家决策影响到全局,地方决策影响到地方……一旦决策失误,不论其层次高低,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和浪费。

所谓决策失误,就是非科学决策造成的失误。指的是决策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违反科学决策程序。决策失误,与领导干部素质低直接相关,同时往往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作风紧密联系。

第二方面,党员领导干部中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本文所指的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限于作为执政的共产党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由于不负责任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党员领导干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策失误,也属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我们在第一方面已作了论述。这里就其它的失职错误进行分析论述。

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传达贯彻,不检查督促落实,或作出错误决策;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改革开放总政策的行为,不报告、不批评、不制止;对本单位人员中的思想问

题和实际问题,该管的不管,能解决的不解决,致使矛盾激化,造成恶性事件;对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法乱纪案件,不查处或拖延,以致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

在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中,由于管理混乱,致使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发生重大质量、技术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亡事故;对下属企业产销假冒产品,长期失察,或发现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措施不力;对下属企业产销伪劣药品、有害食品、或其它危害人民健康的商品,长期失察,或发现后不采取措施处理,或措施不力;由于管理混乱、纪律松弛,致使国家或集体财物被贪污、盗窃、诈骗、浪费;对本单位或直属单位违反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行为长期失察,或发现后不纠正,造成重大损失。

在物资储藏、运输过程中,由于严重官僚主义失职行为,致使物资丢失、损坏、霉烂、变质,造成重大损失。

在安全工作方面,不认真执行劳动保护和安全方面的法规,不采取措施排除事故隐患,或者批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开工生产,致使发生爆炸、火灾、翻车、翻船、飞机失事、工程倒塌等恶性事故,造成重大损失;在灾害面前,未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贻误时机,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未能避免;在组织群众性活动时,缺乏周密布置,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严重官僚主义失职行为,致使文教卫生、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发生严重事故或遭受重大损失。②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88年5月23日印发的《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是党在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文献和党纪党规。它有利于对

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问题的正确处理,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有利于纠正党内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不正之风,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党员领导干部中的严重官僚主义失职行为是致使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肯定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这种失职行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也肯定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第三方面,党员领导干部中践踏民主集中制的官僚主义错误。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才能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全党的经验和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的实施,增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顺利前进。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

1、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2、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

3、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4、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

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5、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6、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②④

这六条基本原则,既体现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是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辩证统一。同时体现了或贯彻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党内的民主与集中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民主是集中的客观基础,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如果把二者割离开来,那就会犯主观片观的错误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这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必然破坏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制度,导致家长制的独断专行。

简短的结论:

第一,官僚主义者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因此,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他们不可能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关系、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主仆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社会

实践,不为群众谋利益,必然导致脱离实际,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换言之,他们脱离实际,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必然导致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社会实践,不为群众谋利益。这就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

第二,坚持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背离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坚持脱离群众和做官当老爷,背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背离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官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认识论根源注释：

- ①《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260页
- ②《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3页。
-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 ④《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2页。
- ⑦《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265页。
- ⑧《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748页。
- 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 ⑩《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2页。
- ⑪⑫⑬《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854页、第852页、第857页。
- ⑭《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48页。
- ⑮《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758页。
- 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9页。
- ⑰《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759页。
- ⑱《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3页
- ⑲《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见《党纪政纪条规手册》第43页。
- ⑳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
- ㉑ ㉒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8 年 5 月 23 日印发，见《党纪政纪条规手册》第 217—226 页。

④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第三篇

克服官僚主义的途径

在论述了官僚主义深远浓重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之后,需要对官僚主义及其克服途径作进一步分析和论述。这将有助于我们更自觉更有效地从事政治体制改革和克服官僚主义的伟大事业。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我国现存的官僚主义,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我国以往时代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因此,我们应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并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寻求克服官僚主义的途径。以下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掌握克服官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认真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事件和人物所作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认真学习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关于限制、克服官僚主义的党纪、政纪和法规。目的在于掌握

克服官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二、深刻认识官僚主义的根源

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要提高对官僚主义深远浓重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的认识。这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认识官僚主义,能够使我们克服官僚主义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这本专著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正是编著者对自己提出学习革命家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和研究官僚主义的根源这样的要求,并付诸实践,将自己学习研究的心得粗略地表达出来。在这里不再重复。

“官僚政治顽症”或“官僚主义恶魔”侵害着全人类,已经成为普遍的世界性的问题。人类只有积极行动起来,用唯物、辩证的,从而是冷静的、不躁不馁的态度,用各种方法和手段与之作长期的斗争,才能使这一“顽症”和“恶魔”对人类危害作用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相反地,如果用唯心的、主观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那就会对体制性官僚主义采取不承认主义,甚至连思想上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也碰不得,碰了就严惩不贷。等到官僚主义泛滥成灾时,又企图像割韭菜一样通过搞几次政治运动把它消灭,让千百万干部做官僚主义体制的替罪羊,同时会伤害广大群众。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那就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冰清如玉,天衣无缝,仿佛是从天而降,不是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脱胎而出。看

不到新旧社会的联系,看不到官僚主义深远浓重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更不可能懂得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出现,要求我们花大力气加以克服。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旦有了官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于是讳疾忌医。这些错误观点正是由于对官僚主义缺乏冷静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所致。

我国的学术界、理论界,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过去对官僚主义的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体制的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成就。我们认为深入研究官僚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三、积极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

如前所述,我国的政治体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经历了新中国政治体制的形成、政治体制向高度集权的演化、政治体制的严重瘫痪与畸形演变、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初步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深化等五个时期。

我国的政治体制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全国范围的社会民主改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在总体上发挥了积极效应和重要作用。然而存在着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分和环节,存在着许多弊端。其中主要的有邓小平指出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还有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这些弊端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来加以克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因此,一定要坚持不懈,不可半途而废。

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任务之后,我国政治体制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探索。在探索中积累了实践经验,丰富了理论认识,提高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自觉性;确认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整个改革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此就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开,发扬党内民主,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注重制度化建设,将其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等。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而全面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任务、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此后一段时间的各项改革措施,都要紧紧围绕改革的近期目标,从解决业已成熟的7个问题着手:(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解决了这7个问题,对于克服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即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将产生积极的深远的效应。达到了改革的近期目标,我国政治体制将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向长远目标迈出了必要的一步,为将来实现长远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政治大革命,这是一项循序渐进的任务异常艰巨的社会工程。党的十三大开始了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经过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进入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各族人民感到欢心鼓舞,同时期盼着今后的改革事业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斗争取得更大的成就。

由于官僚主义侵蚀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克服官僚主义斗争必然贯彻在政治、经济、军事、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社会保障、司法、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计划生育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之中,或者说克服官僚主义是我国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本身应有之义。在这里用“齐抓共管,长期坚持不懈”来

表达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官僚主义的决心是很恰当的。

四、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第六部分，即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部分，对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作了精辟论述。这些论述的贯彻实施，对于我们克服官僚主义的斗争也将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这是肯定无疑的。

江泽民指出：“共产党执政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发展社会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〇一〇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

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一切政治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力,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查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

以上三段论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即针对我国体制中严重存在的弊端作出的,是紧紧围绕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进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因此,我们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国家的主人翁地位和权利,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如果践踏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民主权利,践踏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民主权利,那就是公仆对主人犯罪。这是在这方面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应该随时警惕的。

严重存在于党和国家机关的腐败现象,是廉洁奉公和勤政为民的反面,也是公仆对主人的犯罪行为。腐败是官僚主

义的重要表现之一，因而，腐败分子也就是官僚主义分子。

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从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就已开始。仅从 1989 年下半年以来的九年的时间里的成果看，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此而感到高兴。然而，任重而道远，仍须继续努力。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五年之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这是多么精辟的击中时弊的论述！请注意：这不仅是江总书记的个人观点，而且是整个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观点，是与个体意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体意识。

江泽民的这两段论述，从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全局的高度，论述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在党的十五大所作的纪检工作的报告，向世人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和深思的统计数字：从 1992 年 10 月—1997 年 6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731000 多件，结案 670100 多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 669300 人，其中开除党籍的 121500 余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 37492 人。在受到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 20295 人，厅级干部 1673 人，省级干部 78 人。引自《人民日报》，

1997年9月24日第一版)由此可见,在我们的党和国家里,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现象的严重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的一些党员和干部经受不住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历史性变革的严峻考验,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腐化堕落了,被历史淘汰了。

这个令人震惊和深思的统计数字,不应该是执政党失败的记录,而应该是胜利的记录。它标明我们党有信心、有能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此,党毫不放松地采取实际步骤,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继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其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其根本无疑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党的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把反对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现象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98年1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作了题为《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加大工作力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工作报告。江泽民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拒腐防变、反腐倡廉中一定要起表率作用。第一,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的歪风。第二,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带头树立好的家风。第三,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他又要求执纪执法队伍要努力做到:“政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引自《光明日报》1998年1月23日第一版)遵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通过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努力,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自从私有制社会和政治权力出现以后,腐败现象也就随着而产生。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腐败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权力的腐败。国家公职人员不正当和不公平地应用公共权力去谋取私利的行为;一个官员将自己的职位视为一种经营,去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个职位的收益;作为负责某一公务或某种责任的公职人员,受到非法提供的金钱和报酬的引诱而做出有利于行贿人而偏离了公务角色规范的行为就是腐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附产物”,腐败行为是一种“寻租活动”,认为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和管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由于这种过多的干预和管制,抑制了公平竞争,并扩大了供求差额,使商品、资金和资源等要素在自由市场与行政管制之间产生了“价差”,追求这种“价差”收入就是“寻租”,而“寻租”就是造成腐败。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凡是处在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型的时期,一般能为腐败行为提供可乘之机,腐败问题会更加普遍,更加严重。因为社会转型意味着道德规范、经济生活、社会体制的重大调整和变迁,于是造成观念上的失范,认识上的困惑,信念上的动摇,价值评价上的差异,特别是存在着两种体制之间的“空档”和“漏洞”。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现象最容易从以下四个方面暴露出来:一是政治权力的集中点。二是新旧体制转换的交汇点。三是监督系统的薄弱点。四是政治法律的滞后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党政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和发

展商品经济的考验,能不能廉洁奉公和勤政为民,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繁荣经济要坚定不移;保持廉洁,防止腐败,也要坚定不移。如果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不能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和腐蚀,或者掌着权,看着钱,以权谋私,以权捞钱,那就势必产生“权钱联姻”的腐败现象,严重偏离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决策。

可见,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从防范、制约、监督、惩处四个环节上建立起有效的和稳定的反腐倡廉运行机制,这是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克服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现象的重大举措和重要途径之一。

五、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思想觉悟和社会政治积极性

这是一项克服官僚主义的长期的基本建设。我们从事这一项基本建设,必须联系考察我国的历史传统,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或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制度、官僚政治体制和官僚主义作风经历了形成、发展成熟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虽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官僚政治制度和官僚政治体制被推翻了,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

对的独立性,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官僚主义还遗留下来,并且在不断地毒害着人们。

官和民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官僚政治的基本矛盾:

从官的方面分析:各级官僚都是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只对君王负责或下级官僚只层层对上级官僚负责,而不对人民群众负责。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君王及其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群众则对之俯首听命,无可奈何。

当君王“贤明”时,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即要求官吏在对君王对上级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甚至倡言“君为轻民为贵”。要求君王忠于人民,而君王也做些“仁政爱民”的表面文章,以安慰或欺骗老百姓。然而,中国老百姓在愚民政策的长期毒害下,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自身基本权力被践踏的事实,若非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总是逆来顺受,祈求“太平丰年”,或“真命天子”和“青天大老爷”的保护。因此,中国人民对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

当君王昏庸、奸臣弄权时,中国人被推入苦难的深渊,民意和人身权利受到肆意践踏。当着贪官污吏的劣迹被老百姓发现和揭露,引起公愤,危及统治时,君王有时会采取杀一儆百的惩治措施,以平民愤。君王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又为了欺骗老百姓,用忠臣也用奸臣,搞“实用主义”。在官僚享有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护,无官不贪,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主要是忠而不是廉,因此,历代王朝严惩冗官冗将贪赃的法令并不能挽救灭亡的命运。有时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

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如对各级地方长官经常迁调以免与豪劣势力紧密勾结,对官僚的贪赃行为实行种种限制以安抚百姓等等。这类措施在君王贤明时还能起一定作用。在君王昏庸时则无济于事。

从民的方面分析:官僚政治把人民群众的贫穷落后、无知无识、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存在的条件。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所以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经地义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素养,较高的生活水平,在人格上、心理上与官僚平起平坐,在职业上允许适当自由选择,再加上有一定的法制与机构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监督权利,那么官僚政治也就难以立足了。由此可见,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或途径,从长期来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不如说在民的方面,在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社会成员思想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在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灭。

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新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文化上都保留着她由以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痕迹。其中,新中国“一穷二白”,“穷”就是指经济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经济分散落后,“白”就是指文化落后,文盲和半文盲充斥,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素质较低。

提高干部和群众普通文化和专业文化素养、思想觉悟和社会政治积极性,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和必要前提,也是克服官僚主义的基本建设和重要途径。

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思想觉悟和社会政治积极性,那就不可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不可能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和惩治官僚主义。例如对于那些不称职和犯有重大过失的干部,群众很难行使监督权和罢免权,致使一部分群众感觉不到自己是国家和本单位的主人。在一些官僚主义及其它不正之风严重的单位,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往往形成涣散的局面。这一切既同体制问题有关,又同干部和群众的素质有关。

我国人民在建国四十八年以来,特别是从 1953 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现在正在实施第九个五年计划。尽管我国的发展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从总体上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与此相适应,干部和群众的素质也得到很大的提高。旧中国脑力劳动和体力分裂和对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官僚是知识的独占者,知识是士宦求官进爵和获得特权的利器的状况有所改变。这是令人鼓舞的。

我们在这里仅举第八个五年计划在这方面的成就为例。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过去的五年,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7477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11%。顺利完成了‘八五’计划,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目标。制定和实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开局良好。”

“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决策逐步落实,教育投入随着国家财务的增强而不断增加,社会力量办学也为发展教育事

业作出了贡献。占全国人口 65% 的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6%。教育结构进一步调整。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迅速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总人数的 56% 以上。数以亿计的城乡劳动者接受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岗位培训、技术和专业培训。高等教育稳步发展,管理体制改革的有了良好开端,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有所提高。五年共培养本科和专科毕业生 687 万人,研究生 17.5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逐年增加,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指出:

“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钱到哪里去了呢? 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吃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的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的一个项目,投产之后没有市场,相反把原有的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我国四十八年以来,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现在的新一届政府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这对于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对于克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

六、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在克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舆论,即群众的舆论,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和表明态度。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通过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等,运用消息通讯、评论、特写、焦点访谈、摄影等各种体裁和形式来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属于广泛的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如宣传作用、抨击作用、导向作用、监督作用等。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及其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就重视揭露旧制度的黑暗和腐朽,宣传新制度的光明和希望。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去英勇奋斗,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国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恢复国民经济,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法制健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注意动员社会舆论揭露党和政府存在的阴暗面,清洗丑恶现象,纠正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不正之风,以确保党和国家的健康肌体。

为了保持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防止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党纪、政纪和法规,公诸于众,让党员和群众掌握,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

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监督什么?监督他们是不是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遵守党纪国法,是不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不是搞特权、搞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是不是在生产、工作、学习和对敌斗争中起骨干作用和模范作用,是不是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谋利益等。使用宣传舆论工具表扬那些觉悟高、党性强、功绩卓著的干部,批评教育表现差的干部。使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惩治那些犯有重大过失的干部。

党政机关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做到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反对个人专断,也反对无政府主义。要继续坚持各级领导干部定期听取所在单位的党员和群众的评论和意见的制度,对党员的评议制度。党和政府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中对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批评意见,经核实后报上级备案,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以上内容,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已作了明文规定。

中央电视台每日 19 点 38 分定时播放的《焦点访谈》节目,办得很成功。它对国际国内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择要报导和评论,言词尖锐,以理服人,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应。这个节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揭露和批判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官僚主义。这肯定是这个节日成功的原因之一。

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的作用,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实践证明,这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附：读王亚南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我国杰出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卓越的翻译家和教育家王亚南的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内容共分 17 篇，曾分篇连载于上海出版的《时与文》杂志上，后汇集出版。

著者 1948 年 5 月于厦门大学所写的“自序”，对研究动机和研究态度已作了概括的说明。

关于研究动机。1943 年夏天，因为某种文化使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曾访问王亚南教授于广东坪石，并以中国官僚政治问题就教。王教授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即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作答。此后经过 5 年研究，于 1948 年 10 月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答复。本书初版印刷两次，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仅有 3500 册。

关于研究态度。王教授指出：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历史上是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而就中国说，则还在继续发生反时代的破坏作用，何况国人皆曰可咒的官僚资本，正在猖獗的横行着。我们在这种场合来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冲动。过分渲染了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一

切存在的東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會條件還在發生作用的限度內，我們是無法憑着一己的好惡使它從歷史上消失的。“當作一種社會制度來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後，它將如何喪失其存在，那才是我們研究的真正目標。”這些都需要比較縝密的科學研究，始能抉出它的實在關鍵來。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是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系統地剖析傳統官僚政治和批判官僚主義的專著。原國立廈門大學經濟系高材生孫越生接受廈門大學經濟系和王亞南教授的夫人李文泉的委託校訂此書，促成此書於1981年6月再版，印數1—11200冊。此書雖然才15萬字，但是內涵十分豐富。鑑於現在讀者不容易從一般圖書館和資料室找到此書，了解此書全貌，我將此書篇目抄錄如下：

- 第一篇 論所謂官僚政治
- 第二篇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國
- 第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 第四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 第五篇 官僚、官僚階層內部利害關係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 第六篇 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
- 第七篇 官僚貴族化與門閥
- 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一大杠桿——兩稅制
- 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展的第二天杠桿——科舉制
- 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
- 第十一篇 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會經濟生活
- 第十二篇 官僚政治對於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影響

第十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

第十四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

第十五篇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

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第十七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这部专著成功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原理，阶级、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的原理，以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科学思维方法，精辟地分析了官僚政治和官僚主义产生、发展、清除（被克服）的历史过程。其真知灼见对于现今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反腐倡廉，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改善党的领导，克服官僚主义，仍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王亚南教授指出：对官僚政治得从技术的社会的两方面去说明。“我们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讨论，虽然也注意它的技术方面，但同时更注意它的社会方面，从社会的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就是说，在这种政治下，‘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象这种社会性的官僚主义政治，是依存于诸般社会条件，而又为那些社会条件所范围着的，它可能增大前述技术性的官僚作风，却不可能单在技术上去谋求根治。”一旦官僚政治在社会方面有了存在依据，它在技术上的官僚作风，就会更加厉害；反之，如果官僚不可能把政府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而摆布，则属于事务的技术的官场流弊，自然是可能逐渐设法纠正的。

王教授联系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首先论述了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进而论述中国官僚政治由发生形态到形成一个完整的体制,及其社会经济基础,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即它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在何种社会条件下始能从根本上被清除掉?层层深入,逻辑严密,的确具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思想启蒙作用。

王教授论述了官僚政治中官民对立关系两方面的规律。

第一个方面是官的方面。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是既不代表封建领主贵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第二个方面是民的方面。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与上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其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状态,才会把官僚政治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

王教授论述了克服官僚政治和官僚主义的办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国家。作为社会制度的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等诸特殊表象,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

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决心与行动,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并参证当前世界各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固性面前讨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1980年孙越生为这部专著写下的再版序言和附录:《王亚南生平》,已经客观地、公正地评价了这部专著。这对于理解这部专著的要旨是十分有益的。他付出的辛勤劳动是难能可贵的。

孙越生指出:在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人们也十分痛恨官僚主义。但是,几千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专门系统地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却是寥若晨星!人们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封建法西斯复辟的浩劫中清醒过来,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对付传统的官僚政治,不能止于武器的批判,还需要要用批判武器来进行理论上的补课,以便探索克服它的有效办法。《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地系统

分析,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颇多卓越创见。“本书最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领会王教授的这部专著,我还建议阅读孙越生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重读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二千余年的一部官僚政治史,洋洋洒洒,无奇不有。官僚政治有着象魔术一样神奇的“政治化学亲和力”。当官僚政治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官僚顽症”和“官僚主义恶魔”都有可能乘虚而入。人类只有积极行动起来,用唯物的辩证的、从而是冷静的不躁不馁的态度,用各种方法和手段与之斗争,才能使体制性官僚政治和技术性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

代后记

一、中共云南民族学院委员会现任书记王大昆同志,建议我将书稿第三篇原来的内容,即官僚主义及其克服途径调整一下。我采纳了他的宝贵建议:把“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作为导论,摆放在第一篇的前面,试就官僚主义作简明界定。第三篇的标题为:克服官僚主义的途径。这就使书稿的逻辑层次更清晰了。

二、在申报科研项目过程中,民族学和中国史学者、云南民族学院教授罗大云为这本专著写了如下推荐意见:

“党的十三大以来,我国全面地、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克服官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可喜成就。

张建华同志所拟定的科研课题较好,现实意义和社会效果较为明显。对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克服体制上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都有显著的作用。这项科研课题,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张建华同志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有较强的科研和著述能力,能完成此专著任务。待编著结束,建议尽快出版发行。特此推荐。

推荐人:罗大云 职称:教授

专 业:中国史 单位: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

时 间:1995年3月12日”